

#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 **Anarchism**



趙京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W-1

 中日美  
日米中 比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lville,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zhao.cpri@gmail.com](mailto:zhao.cpri@gmail.com) 262 Altadena Cir. Bay Point, CA 94565

USA

第四版

字数: 10 万字

2014 年 12 月 27 日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01635-8



## 目录

### 序言

1. 什么是所有权
  2. 以民众史观认识民众运动
  3. 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4. 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5.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6. 跨越世纪的会晤
  7. 意大利安那祺主义与议会选举
  8. 克鲁泡特金对现代社会的再启蒙  
    [付]克鲁泡特金的亲笔短信
  9. 社会性运动，还是政治性斗争
  10. 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
  11. 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12. 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与教训
  13. 当代人类学揭示的山地东南亚的安那祺史观
  14. 穆斯林兄弟会与以色列集体农庄的政治功能
  15. 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16. 国家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17. 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  
    -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8. 登上历史舞台的拉美劳工
  19. 巴西安那祺主义的历史功绩
-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编辑出版发行序言

## 序言

首先，我必须说明如何把 anarchism 译成中文。

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和出卖之后，我从自己与北京政权和东京政权的抗争经历（以及与华盛顿和台北当局的短暂接触）中成为了一个 anarchist。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九九二年四月发表在东京出版发行的《民主中国》月刊上的《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与《跨越世纪的会晤》是中国人自从二十世纪初期短暂流行后就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对 anarchism 的再发现。正如我在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这个中文译名多少阻碍了人们对它的理解。我注意到这个借自日本的译法（其实，连“政府”、“主义”、“社会”、“共产”等近代政治用语都借自日本）在日本已经被片假名音译アナキズム所代替，说明日本的知识界已经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能准确表达 anarchism 的含义。

另一方面，我对于早期音译“安那其主义”有一定的抵触感，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文献中几乎查不到这个音译，不敢冒险把笔墨浪费在普及这个用语上而忽视其丰富的政治含义。但是，当我这十几年来一直用“无政府主义”这个用语表述我的研究、思想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毕竟确实在“推广”、“普及”一个潜在于中国社会但没有被认识理解的概念、理念或社会组织方式，确实有必要从“白纸”开始。这样，用音译不仅可以准确定义和评述已经在西方（包括日本）文明中展开的理论和实践，更可以注入古老的和新兴的中国社会内涵。而且，中国社会并不抵制具有内在价值的概念的音译用法（如佛教中的大量专用名词）。我为此曾经就教过不少人，记得乔姆斯基说过：名称不太重要，关键是实践内涵。我决定略加修改，确定把 anarchism 音译为“安那祺主义”、意译为“自由社会主义”。

虽然我们可以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文明中找到安那祺主义的雏形和原初表述，作为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安那祺主义无疑是近代西方社会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中最灿烂动人的理想。此书收录的文论也大多通过人物、事件和实践说明安那祺主义的理论。如果我们比较宗教中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单一圣经与佛教的千姿百态的不

同，就会体会到社会主义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专断教条与安那祺主义的“百家争鸣”的差别。我们都确信安那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方式，是人类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和谐与幸福的保障。

本书收录笔者多数已经在《民主中国》、《十月评论》、《比较政策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并大多沿用“无政府主义”的译法，大体上按时间次序先介绍法国、俄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的安那祺主义的历史与理念，然后通过笔者自身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实践，说明安那祺主义在实际运动中的指导价值。虽然不能说全面，本书基本上考察了安那祺主义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思想和实践。当人类的知性发达、成熟起来时，我们会发现人类所崇拜的那些“总统”、“总书记”、“主席”、“总理”、“大臣”和CEO等所窃取的权势，正是人类理智不开化的象征。畅饮过安那祺主义理智之泉，谁还会再欣赏那些用裹尸布制成的形形色色的服务于金钱和权力的嫁妆！但愿本书的出版多少能加深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秩序的理解并改进之。

赵京

2008年10月1日

附注：第一版出版发行后，根据初步反馈，略加修订，以第二版的形式出版（2008年10月30日）。

第三版修订时，删去移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社会责任》、《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日本政治论丛》、《中国社会评论》里的相关文章，加入2008年以后发表的相关文章（2011年8月8日）。

第四版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与以色列集体农庄的政治功能”、“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国家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巴西安那祺主义的历史功绩”、“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2014年12月27日）。

## 1. 什么是所有权

共和国、宪法，  
多么动听的名字！  
可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看啊，饥肠辘辘的穷苦人，  
依然衣不蔽身，  
依然劳累困顿。  
再来一次革命啊！  
这次应当更向前一步，  
应当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sup>1</sup>

在以政权斗争为中心展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矛盾，如以温斯坦莱为代表的山岳派平民利益，以布朗基为代表的共和平等派的诉求。他们很快明白：新掌权的、以资本为后台的统治阶层马上就出卖了曾经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平民阶层；为了政治权益的垄断，统治阶层甚至完全不顾那些从人类历史保存下来的、同为人类一分子的基本伦理情感<sup>2</sup>。很显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革命，总要维持的人支配人的组织社会必然会堕落腐化下去，这种新的革命，马上就集中到所有权的制度上。马布利（1709—1785年）可以被称为是思想先驱，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就预见到所有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革命不可能彻底。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马布利本有一切机会在神职工作的道路上取得教会和国家权力的高级地位，但他在风华正茂的中年突然离开外交部，完全献身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与官方的政界活动绝缘，连查理十五世之子的太师之任也坚辞不就。这个抉择，一方面是他厌弃其熟悉运作的专制制度的政治观点的成熟，一方面更促使他到古希腊历史（特别是反对奢侈的斯巴达制度）中寻找国家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作为“第

---

<sup>1</sup> 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开卷，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

<sup>2</sup> 在1989年春天中国发生的震撼世界的运动中，再一次复现了这种普遍人性为国家权力玩弄的性格。只是因为其被镇压才减少了被出卖的性格。

三等级”利益代表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局限。在他的众多著述中，马布利体现出禁欲主义的道德情绪，以道德标准来区分人类社会的历史，甚至宣称：幸福就在我们本身，而不在于我们拥有的事物，对于国民来讲，需求越少、幸福越多：“立法者的艺术在于减少国家的需要，而不在于增加便利于满足国家需要的收入。……拟定提高国家收入或国库权利的任何办法，都是具有毁灭性后果的。”<sup>3</sup>这种道德宣教基于马布利对现实社会中由所有制私有带来的弊端的认识：“我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越深信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正在使人产生所谓分化并改变人心的自然趋向，因为无益的需要使人产生对他的真正幸福没有用处的愿望，使他的脑袋充满最不公正和最不合理的偏见或谬见。”<sup>4</sup>他更特别反对靠金钱支配政治：“因为一国的执政者的需要，一般比任何其余东西都更能增加国家的需要，而执政者的生活习惯又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希望财富不要创造参加治国的权利。”（同上）

如果仅仅是劝人为善，希望统治阶层节制，马布利更适于从事预定的神甫教职，维护已经被因涉及法国、欧洲政治而丧失的天主教本来具有的人道主义传统。但马布利更进一步、更坚决地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主要是从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理论出发，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破坏了自然秩序。按照当时流行的重农学派的观点，个人私有（即不依附于领主等的人身自由）、私有动产（即对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和私有土地三项关系密切构成统一体，如果缺少一项，其他两项就必然随之解体。马布利否认三者的不可分性，他承认前两项符合自然原理，竭力反对地产权（包括土地私有制萌芽的茅屋所有权和劳动产品所有权形式）。即使最初平均分配土地，经过若干时间<sup>5</sup>，私有制必然引起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分裂成几个阶级、社会道德下降，富人阶层必然力图夺取政治统治权、任意修改法律，在贪欲土地的驱使下发动战争……，总

---

<sup>3</sup> 马布利：《马布利选集》之《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1983年3月该书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

<sup>4</sup> 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

<sup>5</sup> 基督教社会主义政论家拉梅耐说得更明确：“这样的财产平等如果是早晨建立的，往往到晚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出版。

之，私有制不仅破坏了一个社会（国家）中公民之间的和谐，而且也破坏了整个人类各社会集团（国家）之间的安宁（“哲学家经济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的疑问”，上揭书）。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认为人身自由是所有权自由的一部分，而更把它与生命一样理解为作为人类一员的资格。“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协议和人为的制度，因此人人能够随意处分他所有的东西。但是，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生命和自由，则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生命和自由的天赋人人可以享受，至于自己是否有权抛弃，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抵偿不了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sup>6</sup>正是卢梭不但恢复了把出让人身自由视为犯罪行为的罗马法精髓，而且宣明了人身自由是人的天然权利，并不是受社会制度制约的公民权利（如罗马的“解放奴隶”必须得到人为的法律裁决才能具有人的天赋）。“自由乃是他们以人的资格从自然方面所获得的禀赋，父母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们这种天然禀赋。那么，为了建立奴隶制，就必须违犯自然，同样地，为了使这种权利永存下去，就必须变更自然。法学家们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是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同上）如果注意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所有权是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具有个人独立人格能力的、主体人对客体物财的所有关系，就首先可以认识到所有权是近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进步的产物；在那种“人生下来就不是人”的制度下，实际上是不可能论及（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的。如果以此标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关系，就会吃惊地发现，有十亿民众（加上去世者）因为“农村户口”被终身固定在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是丧失人身自由的农奴。<sup>7</sup>此“农奴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罪恶，远远超过“文革浩劫”、“反右斗争”给人的灾难，任何

---

<sup>6</sup>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年版。

<sup>7</sup> “城市户口”是一种（上等）公民制度，被剥夺掉这个公民权利下放到农村、农场的“知识青年”回城浪潮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之一。



人都不能找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身自由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等借口来肯定其它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制度。

在确立了人身自由后的社会里，社会性财物（一般情况下，空气、阳光、海洋等自然环境暂不考虑）就对人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两大类：

（一）直接用于个人生活必须的吃、穿、住消费用品，也称基本生活资料，（二）间接服务于个人生活的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与知识技能）以及满足个人高等社会性消费的生活资料（如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的别墅）<sup>8</sup>。同时肯定这两类财物的个人所有性质，认为私有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权利，是确定不移地赋予所有的人的权利，是所有的人为其生存所必要的和没有不公正就不会被剥夺的权利<sup>9</sup>，构成以后逐渐形成的资本阶层统治的私有制王国；同时否定这两类财物的个人所有关系，就是单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但更偏于后者）、大致接受第一类财物的个人所有但反对第二类财物私有的思潮，就是以后形成强烈实践运动的社会主义理论。

私有制拥护者的强大支柱来自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观念，连对私有制攻击得最透彻、把人类不平等的产生归罪于私有制这个唯一基础的卢梭理论也“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纵然在浅薄的批评家看来可能是这样的理论”<sup>10</sup>，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础正是私有制，“的确，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利中最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卢梭把马布利竭力推崇的“古代共产主义”斯巴达政体称为暴虐的贵族政治制度，他的学生丹东、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革命性再彻底，也不止一次地宣布：私有制是神圣的（马拉可能是例外）。国

---

<sup>8</sup>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在《七大洲风云四十年》中记叙与铁托等共产党头目乘游艇、避暑别墅时“天真地”询问，这也是工作需要吗？惹得主人难堪。如果再记忆起铁托死去后人们很快赶走了他的赖在总统宫中不肯搬出去的遗孀，就可以理解今天南斯拉夫解体的意义并不在于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胜利，而在于制约原来存在的民族矛盾公开化的外部环境变迁。

<sup>9</sup> [英] 李弗尔：《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1767年版。李弗尔是马布利所批驳的重农学派人物。

<sup>10</sup> 考茨基：《论1789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民公众甚至发布命令：“凡提出土地改革法或提出其他一切推翻土地的、商业的和工业的所有权的法案的均处死刑。”

卢梭没有如马布利等人那样把腐化的（私有制）社会与善良天性对立以建立理想社会，他的贡献在于激昂地不妥协地指出社会是建筑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贵族阶层的豪华生活（包括卢梭也置身其中没法完全摆脱的、为贵族阶层效劳的腐朽文化）是建立在平民的贫困上面的。这样，那种把社会进步只指望于上层阶级良知发现的说教或者是出于认识论上的无知（我们从马布利的个人禁欲生活中可以这样认为），是对平民的欺骗。社会平等本来是自然的天赋，怎么需要依靠统治阶层的恩赐才能获得呢？但卢梭深深陷入矛盾的辩证法中，知道虽然民众渴望解脱奴役关系，但“每个人都会理解，奴役的关系，只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因此，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疾呼：‘不可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但是，很明显，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因为私有观念不是一下子在人类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许多只能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的。”“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sup>11</sup>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人类不平等的产生一定是伴随着私有制建立起来的，因为在原始的共同享有资产的氏族部落中，只要人这么一种社会性动物出现，就必然生活在被区分为不平等的上下人际关系中，就产生了人支配人的关系，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或阶层必然占用由于

---

<sup>11</sup>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年。

集体协作产生出来的、超过单个人作用（劳动）简单相加的成果。二十个人可以协作在一天内捕获野兽，但一个人用两百天可能也毫无收获。问题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往往只以被支配者单独劳动中付出的价值来支付集体协作产生出来的价值；在现代的分工协作产业社会中，它成了经营利润的差额来源，因为如果劳动者不安于低报酬还想获得由分工协作带来的价值时，经营资方很容易重新雇用另外的单个的劳动者<sup>12</sup>。对于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者而言，能够找到一个就业机会就诚惶诚恐了，哪还会与雇用自己的企业交涉工资等条件呢？

既然人必须从事社会生活，就必然促使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不断地加重每个人对社会组织的依赖关系以便进一步剥削压榨。而且，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使得支配者 A 很容易在分与一部份强占利益的前提下指使一些被支配者 B 共同去压迫征服另一些被支配者 C，由此败坏了社会道德，“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过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很难强使一个决不好命令他人的人去服从别人。”<sup>13</sup>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权势的社会就逐步形成，把不平等关系以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形式强制固定下来。怪不得鲍胥爱说：“假如我们要追溯到事物的本源，我们也许会发觉，对于你所拥有的那些财产，他们（穷人们）的权利并不小于你的权利。……我们当中任何人也不能自诩他在自然中比别人处于更优越的地位。”（1652 年《圣弗朗索瓦·达西斯颂词》）卢梭在此打碎了十八世纪中被人们坚信的“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的信念，并由继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证明了：任何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首先是结果；也就是说，至今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所有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甚至也可以用于否定卢梭对于私有财产的坚定信念。

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最终在欧洲确立了共和国和宪法制度，但民众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解放，在劳工中出现了反对各种资产权力的无产

---

<sup>12</sup> 日本的经营管理阶层比别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同行们较注意社会地位的平等。例如，据报道 1994 年公司社长的工资平均仅为新职员工资的 10.6 倍，但美国的差距可达数十或上百倍。

<sup>13</sup>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 年。

者阶层的独立意识。与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的有闲阶层<sup>14</sup>改革相比，以魏特林（1808-1871年）为代表的劳工思想一开始就看穿了国家银行、国家工场等金融资本家和政府的改革措施只是延续社会不平等的陷阱，而号召劳动的贫困大众起来进行社会革命，实行财富共有共享、废除金钱货币，“恢复”早期基督教团生活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凡是仗着自己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要求比别人多享受或少工作的人，他就是贵族。”“在我们的组织恶劣的社会里，富有者和有权势者享有不利于劳动者的真正不受约束的自由。”“你们所引以自豪的一切财富，难道不是你们或你们的上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人民那里窃取来的吗？你们强加给我们的捐款和赋税、你们使资本膨胀起来的利息、你们制造出来的破产、你们装出来给我们看的虚伪和耗费浩大的官司，难道不都是盗窃吗？你们让工人在令人窒息的工厂里过早地衰亡，这难道不是你们对社会犯下的谋杀罪吗？你们的监狱、断头台和手持刺刀的军队，不是到处宣扬谋杀吗？”<sup>15</sup>魏特林以裁缝帮工生活，不可能如卢梭、马布利那样有条件钻研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从知识上只可能反复推敲在德国手工业工人中具有深厚影响的、但他自己已经不再信仰的《圣经》，并想到利用宗教感情解放人类，为艰苦的斗争注入福音色彩。他大胆地指出《圣经》的许多矛盾之处，以此说明他要揭示的基督教原则才是《圣经》的精髓并力图模仿耶稣宣传组织革命。“正因为这是史实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所以这些矛盾对于检验基督教的原则来说，根本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耶稣后来所宣扬的东西，全是约翰先前提出的主张，财富共有共享的原则，艾赛尼派在约翰之前就宣传过了。”<sup>16</sup>魏特林特别教育了俄国贵族巴枯宁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无政府主义。

---

<sup>14</sup> 这三个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实很不相同。小店主傅立叶偏于哲学的玄思，圣西门擅长于设计未来产业社会的浪漫，欧文则是当时最先进工场经营的大企业家，俯心于现实的改善。

<sup>15</sup> 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

<sup>16</sup> 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两文合为一册书出版。另外，魏特林还著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财富再分配（也包括新创造财富的分配）过程，可以免去象卢梭那样“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七八天之久的旅行……我到树林深处去探索，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形象，我在心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sup>17</sup>，也可以超越魏特林的义愤激情，很清晰地看出：超常致富的财产几乎都是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掠夺来的。那些由中国民众自四、五十年以来在国家权势的强制或欺骗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可观的国有资产（如填海造田、引水工程、三线建设、大跃进炼钢等等），在尚未被瓜分之际名义上是属于国民的，实际上完全被统治阶层的“计划”所垄断，很少达到造福国民的功用。民不聊生的危机促使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改革”政策，一时间也赢得了人心，取得了统治阶层自身也沾沾自得的胜利。仔细回想，自从邓小平集团主导中国政局以来，曾经吃过毛泽东专权之苦的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集团确实地接触、倾听了来自民众的呻吟，顺应了民心（如果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一步决不可能实现）。但是，仅仅顺应民心并不是政治改善的充分条件，整个国家统治集团比较顺利地接管政权（包括可观的国有资产）后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只不过在于“改革”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共元老阶层陆续过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把包括国家资产在内的巨大国家利益移交到他们的后辈手中，但其不争气的后辈无论在人品、资历还是在能力上都无法统治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度（他们倒不在乎来自民众的对世袭制的愤怒）——况且，这个国度已经不可能如过去那样全权统治了，所以，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制订“法律”，以国家权力的意志把国民用血汗和生命积累起来的财富以“民营化”的形式瓜分吞食掉<sup>18</sup>，把财富建立在强夺的罪恶上<sup>19</sup>。其次，

---

有《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与前两文共同构成了他的空想体系。魏特林关于耶稣的天才猜想是基于他亲身经历的体现，以后在死海岸岩下发现的怪文书多少印证了他的说法。

<sup>17</sup>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年。

<sup>18</sup> 例如，中共的国家副主席无法把同一权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就推出最大官商（它的更通俗名字叫“官倒”）公司总裁的位置，把儿子扶上官商公司总裁的椅子。

那些多少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民众最近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几乎重复着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指出的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此次的国家权能更为强大罢了，甚至连略有良知的外国人看到中国劳工的工作条件也过意不去。个人所有差别的扩大就是社会不公的体现，如果中国民众在“改革”尚未被完全葬送之前不能有效地制止官僚统治阶层的腐败，留给中国的只有社会革命的选择了。

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因为看到私有财富的不正当来源就否认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在一党专政的全权统治下，个人正是因为被剥夺了甚至属于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的权利而实际上无法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问题在于：如何划分所有权的限界（定义），使得个人的人身、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又不至损害公共利益？按照上述分类，蒲鲁东（插图，1809—1865年）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不同意义<sup>20</sup>，他把第一类个人所有称为“个人占有”，“个人的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权利”，它符合自然，适用于自罗马法传下的定义：所有权是在法律所许可的程度内对于物的使用权和绝对支配权（或随意处置权）。此处的“物”指的是直接消费品等基本生活资料，而不是如1793年法国宪法在开头发表的《人权宣言》中说的“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物、自己的收益、自己的劳动和勤勉的果实的权利”或《拿破仑法典》第544条说的“所有权是以最绝对的方式享受和支配物件的权利，但不得对物件采用法律和



---

<sup>19</sup> 一般显贵害怕强使他们尊重人民的那种政府，比害怕死亡还厉害。当波斯的七位解放者杀掉篡王的伪斯麦尔第斯后集会讨论他们的国家应当采取哪一种政体时，总督奥达奈斯坚决主张应当建立共和国。当他看到人们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将要选举君主时，于是让出竞争王位的权利而只要求他本人和子孙能够做自由人（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引自希罗多德）。无论何种统治形式，权力交替的结果总是一个明确的判别方式，例如，从全日成·全正日父子世袭中可以想见北朝鲜更象波斯而不象希腊。

<sup>20</sup>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1840年版），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年。

规章所禁止的使用方法”那种超出个人生活资料的（因而也必然侵夺他人财物的）无限界的所有权。即使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所有，也不可以“绝对”地随意支配，必须服从公益性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往往不能由法律具定明裁。例如在发生饥荒时大财主囤积粮食宁肯烂掉也不提供给民众，就超过了个人所有的权利范围。把个人所有基本生活赋予天然权利的性格，其意义在于否定共产制的幻想：“那种存心否定私有制的自成体系的共产主义却是在所有权的偏见的直接影响下孕育出来的；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总是有所有权一词。……勤奋的人不得不为懒汉工作，虽然这是不合乎正义的；能干的人不得不为笨蛋工作，虽然这是荒谬的；最后，人抛弃了他的个性、自发性、天才、情感以后，就不得不在公共‘法律’的权威和严格性面前低首下心地自趋灭亡。……共产制是压迫和奴役。……共产制侵犯了良心的自主和平等：侵犯前者就是压制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侵犯后者就是用相等的美好生活来酬报劳动和懒惰、才干和愚蠢、甚至邪恶和德行。”蒲鲁东建议，把这个可以存在的个人所有称为“占有”以区分法律定义的“所有权”一词，正如西塞罗把土地比做一个大戏院那样，谁坐在椅子上那个座位就是他占有的，但椅子却是戏院所有的。椅子的功能是在上演时向观众提供使用价值，这种向使用人提供的价值功能是可以被占有的，但使用目的和条件是受社会制约的。同样地，这种占有形式还可以略为扩展到“小生产者”（包括个体农户）为了维持生计必须保有的经营和劳动手段（蒲鲁东没有区分这两者）。

相对于个人或家庭独自占有的所有权（在商法中多体现在 Sole Proprietorship 或 Self Employed 个体经营业主或家庭经营）而言，蒲鲁东所指的第二类所有权包括今天的跨国公司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形式，它们必然带来各种盗窃：诈骗性的破产、公·私文件伪造、彩票、高利贷、地租、利润、敲诈勒索等等，都是专制社会的基础，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所有权的弊端广为人知、广为人恨<sup>21</sup>，蒲鲁东骄傲地宣判：“所有权就是盗窃。”

---

<sup>21</sup> 大布朗基（“囚徒”革命家布朗基的哥哥）在致蒲鲁东的信中告白到：“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类的所有权被滥用的情况实在太多。但我不能从滥用所有权做

所有权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定义，是指完整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利；占有则是一种事实状态，即与所有权归属分离而行使的、在一定条件（期间、使用规定等）下相对、暂时的权利，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那么，我们所占有的财物的所有权在谁那里呢？在社会整体：“人从社会的手中得到他的用益权，只有社会可以永久地占有：个人会死亡，社会是永久不灭的。”需要留意的是，这个社会，决不是指国家（政府），因为现存国家本身正是所有权制度的产物。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没有所有权、不同于共产集权的社会。虽然在私有制下废除其法律制度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在马克思看来是贫困的哲学的贫困，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废除了所有权的私有制，并不是我们至今为止所理解的私有制。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必要嘲笑一个法国印刷工人的天才发明，而应该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态在实践中去检验它。

[1995年元旦，日本静冈县三岛市]

---

出废除所有权的结论，这个猛药和可以治愈一切病害的死亡太相象了。”蒲鲁东把此信放到《什么是所有权》的前言以示对大布朗基的尊重。



## 2. 以民众史观认识民众运动

沙皇的幽灵在俄罗斯复活，显示出俄罗斯革命连最基本的政治成果也被出卖殆尽了。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另一场具有相同重要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对于今天的这一插曲也就不会惊奇了。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同时代的米涅的《法国大革命史》到今天的以巴黎大学索绪尔教授<sup>22</sup>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大都是学院式研究；以保守的统治立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的政论，如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只有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彻底以民众史观描写这场民众运动的，才是最明确地揭示出革命的真髓的作品。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内战等击败了白军的反动军事势力，同时也镇压了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镇压了1921年克朗斯塔特 Kronstadt 海军基地以无政府主义水兵为主的起义。但布尔什维克对于专心著述的无政府主义“教祖”克鲁包特金却非常客气，以他的《法国大革命》版税的名义资助克鲁包特金让他安心写作。实际上，广义的俄罗斯革命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先驱的，连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物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克鲁包特金的影响。列宁就高度称赞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是“至今为止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中最好的作品”，“至少要印刷几十万册，在我国所有的图书馆里普及”<sup>23</sup>。



在此书里，克鲁包特金（插图）强调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废除了农奴制与专制政治，即使波旁王朝复辟，也不敢恢复旧制度。“法国

---

<sup>22</sup> 1985年，身为法共党员的索绪尔曾在北京大学访问讲学，我有幸听讲，对于他细致地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民众心理的手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sup>23</sup> 以下关于此书的引用直接来自于菊池里志发表在《海燕》周刊1998年9月6日第692号的书评，所引页数是淡德三郎翻译的日文版（新人物往来社，1971年出版）的页数。

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了二十三年，就是因为民众不能放弃革命的成果。所以，甚至在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时代，统治阶层也不敢去触动民众从封建领主那里夺回的土地。旧制度的复活已经不可能了”（426 页）。

当然，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而最大的阻挠却来自领导革命的国民议会（后改称国民公会、立法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成员。克鲁包特金猛烈抨击他们对革命的背叛与出卖：在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狱）之前，国王公然调集军队准备解散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却无动于衷，“民众已经站起来要彻底推翻王制，但议会对于哪一边能获胜没有把握，小心地避免支持任何一方。总的来说，议会对王制更怀好意，不追究路易十六的犯罪，为了阻止暴露国王自身的犯罪连国王的共谋犯也不愿意追查”（222 页）。

当国王收买来拉波等著名议员、招致奥地利雇佣军进攻巴黎准备杀害所有革命者的阴谋暴露后，国民议会仍然全力回避对国王的审判与判刑。在革命的高潮，国民议会判处国王的死刑时，有 46% 的议员反对。

“资产阶级的指导者们自从七月十四日和十月六日以来，脑袋里就一直没有放下他们所畏惧的民众起义这个妖怪”，“面对革命的胜利、共和制的确立、封建特权的全面瓦解、要求进一步对富有阶层征收重税的民众，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更愿接受国王与外国雇佣军”，“连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激进派，也没有勇气要求国王退位，认为共和主义者这样的称呼是对自己的中伤”（182-183 页）。

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是受尽封建特权压制的都市平民与地方农民。克鲁包特金高度地评价农民起义：“为了废除封建特权、夺回自十七世纪以来被僧侣、世俗两界从农民部落掠夺去的共有地的农民起义，才是大革命的精髓、大革命的基础。资产阶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没有自 1788 年萌芽、1789 年以后迅速展开的农民大起义，革命决不会进行的那么彻底”（85 页）。

在巴黎，“打倒王制的，是被称为共同体 *commune* 的组织。八月十日以后，共同体成为革命的名符其实的核心、掌握实权。当共同体健在时，革命就充满活力。在全国各地的共同体中充满了革命的灵魂，没有

这样的核心，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摧毁旧制度、击退德意志侵略军，不可能再生法国”（147 页）。

支持共同体的是被称为部段 section 的民众自发组织，在此之上组成共同体。部段才是革命的发源处、是民众的活动据点。克鲁包特金称那些活跃在部段的民众为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他们“为革命献出身心、理解革命的意义、热爱革命、为革命在所不辞”。在法国的历史上，“无套裤汉”突然以事态发展的主体出现：“他们活跃在街头、出现在国民公会的傍听席，以怒吼、喝彩等推动议事日程。这是来自民众的直接呼声，不可能从资产阶级的舆论中产生出来。议员们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握有最后的武器：起义”（268 页）。

不用说资产阶级的政府，连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都恐惧、压制部段的活动。部段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首要被迫害对象，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或被迫自杀。部段死了，共同体也亡了，革命也就停滞不前或趋于反动了。



克鲁包特金深情地称赞部段和共同体的精神领袖马拉：“比大多数革命者年长、富有经验、对民众深切热爱，比同时代人正确地理解革命的各个阶段、能预见下一步的发展，再没有别人能象他那样把握各种复杂事件的相互联系”（335 页）。可惜马拉被过早刺杀身亡（插图为“马拉之死”）。

与马拉相比，罗伯斯庇尔“排斥一切财产平等化的诉求。他明知平等是革命摧毁封建制度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却害怕离开当时的统治势力，小心地避开那些为民众活动的人”（190 页）。“八月十日之前，罗伯斯庇尔与所有雅各宾派，都宁愿支持国王与宫廷而不肯再次诉诸于民众革命的烈火”（191 页）。

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已经成功、已经达到尽头，“只有罗伯斯庇尔才是建立强有力政府为革命闭幕的最理想人物”（408 页）。由此，罗伯斯庇尔被资产阶级推上独裁者的地位，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又被他们抛弃。

克鲁包特金对于在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至1794年)涌现出来的近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民众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赋予极高的评价,以至于断言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问的伪装”)等都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只注重财产、消费品平均的“共产主义本质”,无视伴随工业化社会到来的生产过程中的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关系。

无论如何,此书中确立起来的彻底民众史观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民众革命,包括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任何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民众运动,都是很好的启发。俄罗斯革命变为今天的结果,对于每一个真正的站在民众立场、本身也是民众一员的人都提出了许多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反省在于各种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潮流(有时候只是不同名称而已)的组织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认识。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牺牲,不管其本人愿意用“社会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称呼,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同情。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革命的过程发展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已经背离民众、革命就已经停止了。最近的特别是关于克朗斯塔特起义的历史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克朗斯塔特起义的水兵们不仅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的功臣,而且也是俄罗斯革命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要求(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反对由“党”垄断一切,释放所有社会主义者等)完全符合苏维埃的精神,而直接镇压起义的托洛茨基和批准镇压的列宁在此事件的处理上都是有罪的(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把镇压的责任推到“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的头上)。而参与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官僚,以托洛茨基为首,后来几乎都遭到斯大林的肃清<sup>24</sup>。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事件就判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但列宁,特别是托洛

---

<sup>24</sup>关于这一次起义,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Ida Mett, *The Kronstadt Uprising 1921*, 最近可从 <http://www.cs.utah.edu/~galt/kuprise.html> 上阅读。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自治的另一份重要文献 Maurice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1917-1921*, 也可从 <http://www.geocities.com/WestHollywood/2163/bolintro.html> 上阅读。

茨基，也必须对他们竭力反对或殊死反对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负一定责任。

今天，那些能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人，甚至一些赞同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活动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这并不能作为自己的免罪符，而反思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基于事实认识那些自己认同的潮流中的过失，是一个最不容易、也是最需要实行的起点。当我们终于认识到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程为顶点和象征的所有苏联、中国官方教材都是为统治当局服务的偏离民众史观的工具时，克鲁包特金的这本《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基本教材。

[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5/6期]

### 3. 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今天，在苏联解体和向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 and 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

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sup>25</sup>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与事实不符，<sup>26</sup>有必要先简单叙述公社的成立过程。<sup>27</sup>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全国选举（男子普选）后，由共和派和奥尔良保守派组成新的“国防政府”，梯也尔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普鲁士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事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普选后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激进平民的担心而拒绝。同时，大量涌入巴黎的穷人开始把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法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产生了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愿望。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愿望变成了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

---

<sup>25</sup> <http://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sup>26</sup>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见 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 46.

<sup>27</sup> 主要引自中文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E5%B7%B4%E9%BB%8E%E5%85%AC%E7%A4%BE> 的译文表述（但其观点非常“马克思主义化”，不少地方违背英文版原意，与日文版也相差很多）和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有数万巴黎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以保卫城市。特别是巴黎下层民众无所畏惧，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血战到底。自卫队选举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布朗基激进革命派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等。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抗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协助，国民自卫队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马特尔高地。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老练的首相俾斯麦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说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并不过分 not so unreasonable”<sup>28</sup>，很快便撤离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静观，同时保护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临时政府。法国首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稳定地增长，梯也尔害怕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感到再也不能允许中央委员会自由支配那4百多门大炮。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政府军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阻止士兵的国民自卫队和当地的男女老幼共同处决了政府军军官。政府军的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并迅速扩大，梯也尔只好命令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文职行政人员们立即撤退巴黎。

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作为巴黎唯一的权力机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3月26日举行的巴黎“议会”的选举。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

---

<sup>28</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



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阴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

90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64人兼任议员，加上4月16日补选的17人，共有81名议员。其中18人来自中产阶级、约30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19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7人属于雅各宾派、4人属于布朗基派、3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他们的职业为：6名技术员、6名工人、3名商人、2名专业人员。<sup>29</sup>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议会脱离关系。

以“祖国在危机中！”<sup>30</sup>为旗号的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梯也尔断然拒绝。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两大障碍，而扫除愚昧靠教育，扫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和暴动。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变为第二个“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不具有世

---

<sup>29</sup> 以上数据引自 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 18.

<sup>30</sup> 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界范围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竞争意识竭力诋毁布朗基，称“阶级专政优于革命家专政”，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实行得人道、公正的话，正是布朗基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法兰西内战》的书名本身就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悲剧的偏见定义。十年后，马克思与流亡的公社成员们发生分歧，指责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尝试。<sup>31</sup>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 1891 年 3 月 18 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子于伦敦发挥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

---

<sup>31</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其中引用马克思 1881 年 2 月 21 日致 Ferdinand Domela-Nieuwenhuis 的信。

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sup>32</sup>

“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 would 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据从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Pettridge于同年8月在巴黎写出的历史中记载，有5百士兵的政府军第12连队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巴黎、守卫着法国银行。<sup>33</sup>只是到了最后，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银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条件下，半强制地取出70万法郎支付国民卫队的薪水。<sup>34</sup>其实，公社的领导人人都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

---

<sup>32</sup>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sup>33</sup> Pembroke Pet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 322.

<sup>34</sup> 来自银行的会议记录。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 91.

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

恩格斯论断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马上转换话题，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35</sup>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

---

<sup>35</sup> 我在这里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要求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

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有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免费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例如，4月11日创建的“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取消妻子与情妇之间、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差别，废除妓女、关闭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失败后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sup>36</sup>

---

<sup>36</sup>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记述了他作为清朝使节团的英文翻译，目睹了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虽然作为一个23岁的中国青年，他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但对一些社会动荡，特别是妇女的表现的观察，非常难得，值得参考。例如，早在1870年“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齐赴外都，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籍改民政而作乱”（93页）。10月31日，“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民政’”（95页）。“德法虽经议定免战，尚未画诺。而此日‘红头’又乱，满街喧闹。经看街兵拦阻，而‘红头’缚其人于木板，投诸河中，掷石如雨，继用长杆插入水底而死”（103页）。在凡尔塞，见到“因官兵不与叛勇战，故调水师来此，蓝衣草帽，不堪整齐”（138页）。“火药局失火，轰火药五万馀斤，伤死女工五百馀名。...男皆当兵，女则有造火药者，有缝布袋装砂石以筑土城与炮台者，有能文文书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骁勇倍于男者，奇甚”（166页）。“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168页）。“见马队二百余人由巴黎回，被获老幼女子三十馀名、男子二百馀名，皆携手步行，前后缚以麻线，由马兵解送”

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 20 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业主可以接受补偿），等。

公社议会也完全支持国际主义，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旺多姆圆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将其拉倒。

对于常备军（以及征兵制）和警察的废除，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的社会理想。不过，在公社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队同时负起了军队（对外）和公安（对内）的职责，废除常备军更具有呼吁法国别的城镇联合对抗临时政府军队的含义。对于废除官僚制度，特别是官员的高薪，也更具有临时的战争措施性质。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马克思主义流派所称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队总司令）年薪不超过 6 千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则”并不确切。当时一个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 5 法郎（没有参加战斗的自卫队员一天拿 2.5 法郎），一年（工作 3 百天）是 1,500 法郎左右，而一个烟草工厂经理的年薪是 4 千法郎，他的助手是 2,800 法郎。现在，实际上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高薪才是问题的关键，靠选举上台的政治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极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后去私营企业任职谋取高薪。

---

（169 页）。“晚，见马步兵解送被胁之‘红头’万余人上火轮车，皆流于阿斐利加（非洲）。其余党恶作乱者，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见步兵二行，手执刀枪，防护叛勇六百，由楼下经过。…叛勇经过之处，土人皆高声贺采，不解所贺何人”。“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171 页）。“现擒女兵数百，讯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昨由会堂审断，其女中之主谋者以枪毙之，余皆发往牛嘎列丹尼岛充军赎罪”（172 页）。“由楼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妇女有百余名，虽被陋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174 页）。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不是“代议”，而是被委任（随时可以被选举人撤换）来同时担任立法、行政（特别是军事行动）和司法的职能。这样的制度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的安那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适合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社会关系。各地区议会和大量的在围城期间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当地居民的要求、指导之下直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条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员们更加激进，不管他们属于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在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员工自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的主动自发的、直接的社会民主实践。为什么马克思等人就看不见呢？

不过，在国家政权以及整个统治阶级逃出巴黎的情况下，至少还可以实施已经大为折扣的“普选”<sup>37</sup>、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90位被选举的委员中，有16位温和派人士拒绝就任。公社4月16日马上进行补选，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权者投票<sup>38</sup>）。但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sup>39</sup>中，列宁抨击到：“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虽然列宁也谈到“尽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宗派，公社还

---

<sup>37</sup> 3月26日的选举有229167男子投票，比2月8日的30万多人投票的普选少。当然，时间上短促也是一个原因。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 69.

<sup>38</sup> 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 18.

<sup>39</sup>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

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抱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幻想，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发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诏书之后，无产阶级就鼓足干劲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抛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和任务与1871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国民自卫队先于4月2日与凡尔赛政府的常规军的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抵抗与求生变成了公社领导层首要的考虑，他们要把国民自卫队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马赛等城镇的公社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而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保守态度，不予支持。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与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机构同名。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大，但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民众无法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员会”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达到13万人<sup>40</sup>，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队赶回城里。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没有逃离巴黎的中上层市民们的欢迎。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而公社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厅等。6名人质（包括达尔博伊总主教）于5月24日在监狱被枪决。

在进攻中，曾经拿过枪的公社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政府军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在最后的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数千名政府军围攻并屠杀了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百名公社战士。战斗到5月28日全部结束。

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成千上万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另外还有将近几万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附图公社囚犯被送往凡尔赛，来自一本当时的杂志）。在流血周期间



<sup>40</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62.

有 15083 人正式被捕<sup>41</sup>，但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估计从 1 万到 5 万人。据 Benedict Anderson 说：“7,500 人被监禁或者流放”，



“大约 20,000 人被处决”（附图）。记者 Edmond de Goncourt 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sup>42</sup>1872 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组织产生的可能，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

年。对于被监禁、流放的公社社员，法国政府直到 1880 年才实行了大赦。

数千名巴黎公社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者）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败后才驰名历史的欧仁·鲍狄埃（1816 年 10 月 4 日—1887 年 11 月 6 日）。鲍狄埃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曾参加 1848 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 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他躲藏在阁楼中写出《国际歌》的歌词，表达了公社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激情。我们都很熟悉的萧三译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这里录出第三段：“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富人无义务独逍遥。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地，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第四段：“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他们除了劳动，还抢夺过什么呢？在他们的保险箱里，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从剥削者的手里，他们只是讨回血债。”第五段：“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如果他们执迷不悟，

<sup>41</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1.

<sup>42</sup> 与 1989 年天安门悲剧后邓小平的“杀 20 万人换 20 年太平”多么相似！正是邓小平完成了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让我们英勇牺牲；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会射向我们自己的将军。”<sup>43</sup>

巴黎公社的悲剧，对于法国和欧洲都提供了沉重的直接历史教训。法国由此告别了内战性质的革命，包括力图“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认、参与以普选为标志的共和体制内运作（布朗基 1879 年 4 月在狱中被选为法国国会议员）。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被列宁冤枉地骂为“叛徒”）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始终避免与施行了普选的国家权力作正面的战斗。即使从政治层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德国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体制远比本来属于战胜国的俄国在战后的内战和饥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 年 3 月 18 日，通过解散制宪会议引发内战而确立起一党专政（最坏的“布朗基主义”变种）的布尔什维克，在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sup>44</sup>后，集会庆祝巴黎公社 50 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义战士柏克曼、古尔德曼不由得质问列宁这个梯也尔的传人：你有资格谴责（至少靠普选上台的）梯也尔吗？那些所有号称“共产党”的独裁者（从斯大林到金正日），你们比梯也尔罪恶百倍！

对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 1848 年布拉格和 1849 年德莱斯顿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sup>45</sup>1870 年 9 月 28 日，以巴枯宁为首的社会革命家们占领里昂的市政厅，宣告成立法国安全委员会并发布条令，希望别的城市的呼应，共同废除国家，进一步引发德意志境内的革命。类似的起义也发生在马赛、布莱斯特等城

---

<sup>43</sup> <http://zh.wikipedia.org/zh/%E5%9B%BD%E9%99%85%E6%AD%8C>。略微修改。

<sup>44</sup> 见笔者《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克朗斯塔特水兵们的“权力归苏维埃”要求本来正是列宁上台的口号，不过布尔什维克专政后，感到苏维埃妨碍他们的权力。

<sup>45</sup> 以下的引来自 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p.191-194. 这是关于第一国际最全面的的历史（译自俄文第三版），虽然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史观，却用约一半的篇幅相当客观地叙述安那祺主义的活动事实，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资料。

镇，但都很快被资产阶级的地方或政府军警镇压下去了，因为法国广大的农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很容易被政府利用。<sup>46</sup>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sup>47</sup>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sup>48</sup>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sup>49</sup>政治上的失败是暂时的，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向人类显示不同于既往的社会秩序，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文明规范。

---

<sup>46</sup> Henryk Katz,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p.79-80.

<sup>47</sup> Mikhail Bakunin,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1871. Ed. Sam Dolgoff, 1971. <http://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paris-commune.htm> “Contrary to the belief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 which I deem completely wrong - that a social revolution must be decreed and organized either by a dictatorship or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 revolution, our friends, the Paris socialists, believed that revolution could neither be made nor brough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except by the spontaneous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the masses, the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eople.”

<sup>48</sup> 他们眼看不能控制国际，就把总部迁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他们缺乏基本的诚实，当他们的忠实门徒要求把国际的资料转往纽约时，也遭到马克思的拒绝。

<sup>49</sup> 每当我反省被北京、东京等国家权力出卖的1989中国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后悔“仁慈”、“良心”、“诚实”为自己带来的命运。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们还会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改造社会。

巴黎公社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federation）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新社会生活的基石。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民众的自发的社会改进运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乌克兰马克诺运动、西班牙内战、芝加哥干草市场就义、美国民权运动、天安门悲剧、墨西哥原住民起义、世界社会论坛等）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的光芒。

[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 4. 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热爱人类，反抗制度——巴枯宁

制度(组织形态)是构成人类生活的社会本质——笔者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正当孪生宠儿的话，无政府主义最多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与两位嫡生幸运儿同源却不同宗。无论是痛恨沙皇的宪兵、专制开明的君主，以及共和国的警察，还是哀叹侧翼的排挤、暗算，无政府主义的命运，正如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派的攻击一样：“非常遗憾，诸位已经被历史遗忘，你们的命运可悲，你们的作用已经完成，你们将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当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被自身创建的共产主义政府流放到国外，七十年前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重新在俄国取代共产主义极权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复兴呢？

1970年，詹姆斯·焦尔 James Joll 在其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文版序言中论述到：“1964年，此书的英文版刚发行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已经从现实的关心变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了。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衰退，无政府主义只存在于法国、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流亡者，或者纽约、巴黎、伦敦等大都市的少数固执知识分子当中了。然而，近年来我们又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特别在学生运动(日本也不例外)中，有令人注意的复活。这些新的革命运动，不一定明确地依存于无政府主义，有些运动明确地拒绝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含有许多与本书中所阐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方法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指由蒲鲁东所表述出来的，地方分权与劳动者自治的原理。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关于中国政体的联邦制设想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这些运动的意义，并不只是就无政府主义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全权主义的批判，而且就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产业社会的批判，也是仍然有效的。无政府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的、最有活力的激进思潮之一，至今为我们提

供着新的启示。”这一点，当然不只是针对欧洲、北美，也对南美、亚洲其有相同意义的。

在《序论》中焦尔进一步发挥道：“与其它的少数派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患成功崇拜症的历史学家的受害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一次革命，他们的政治理论充满了理论的欠缺、错误的前提。有一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教义为人们带来了情绪上的共感，却轻易被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的冷酷、毫无意义的暴力、恐怖行为的行动特征一笔勾销。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对产业社会的性质提出许多疑问，他们对近代国家的概念不断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对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前提不断提出挑战。他们常常诉诸于非常粗暴、直接的手段，攻击既成社会、道德秩序的内在价值和制度，这些攻击，无论喜剧还是悲哀，都归于流产。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迸发出来的抗议，是隐藏于人类心理底层的欲求，虽然它不构成重要的政治、社会势力，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挫折，但这种欲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从人心中消去。”

无政府主义的这种人性欲求当然是存在于人类发源之始的，但我们可以把其明白地表述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的内心胎动，最早由法国的乡村牧师梅叶以《遗书》的形式表露出来，这当然是合理主义对上帝权威的异端，作者明确喊出：个人的东西归个人，不要交付给任何形式的异己（教会、君王）。而卢梭则以自然和教育对现存制度的抨击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写作方式的最大代表。在内容上比卢梭更完备地提出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是英国的葛德文，他在《政治正义论》中，从两方面对社会制度提出幻想：（1）教育个人，使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对道德的追求上，从而使社会变得完善起来；（2）“政治制度的唯一正当的对象是个人利益”。政府不能持有以下两个以外的正当目的：社会内部解除对于个人利益的不正压抑，对外共同防御外敌的入侵。在此同时，马布里明确提出废除私有财产以达到人的平等，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伴随着强大国家建立起来的权力对人类生活的桎梏。

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却是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神话破灭的产物，目睹了当世的政治革命、宪法改革的失败，产生了对旧有的所有革命方法和目标的攻击理由和机会。无政府主义者所

反对的，就是从十九世纪至今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越来越高度的中央集权、越来越发达的产业国家。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宿命就是不断反抗所有热衷于权力追逐的社会集团：从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就是旧有的宗教信条与新兴的合理哲学冲突的产物，其最大的理论代表就是“启蒙主义的私生子”蒲鲁东。

为了给最贫困、最大多数的阶级找到改善其物质、精神、道德状态的方法，而且是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蒲鲁东本能地反感近代社会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发展，这就是他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认为他们所设计的“新社会组织化”不过是既成要素的再排列，把权力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完全没有意义，特别不能相信那些财产共同所有、由中央政府强制管理劳动的共同体乌托邦。作为人的第一要素的劳动，只能由各自的劳动合作来自治管理，在排除政府干涉这一点上，蒲鲁东承认亚当·斯密是他的老师。

但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最大代表在理论上的漏洞立即被当时还不太有名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严密、独断的黑格尔哲学思辨所驳难。当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运动领袖的时候，从俄国逃出来的巴枯宁就应运而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合流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上。

在第一国际中还有一位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马志尼也很有影响，《牛虻》的主人就是被描写成受马志尼的指派，押送弹药进山而被捕就义的。马志尼对国际性的工人运动缺乏民族斗争的知识和热情，当巴黎公社成立时，他反对这个运动而最终失去了对第一国际的影响。如果说第二国际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告终结的话，第一国际就是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分裂而告终的。尽管在这两人的追随者间掺杂着不少个人的争权夺利，但他们两个人都明白彼此之间的原则差异决不可能弥合。今天看来，他们的差异有两层含义：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上看，马克思是英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只会堕落成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人类社会的恐怖集团（甚至黑手党也被警察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哲学的理念来看，巴枯宁坚决反对以权威主义的政党形态创建自由社会的企图，“我唾弃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自由，剥夺自



由的东西决不是人性的东西，共产主义把社会的所有权力都集中起来，必然会在国家的权力下把财富也集中起来。我则希求国家的废止，彻底扑灭权威的原理和国家的教化。国家在把人道德化、文明化的借口下，压抑、榨取人，使人奴化、堕落下去。”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对全权主义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警告是多么英明！

恩格斯稍后论述到：“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以下认识上是一致的：社会革命到来之际，政治国家以及与其相随的政治权威的消亡、即公共机能丧失政治的性格、变为单纯的监视社会利益的行政机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在权威主义的政治国家的成立条件还没有消除之际，要求一举废除这些社会条件，即革命的序幕就是废除权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乌托邦贫血症！“废除权威”本身就要求人类最大的权威！那么马克思先生确实实际一些：由一个能够废除自身权威的阶级——无产阶级，来废除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巴枯宁的指责很准确：马克思所幻想的无产阶级是哲学思辨和经济学推理的产物，蒲鲁东则生活在现实的无产阶级之间，深知他们自身的弱点不足以担负起这个废除权威再自我废除权威的历史使命。可笑的是，列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怎么办》中又把“灌输”知识给无产阶级的使命交到知识分子的“先知”（如马克思和他本人）身上，背离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期待，仿佛回到其俄国同胞巴枯宁的立场上了。

无政府主义与政治权力最近的关系发生在西班牙，那里的口号一直是：“我们要求废除资本的支配、国家的支配、教会的支配，在此废墟之上，建立起无政府状态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但我们知道：西班牙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社会基础，乃是其从宗教改革、产业革命以来被时代遗弃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佛朗哥的独裁政权的产生。由此我们再次确认：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以反政治来从事政治的企图必将彻底失败，虽然其回光也曾映照于中国大地上。无政府主义只是作为各次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成分才永远存在于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市民运动、学生运动中。

应该说，十月革命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派、孟什维克派，以及各类隐蔽的、公开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权威遭到了最大的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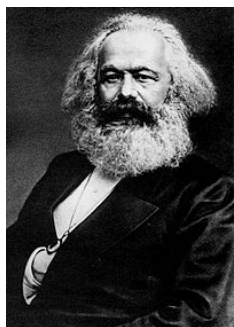
胁。但人除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欲求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欲求：面包，而面包必须在秩序、权威中产生。更引申地看：人类，由于欲求面包而产生的服从，向往权威的性格，已经变成人性中不可分的最大特征。所以，毛泽东去世后，《人民日报》连篇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共产党政府生怕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当中漫延扩散。也正是民众需要权威的国民性产生了要把权威强加在国民头上的各类政治闹剧。

从共产主义全权形态中表露出来的对权力的服从只是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侧面。从产业社会以来，不断涌现出对近代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礼赞：洛克、黑格尔、孟德斯鸠、韦伯，一直到当今的帕森斯，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使国家机器更加权威、合理、精密、机能充实。但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却远离了“三权分立”提倡者们的理想。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日本，行政权即政府统治个人的权力高居于立法、司法权力之上，靠立法权来制衡行政权力、特别是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压抑的期待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压榨，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通过分配领域对国民的剥削，其共同实质都是通过国家的强权来实现的。

个人在这种暴力之下越来越无能为力，只能采取屈服、盲从、欺骗、出卖人格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这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表露得最清楚：国家权力、即镇压之权(林彪的这句名言倒是个真理)非常强大，它拥有摧毁人类的能力，它供养了一大批国家“公仆”，靠国家的名义寄生国家的腐蚀越深，被腐蚀越深的国家更加深了对个人的支配。从最大的官僚到最没有权力的平民，都被国家政权这个撒旦治服得没有一丝反抗余地，只好以最卑劣、可怜的方式逃避国家的强权。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异化”的本质，叔本华、尼采、施本格勒敏感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虚无意识的克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如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从政治权力的变革上力图反抗这种异化的尝试以有价值的失败告终的话，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希望的曙光：从个人的知性、人格的改进着手的、基于个体、团体之间自由联合的社会改进运动兴许是解消不必要的政治权威支配的必由之路。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1年11月]

## 5.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



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的Niebyl-Proctor 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 Ann Robertson 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 Robertson 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我们松散的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达成的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 Robertson 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sup>50</sup>，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门徒，都对虚伪的基督教等宗教毫不留情。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

<sup>50</sup> Ann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 vs Bakunin Confli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3 issue of WahtNext?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sup>51</sup>，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

---

<sup>51</sup>巴枯宁 1850 年在监狱中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过 96 页长的“悔过书”，成为马克思等对手攻击的把柄。这很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蒙混过关的“自我检查”，其中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十年来在德国等欧洲的经历，试图说服沙皇改革。例如：“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在俄国状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劣等；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好、更亲切、更具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東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共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和自尊，而俄罗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语气，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在监狱里写的这类材料。见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 147.

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这些国家的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sup>52</sup>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sup>53</sup>。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sup>54</sup>，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sup>55</sup>，加上力图统一意大利的传奇英

---

<sup>52</sup> 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xiii and p. 136. Paris, 1928. Reprinted by AK Press, Oakland, 2003.

<sup>53</sup> 我目前订阅的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经常评述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包括古巴，甚至委内瑞拉）的霸道行为，并追踪到当年马克思分裂“国际”的“原罪”。

<sup>54</sup> 列宁主义者喜欢解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俄国的“契卡”那样的超越法规的秘密警察）。其实，在公社成员中有不少巴贝夫和布朗基的追随者，相当于巴黎公社的“先锋队”。正如巴枯宁指出的，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地方都没有起义或抵抗普鲁士军队，巴黎公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雄悲剧史诗。

<sup>55</sup> 后来有所谓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四（托洛茨基）国际继承“国际”而把“国际”称为“第一国际”，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

雄马志尼（伏契尼著名小说《牛虻》的主人公就是为马志尼押送弹药而被捕牺牲的）等，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蚀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 1868 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sup>56</sup>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 1872 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 65 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 19 名与总委员会的 21 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 25 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sup>57</sup>。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

---

们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已经抛弃了“国际”的部分基本原则。

<sup>56</sup>引自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 101. 原文引自法文 1868 年 9 月 23 日。

<sup>57</sup>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 266-267.

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人种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为了窄狭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谩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sup>58</sup>，与“专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sup>59</sup>，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里，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

---

<sup>58</sup>克鲁包特金作为一个科学家（地质学和社会学），获得英美知识界主流的认可（如两次获邀到美国讲学），被誉为“最高贵的安那祺主义王子”。后来，他回到布尔什维克专政下的俄国。列宁为了利用他的国际名声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给予他象晚年的托尔斯泰在沙皇统治下那样的优待。见 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 Prince: Peter Kropotki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其实，他对英美战争政策的错误判断，由他最出色的学生古尔德曼和柏克曼早就指出了，但他听不进去。见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sup>59</sup>以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很难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些很教条的组织，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依然在固守马克思的教义，但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影响。见笔者的介绍：“我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http://cpri.tripod.com/cpr9697/iso.html>，“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印象”<http://cpri.tripod.com/cpr1999/slparticle.html>等。

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sup>60</sup>，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sup>61</sup>。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

---

<sup>60</sup>美国社会主义老战士Bookchin是一个很好的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向安那祺主义转变的典型例子。他30年代大萧条时9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不断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论战，被现实转化。他甚至断言，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二战以后，也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见Murray Bookchin, "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AK Press, Oakland, 1999. 同时，我们知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是安那祺主义者。瞿秋白在临死前承认他还信仰国家的消亡，但对为什么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个理想感到怀疑，由此否定自己的政治生涯。

<sup>61</sup>希特勒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潮流之一的共产党攻击其“兄弟”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安那祺主义者本身也有不少称号，克鲁包特金称自己为“共产安那祺主义者”，强调经济（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平等；巴枯宁则厌恶“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这联想到政治上的强制，他更宁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按照杜尔凯姆的研究，共产主义本来是古希腊概念，远早于近代国家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则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列宁的一党专制实践使得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阅读各类政治刊物，从这些用语中就可以判断其各种立场。



卖、滥用，连“消亡国家”、“废除边界”、“废除常备军”、“全民就业”、“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2008年8月19日]

## 6. 跨越世纪的会晤

——一个幽灵正弥漫在欧亚大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赵京：尊敬的巴枯宁先生，您不会因为我的姗姗来迟而介意吧！

巴枯宁：欢迎，欢迎，来自遥远的朋友！我已经等了您一个多世纪了，不过，我并不希望您来去匆忙而没能领会我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聪明人是故意扭曲了我的思想。你看，人类的认识过程都是可逆倒推的：在邓小平时代认识毛泽东的中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重建”中认识斯大林、列宁。今天，当我的祖国土地上解体了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度后，我们才可能全面地审视马克思了。

赵京：从这种意义上，您无疑可被称为人类的导师之一。当这个世纪的历史与您的倡导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人类的悲剧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荣辱。直到八九年，才从天安门广场上传出了反抗近代国家形态的发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最强音——无政府主义，并一直导引着东德的消亡、苏联的解体和欧洲共同体的统合。令我焦急不安的是它在中国的扩散现实和可能的后果。

巴枯宁：回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我个人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政治活动，我特别想指出以下的区分是重要的：哪些是思想上的不合理，哪些是实践上的幼稚或愚蠢。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反抗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国家强权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经历了重大的失败，但在天安门广场、在红场等地点的民众抗议中表露出来的理想却是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的。应该反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找到一种消灭了人支配人权力构造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社会生活。唉，世界永远是罗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苦笑)！

赵京：是呀！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全权社会形态之中，倒容易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人类兴许配不上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你看：那些反抗中国政府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必须倒向另一个更大的政府强权寻求庇护。可怜的人类，连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产生不出来啦！

巴枯宁：“人追求自由，却又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最早道出了对近代社会的哲学悲观。实际上，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可以认为近代世界历史的激荡都是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再建引发的。以民族(语言、文化)为背景建立起政治目的的国家，本来只应该防御外侵、为国民提供福利，却往往变为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少数统治阶层的权力机构。苏联政府就是最典型的国家权力，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国家权力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赵京：这兴许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提供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了。对于中国这样的全权主义社会，所谓改革的目标不是以新的权力形态去取代旧的体制，而是首先向政府强权夺回那些属于个人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越来越重视人权的意义，连中国政府也变得聪明了一些，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供中国国民监督、批判政府的强权膨胀。

巴枯宁：这也是中国政府比苏联政府高明之处。我个人认为中国并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消亡，因为中国社会的全权主义形态并不如苏联那样强制，特别表现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形态上。可惜人类常常忘记，或者说不愿意正视历史。你看：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经济上采取前资本主义的压榨方式，使马布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是万罪之源，而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公正政府。但葛德文却警告我们：不可能存在公正的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政府，永远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的机器。

赵京：兴许，共产主义思潮中不少人总是不知觉地把基督教中的理想王国硬搬到现实中来，才造成了忽视社会大前提之下的哲学思辨。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高明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剥削关系，却完全没有想象一下全权社会形态下人支配人的赤裸裸的强权现实，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还要空想。象欧文、圣西门这些人，对于近代科学、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经营形态、政府组织性质的变革，都比坐在大英博物馆中研究现成文献的马克思的认识深刻。

巴枯宁：可惜，我们这些投身实际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如马克思那样博学，那样有号召力。我自己也感情用事，由于不认为《资本论》有马克思自称的价值，我干脆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献辞。不过，我确

也苦心地劝过马克思，你把个人的私有财产抽个精光(听说你们那里处决人还需要死者付钱)，还谈得上甚么“个人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呢？他又搬出“万能的教育”来搪塞。问题在于，是教育一个富人掏点钱出来容易呢，还是教育掌权者交出一些权力来容易呢？洛克菲勒、松下幸之助很“慷慨”地退还了不少财富给社会，斯大林会交出本来属于国民的权力吗？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还声称他是“国家总统”呢！

赵京：哈哈，财产在阴间不通用，权力关系却是永恒的！再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想象“共权主义”的天堂，所以干脆大家都把权力交给上帝，才算最大的公平和正义。上帝当然不需要教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接受教育只想教育人类，最终只能把人类的发展导入歧途。不过，我有点不理解，当时马克思是如何思考消亡国家这一重大课题的。

巴枯宁：共产主义消亡国家的途径是消灭所有的反对势力，不管它叫地主、资本家，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当然是激发更强烈的反抗，直到——你看，叶利钦的出现。我很气愤你们中国人把 Anarchism 翻译为“无政府主义”，常常给你们中国人带来误解。我们反对近代出现的人支配人的国家权力形态，却并没有要消亡国家，也不想废除政府，我甚至根本反感以政党的集权方式对抗政府、推翻政府的企图。

赵京：“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确实翻译得太糟了，一下子就被判了死刑。我这样的人虽然与 Anarchism 很有共感，也绝不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这个名词首先是日本人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先把它译为“安那其主义”，挺美妙的吧！可它能达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目的吗？今天日本的学术界都改用中性片假名发音，但我们中国人恐怕永远也只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了。不瞒您说，我的同胞常常连概念都没弄懂就开始了带有功利性质的理论争吵。既使对于“人权”这样的概念，你问两个人，肯定会得到三种解释。书归正传，您不是也想过建立“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政府吗？您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厅干甚么？

巴枯宁：好汉不提当年勇。那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仇视国家机构。市政厅的权力并不大，我们以为一举摧毁权力机构，废除了税务、

警察，希望获得解放的市民们自行组成松散的、基于个人愿望的自由结合体。可悲的是人们也需要权威和支配，还是韦伯正确：越进入近代社会，官厅机构的庞大、复杂化越不可避免，人类生活需要各种政府的机能。为了使这些机能的强化不加深对人的支配，我们又看到甚么蒲鲁东的“法朗结”，英国的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总之，诉诸于广泛的社会改进运动来减轻政府的非法支配，如近来很受人瞩目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所做的那样。

赵京：至于国际性的人权活动，部分带有对于过去殖民政策的反省性质，没有反省侵略政策历史的日本政府不懂人权的概念，只愿意与外国政府打交道而无视外国公民的人权，变相鼓励专制政府强权的非正常膨胀。我们看中国的政府机能，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同时，一个持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普通公民连去菲律宾这样的国度都需要菲律宾人的“担保”，更不用说生活在“有钱人”的日本的国土上，简直像一个小偷！

巴枯宁：我真为你们中国抱不平！当年日本人在台湾、在“满洲国”，在南京杀人时持的是甚么样的护照和签证呢？那些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持有甚么护照和签证呢？你们真是伟大的民族，还把他们的收养为亲生的儿子。真痛心，我的同胞们也像日本人一样，对你们犯下过不可宽恕的罪行。好在上帝会还历史以公正的，今天中国的变革里正孕育着人类进步的新的期待。

赵京：可惜中国人是权力(关系)崇拜的民族。例如“六四”终结了一个有限改革的时代，但那些蒙取民众支持、在权力边缘生活过的“改革派”至今没有人反省，并承担对民族犯下的罪过。而普通民众面对强大的国家机构只剩逃避一途，国民意识越来越虚无化(Nihilism)。

巴枯宁：近代国家的形成首先需要一种精神，苏联国家可以解体，但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却是永存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世界精神财富的贡献不如你们的先祖，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众会创造出迎接现代化的新的理念形态的。朋友，我真羡慕你生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度里，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赵京：您这样说，只是加重了我们的惭愧。在一个灵魂僵死、外壳膨胀的政府机体下，正发生着人类可能干出的各种卑鄙行径，却只是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生存功利。所以，我们举起了知性与人格这两面旗帜来对八九中国之春进行最彻底的继承，在没有人敢于宣称解救中国的危难之际，我们找到了通过改进个人的知性与人格的道路来推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巴枯宁：这也是对无政府主义发出的警告的一种响应吧！请牢记这一点：任何一个声明解救社会的运动都要避免自身的组织性的权力关系，否则就会导致出卖和灭亡。无论是八九中国之春，还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是被镇压下去的（根本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镇压它们！），而是被出卖葬送掉的。戈尔巴乔夫下令降下苏维埃联邦的国旗，只是终止了自那面旗子被升起以后的各种出卖。说到底，人类完全没有必要对那些人为的国旗、国歌倾注比对一棵树、一堆土更多的热情。那些象征权力的“神圣”标记背后就是赤裸裸的人支配人的罪恶。

赵京：是啊，没有“被统治者”（即国家主权的主人）同意的任何强权形态都必然是要灭亡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虽然其权力形态不断发生重组，为人类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但其文化、人口却不断繁荣、演进，在这个世纪之末，又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转换时代。任何阻碍民主、自由、人权潮流的权力形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了。

巴枯宁：上帝祝福你们，如果要借用你们的先祖在《诗经》中的一句诗来预期中国的话，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4月]

## 7. 意大利安那祺主义与议会选举

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运动可以说是最直接、正统的巴枯宁主义运动，由巴枯宁 1864 年亲自到意大利点燃自由社会主义的火种。<sup>62</sup>另一方面，正是通过 3 年的意大利活动，才确立了巴枯宁从反抗专制的密谋分子向安那祺主义的升华。在《革命教义手册》中，巴枯宁列出以下基本教义：无神论（“道德只来源于人的集体意识，与神学和神秘形而上学无关”）、个人的自由联合（federalism）、不分国籍、反对国家等一切强权、平等（社会主义）、正义（“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而最平等状况下实现最大自由就是正义”）、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等等。对于意大利的教会/君主旧秩序来说，巴枯宁是来自俄国的异教、野蛮的象征；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意大利进步青年们，巴枯宁是新思想的启蒙导师。安那祺主义战胜马志尼等民族主义者，成为早期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

正是意大利的安那祺主义坚定地支持和促使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确立了不同于“权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路线。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 19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是西欧最活跃的革命运动，不断地起义、暴动、宣传，涌现出 Carlo Cafiero 卡菲罗、Andrea Costa 蔻斯塔、Errico Malatesta 马拉铁斯塔等群英人物，除意大利外，也散布于法国、瑞士、英国、西班牙、美国、巴西、埃及、突尼斯等移民、流亡社区，特别在阿根廷的劳工运动中影响深远。<sup>63</sup>

---

<sup>62</sup> 本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 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和 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前一书很客观、同情理解安那祺主义。后一书是关于第一国际最全面的历史（译自俄文第三版），虽然贯穿马克思主义史观，却用约一半的篇幅相当客观地叙述安那祺主义的活动事实，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资料。

<sup>63</sup> 见本书“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

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巴枯宁在意大利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第一国际的信徒后，由恩格斯亲自在国际总部“代表”意大利，通过卡菲罗指挥意大利的运动。卡菲罗开始时忠实地执行了恩格斯的指令，但最终无法忍受“德国人”的傲慢，最终不惜带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第一国际分道扬镳<sup>64</sup>。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来自德国的理论代表“先进”、“发达”、“未来”的无产阶级，而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落后”地域的安那祺主义只表达出反抗的原始本能，需要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指导。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谬论遭到巴枯宁等的痛斥，安那祺主义正是在贫困的、无文化的农民、部落、流浪民中发现了最朴素的平等、自由价值和公平、牺牲精神。<sup>65</sup>马拉铁斯塔 1872 年面见巴枯宁后大病痊愈，焕然一新，成为巴枯宁的终身不渝的弟子，在他的近六十年的起义（1877 年 4 月曾占据两个村公所，烧毁财产税务记录、宣布中止国王的统治）、两次监禁、多年流亡、大量出版等活动，成为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代表，与后来的第二国际（国家社会

---

<sup>64</sup>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发布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 年 4—7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中引用：“鉴于：伦敦代表会议（1871 年 9 月）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根据这一切理由，代表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庄严声明，从此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同时重申在经济上同一切工人团结一致，并且建议一切不赞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 1872 年 9 月 2 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纽沙特尔（瑞士）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全协会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sup>65</sup> 克鲁包特金、巴金等都缅怀幼年时期从仆人那里学到的人性之爱。



主义）、第三国际（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sup>66</sup>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除了来自国家权力的残酷镇压，内部分歧/分裂导致了意大利安那祺主义不可挽救的伤害。1882年1月，意大利通过了普选改革，知识分子出身的能干的寇斯塔在1882年10月29日的选举中，成为意大利第一个靠社会主义纲领当选的议员。虽然他与别的社会主义参选者一样，宣称把选举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机会，但最终他还是宣誓效忠国家就职，正式背叛了他早已放弃的安那祺主义。与德国、法国等早已实行普选的国家一样，是否以及如何参与选举、进入政府，带来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灾难性分裂。寇斯塔的行为，作为个案，根源于他的个人动机（贪生怕死、沽名钓誉等），值得谴责。但是，普选本身也是安那祺主义运动的斗争成果之一，不应简单排斥。如果在不浪费有限资源的条件下能够把安那祺主义的口号和政策普及和实施，不管是谁上台都无所谓。同时，在复杂、“有机”进化的现代化社会国家里，必然会出现利用社会主义纲领、口号争取选举的政治家和集团（政党）。另一方面，变得比较开明、民主的统治集团会拉拢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更残酷地镇压拒绝妥协的安那祺主义者。1892年，遵守议会制度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排除了反对议会制度的安那祺主义者。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或者接受了议会社会主义方式、或者退出了政治运动，马拉铁斯塔这些依然坚持安那祺主义的少数战士，虽然在个人道德上值得崇敬，在现实上却被排除在意大利社会主义主流和意大利政治之外。

反过来看，安那祺主义不仅反抗权威，同时也反对政治这么一种人类生活形态，从而超越了时空局限，具有现代意义。在中国这样的至今没有普选（以及伴随普选的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度，安那祺主义具有一个半世纪前在欧洲的价值和意义；在欧美这样的早已实行了普选制度但依然无法保证经济平等、实现真正自由和正义的国度，从每一个层面、角度，通过各种途径抗争、改进社会的不平等，

---

<sup>66</sup> 当列宁死去时，马拉铁斯塔公开表示祝贺，遭致几乎所有欧洲左翼势力的非难。

就是当代安那祺主义的精髓。我们看到，在几乎每一个政治、经济统治集团的头头们所在的地方（各种政府权力或 WTO、G8、G20、APEC 以及超级跨国公司总部等），都聚集起无数的“上访”、抗议民众，“直接行动”，阻止他们不经过我们参与就决定我们（甚至整个地球）的利益、命运。我们怎么会放弃既有的投票权利呢？在昨天的美国期中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夸夸其谈地讲“job（工作机会）”危机，<sup>67</sup>却没有一个人开出任何良方。难道美国真的没有出路了吗？不！只要读一读我今年 3 月 6 日发表的“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短文<sup>68</sup>，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完全可以在不降低现有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减少一半工作时间，达到完全雇用！问题在于美国的形式上“一人一票”民主的选举堕落成“一美元一份权力”的资本现实。在加州，共和党的超级富豪抛出 1 亿多美元私财赌注州长职位，比戈尔当年竞争美国总统的花费还多；而政府雇员工会为了保住饭碗，在收入急剧减少的经济危机中，还掏出比过去更多的钱力挺民主党的候选人夺回州长权位。我没有任何竞选经费来宣传安那祺主义纲领，又不能放弃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选举权，在找到更好的候选人之前，只好在州长的选票上庄严写下 Jing Zhao 的名字。

[2010 年 11 月 3 日]

---

<sup>67</sup>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美国的失业率不是接近 10%，而是 30%左右。Jing Zhao,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ulu Enterprises, January 2010.

<sup>68</sup>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4hour.pdf>

## 8. 克鲁包特金对现代社会的再启蒙

大约自公元九世纪中期以来，直到 1613 年王族会议推举罗曼诺夫为沙皇为止，俄罗斯一直由海贼出身的诺尔曼人 Norman 族长 Rubrik 的家族统治。1842 年，在罗曼诺夫王朝下改名为克鲁包特金 Kropotkin 家族的 Riurik 直系中，诞生了令所有统治阶级震撼恐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彼得·克鲁包特金。今天，当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代替，而以扬弃、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列宁、马克思的时候，谁也不能绕开无政府主义，不能绕开克鲁包特金。

自幼失去母亲，靠法国人家庭教师和德国人乳母抚养成长的克鲁包特金，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主人（统治阶层）与奴隶（被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部分是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更主要受当时的农奴解放运动风潮的感染，在圣彼得堡士官生学校读书的克鲁包特金就热衷于数学（地理学）和社会问题这两大注定为其终生从事的行业。1862 年克鲁包特金 20 岁时作为士官加入哥萨克联队往西伯利亚从军五年，其间不断从事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在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进化的原因之一》<sup>69</sup>的绪论中，他回顾到：“青年时代当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满洲北部旅行时，动物生活的两种特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大多数的物种在严酷的自然中必须进行生存竞争，周期而至的生命剥夺，广阔土地上没有生物的活动……；(2)虽然大多数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自身并非一定如此）认为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进化的主要原因，但即使在动物群居的少数地方，我却没法找到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手段的残酷斗争。”

克鲁包特金由动物的观察联想到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受斯宾塞的影响（曾翻译过其论著），但对于达尔文主义者将生存竞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滥用（特别是其后克鲁包特金亲身经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 1902 年就发表了《互助论》，从动物间的互助、原始人、土著人间的互助，中世纪都市间的互助，直到近代社会中的主要是劳动大众之间的互

---

<sup>69</sup>本文所引的克鲁包特金著作作为春秋社 1928 年 4 月发行的《世界大思想全集》第 34 卷，由室伏高信、八太舟三译为日文。

助，论述了人类生活中除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特性，指出这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空想，引论到人性中实际存在的、超越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国家统治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的善良本性，可以克服战争这一人类罪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周刊上登载一文，抗议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滥用，反对只用残酷的压迫和狡诈的欺骗语言，而要以相互协同的视点来解释生物学以及社会的进步，并要求再版《互助论》的普及版。克鲁包特金在其序文中开首写到：“今日之战争，几乎把所有欧洲都卷入恐怖的战争中，在德国人侵入的比利时与法国的各处，都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规模地残害非战斗人员生命以及掠夺普通民众生存手段的事态。这时，那些为罪恶的战争寻求借口的人把‘生存竞争’作为一个得意的解释。……本书的基本概念，即相互扶助代表了进化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因素，已经逐渐地被生物学者们所承认了。最近欧洲大陆出版的关于进化论的大部分论著都已经对生存斗争中的两种特性，即对自然逆境的物种之间的外部竞争和物种内部的对于生存手段的内部斗争，做出了区分。……不过，虽然动物间相互扶助的重要特性已经逐渐得到现代思想家们的认可，关于我的至今为止的第二个命题——人类历史中对于社会制度的进步的两个重要特性——却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现代思想的精英们，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大众是与人类社会的制度改进无缘的，只有那些在知识、政治、军事方面的精英们才可能指导愚昧的大众实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

“现在的大战，使欧洲的大多数国民不仅从战争的现实，而且从日常生活的繁多的结果中，深切地感受到应该变更这些流行的教义了。任何国家要想克服历史危机，都离不开民众的创造与建设的天分。那些积极备战、制造野蛮战祸的不是欧洲的民众，而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支配者和精神上的导引者们。……今天的妇人见到那些在基辅城里蹒跚的德、奥军队的伤员、俘虏，总会塞给他们面包、苹果，有时也会递上铜板，并不问其是敌是友、是官是兵。……那些自发的来自英、美、俄的对于比利时、波兰的援助，都超越了‘慈善’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单纯的邻人之间的互助。所有这些同等的事实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种子，正如人类原始的互助是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的最善制度的起源一样，这一类新的事实也将导致新的制度的诞生。”

从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反抗人类历史上最大强权——国家——的犯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人性中实际存在的同为人类的互助善良本性。作为一个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克鲁包特金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无抵抗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在生活实践中，“克鲁包特金象托尔斯泰主张的那样去生活了”（罗曼·罗兰）。当俄罗斯的贵族中最早接受欧洲传来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在为如何对待农奴而受内心谴责时，克鲁包特金 12 岁时就抛掉了公爵的称号，并以自己的贵族出身为耻，从此以贫困和遭受迫害为伴。直到 1917 年俄国革命，克鲁包特金才赶到俄罗斯，出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顾问委员。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布尔什维克政府曾经要以他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教科书，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再为新的强权政治所利用，因为自反抗沙皇的斗争以来，做出了先驱性牺牲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先镇压的工人起义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克鲁包特金专心于无政府思想源泉的哲学论著——《伦理学》，献给世界上一切被支配的贫民大众，终因健康不支于 1921 年 2 月离开人世。布尔什维克政府要为其举行“国葬”遭到其家人的拒绝后，对那些自愿参加葬礼的无政府主义者开恩释放一天。两万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冒着政治危险参加葬礼，仪仗队前，两人高举象征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黑旗，上书“立即释放所有牢狱中的克鲁包特金的战友和同情者！”<sup>70</sup>

历史上所有的群众运动常常为野心家、政客、内奸出卖掠夺，无政府主义者却永远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就是如克鲁包特金所坚信的那样，民众生活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来源，在《互助论》中，这种信念已经超越普通的道德、法制约束成为一种信仰，即：生为人类，就应该信仰人类互助之爱并由此去反抗、改善人类的罪恶制度。今天，我们在日本仅仅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尊严呼吁竟遭到北京和东京两个政权的卑

---

<sup>70</sup>我 1996 年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图书馆读到巴金翻译的克鲁包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自传》，后来又读到 George Woodcock & Ivan Avakumovic, *The Anarchist Prince*, First Schocken Paperback Edition, 1971, New York, 对克鲁包特金晚期包括支持英美等“自由世界”、厌恶德奥专制体制的政治生活有了更全面一些的认识。克鲁包特金并没有出卖晚节，但确实让包括古尔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失望过。

劣迫害<sup>71</sup>而没有变成暴力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信仰，相反，我们深深同情和理解所有的以各种形式、手段反抗国家强权的政治斗争（包括被判处死刑的“日本连合赤军”、“中核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以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秘鲁的“光辉之路”等等），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理想主义者。我认识几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学生，是日本青年中仅有的胸怀人类社会理想的优秀青年（我并没有知识认为他们坚持的理想是片面或错误的），当日本政府破坏日本宪法派兵海外，五十来名“中核派”（他们也曾在机场阻止日本国家强权强制遣送张振海）在不可能获得游行许可的情况下，蒙上面具、穿着同种衣装在几辆装甲车和上百名警察的围堵下冲向大阪中心街梅田游行，抗议自卫队开向波斯湾。我们再次看出：只要国家政府的强权存在一天，国家权力必然对人类实行不平等的统治，人类就不可缺少无政府主义（或者叫“人权运动”、“社会改进事业”等等）的出于善良人性的反抗；强权（既存的法律、制度）彻底摧毁人性的一天，就是人类命运的终结。这个无政府理想主义来源的人性就是“上帝意志”，所以我们说，除了“上帝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威，如果基督降生在现代，他是一个当然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受近代科学的启示，克鲁包特金高举科学的演绎归纳法，甚至痛斥圣徒保罗（罗马帝国的公民）在罗马强权下向现实低头，曲解基督教义，胡说“奴隶要服从自己的主人”（《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七章 社会的法律机能），同时也以实证数据的分析，探求人们从事分业（分工）的合理可能。克鲁包特金高度赞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称其为“反对国家干涉的斯图亚特学派”。1898年出版的《农园、工场与作坊》就是他的社会学论著，奠定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此书主要指出：近代经济学者们立于“地主、资本家等特权阶级从低廉劳动力那里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讨论财富的增加，必然不问“应该生产什

---

<sup>71</sup> 1992年笔者在东京一个高级旅馆的“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遭到神户大学雇佣的一个中国打手的突然袭击。我去医院检查鉴定并到警视厅报案，一个便衣和一个制服警察拍照笔录了3、4个小时，说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后来我再去追问，日本方面竟然谎称没有接到我报警的纪录，并警告我不要再追究此事！

么？”，“怎样去生产？”这个大问题，那么人类由科学进步激起的幻想（例如不被终生束缚于一种体力劳动而可以每天用一半时间工作，可不断变换农园、工场、书斋、画坊等等）就永远没法实现。涉及到具体的产业，例如英国农业的衰退，就是由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不合理政策所致（例如把土地租给有钱人作为游猎场）；另外，克鲁包特金也独具慧眼，对于被官权御用的经济学者们宣判了“死刑”的小生产、小工业也赋予在近代产业中的不可缺地位，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显得更加注目。

克鲁包特金的亡命生活影响了他，使他主要在社会哲学方面从事论述，除了《互助论》，较有名的还有《法律与强权》、《诉诸与青年》、《面包与自由》、《法国大革命史》、《俄罗斯文学史》<sup>72</sup>，但1903年于伦敦出版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无疑是他的代表作。克鲁包特金再次表明：无政府主义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梦想，而是存在与民众普通生活中的（尚没有形成制度的）道理，并且会永存于人类生活之中。在本文“一、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中，“科学家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类一员，他们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许多人拿国家的薪水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偏见，在大学里显然无法产生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别的社会主义、别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间，只要有民众运动，也只有在民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活力和创造性就（才）不会消失。”而所有既成社会制度产生的动力也来源于民众，“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使社会生存顺利可能，为了维护和平，为了调停纠纷，也为了互相协力扶助，做成了许多必要的制度。”这样，在任何时代中都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潮流，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反抗少数统治集团，拥护创造了不成文制度的大众的创造力，“今天，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少数政治家做成的法律不抱任何希望而借助于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众的创造力，努力于创建保障社会自由发展的新制度。……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本来为了平等、和平、互助而产生的制度，连其中最善的部分，也作古成了化石。这些制度违背了其本来目的，成为少数野心家支配的工具，逐渐变成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在

---

<sup>72</sup>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们在离别祖国后逐渐失去了诗歌的无政府主义热情，他们应多读读克鲁包特金，同时加强哲学知识。

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没法希望国家主义方面的良知来改进制度自身，只能由产生于民众运动的革命运动来改变。革命家常常有两种，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利益而在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时冒出的权谋骗子，这些人或因掌握权力丧失人性，或因运动处于低潮而卖身求荣，疯狂为统治阶级充当打手。但我们在反抗罗马帝国的法律中产生的基督运动中无疑看到另一种不可能被出卖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sup>73</sup>，无政府主义再洗礼派运动（即后来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今天新教的理论发祥）、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雅各宾党（这些人多被拿破仑利用去镇压过王党复辟）、直到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来自人类改进、制造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大众的建设活动中。

本人是科学家的克鲁包特金象拉普拉斯在《宇宙的体系》中推开上帝的假设一样，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头疼的康德、黑格尔式先验命题、辩证法术语等一脚踢开，而偏好于产生于十八世纪英法哲学中的演绎、归纳法。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复辟蔓延于欧洲大陆时，在英国诞生了无政府主义近代理论的基础<sup>74</sup>。实际上，正是依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传播才把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理（人身解放、法律平等、代议制选举）燎原开来，并影响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废除（1861年）和美国奴隶制度的灭亡（1862-63年）。与此同时，正是共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848年革命）挽救了近代科学，把科学从权势的附属下解放出来。包括孔德的实证哲学（社会学）、斯宾塞的综合社会学，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蒲鲁东在此基础上集大成，发展出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自由，也是全人类共同自由的同义语：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者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最终得到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发挥科学技术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才能排除在议会政治、国民普选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犯罪<sup>75</sup>。

---

<sup>73</sup>见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

<sup>74</sup>葛德文《政治正义论》。

<sup>75</sup>日本等西方的政治体制再“民主”，也无法克服金钱操纵等为葛德文深恶痛决的议会黑暗。



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如果要用一句来概括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历史、国家的本质，克鲁包特金如是说：“所谓国家，就是由地主、将军、法官、僧侣、资本家、革命家、人民公仆等等结成的，用于强权支配民众、榨取贫穷大众财富的社会组织。”而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际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削；所谓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一小撮新兴统治集团在独占经济资源基础上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压迫。所以，蒲鲁东在目睹 1848 年欧洲革命以来共和政府权力的犯罪后提倡由生产者、消费者联合成立的公共团体“法朗结”，其基础是利他式、互助式的个人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性质的自由大同，当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会最终获得自由。现代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织、变革，才能生存、发展。

[1993 年 2 月 14-21 日初稿于日本静冈三岛市，2003 年 11 月 11 日修订于美国圣荷西，2008 年 10 月 26 日再修订于美国圣拉蒙。]

## [付] 克鲁泡特金的亲笔短信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年12月9日—1921年2月8日），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安那祺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父亲是俄国世袭亲王，他被人称为是“安那祺王子”，但他抛弃了贵族继承权。他有许多著作，其中《面包与自由》、《一个革命者回忆录》和《伦理学》被巴金译为中文出版，影响过一代人。

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他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後，克鲁泡特金返回逃离41年的俄罗斯，1917年6月，75岁高龄的克鲁泡特金返回圣彼得堡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拒绝了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教育部长职务，致力于写作伦理学史。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列宁下令“每一个图书馆都要有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此书2006年由杨人梗译，华东师大出版，564页）以讨好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921年在莫斯科附近逝世时，布尔什维克特别打开监狱，放出安那祺主义者一天，与成千上万的人打着安那祺主义的黑旗为他送葬。

克鲁泡特金一生公正无私，胸怀坦荡，从不计较权力和物质利益，受到许多人的敬佩。罗曼·罗兰评价他在生活中实现了托尔斯泰追求的理想。王尔德说他是自己见到的仅有两位真正快乐的人之一。（以上主要摘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克鲁泡特金>）

2011年1月27日，我应 Alexander Akin 博士的邀请，参观他们的社会运动书店 Bolerium Books。这里有6千种有关美国劳工运动、西班牙内战、安那祺主义、同性恋权利等书籍和历史文物。我很感谢他们从网上订购了我的《安那祺主义文库》，又接受了我的其他出版书刊。我以前偶尔去乌克兰的安那祺主义出版据点 AK Press 选购一些安那祺主义

历史书刊，用中文写出介绍和评论，可惜他们只懂英文。而通晓中文的哈佛历史学博士 Alex 使我在美国进步运动的中心之一旧金山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归宿和依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事业要做。

他还显示 Bolerium 书店保存的 Emma Goldman 的两封亲笔信，让我感受到巴金所崇拜的“精神母亲”的战斗风貌。我在她的自传 Living My Life 中，颇为吃惊来自俄罗斯、没有受过美国教育的艾玛除了向失业劳工等公众鼓动热情、向挑剔的英文媒体挑战的犀利进攻，还能对大学的教授们（艾玛提醒他们：你们也是“无产阶级”智力劳工）讲解尼采哲学！这一封写给 Ben 的亲笔信，在艾玛的自传中也有记载，是无价之宝。可惜我对女权运动关心不够，有限的预算只能专注在安那祺主义，不适合收藏艾玛的文物。

当 Alex 向我显示克鲁泡特金的亲笔信（插图，背景是后人打印的内容）时，我一下子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导师、同志和战友本人。这是一封 1897 年 12 月 29 日署名的很短的便签，由 Max Thorek 博士收藏过，除了对信函说明外，Thorek 还专门写了满满一页的克鲁泡特金介绍。

信函全文如下：

Viola, Bromley, Kent

(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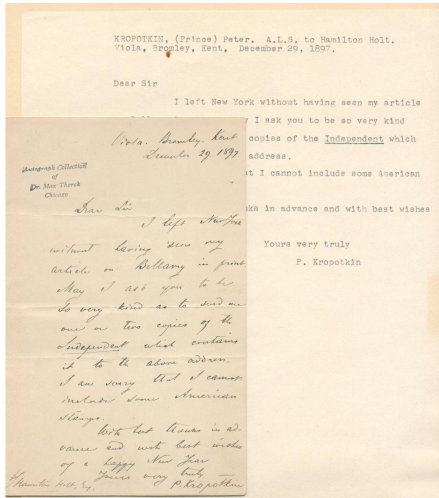
December 29, 1897

1897 年 12 月 29 日

Dear Sir

尊敬的先生

I left New York without having seen my articles on Sellamy in print. May I ask you to be so very kind as to send me one or two copies of the Independent which contains it to the above address. I am sorry that I cannot include some American stamps.



我离开纽约时没有看到我的关于 Sellamy 文章印出来。我衷心地请求您往上述地址寄给我一、两份印有我的文章的《独立》刊物。请原谅我不能寄给您一些美国邮票。

With best thanks in advance and with best wishes of a happy  
New Year

致以崇高的感谢并祝新年快乐

Yours very truly

您的真诚的

P. Kropotkin

彼得·克鲁泡特金

Hamilton Holt, Esq.

(收信人)

内容虽然简单，克鲁泡特金优美的英文（曾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安那祺主义和其他方面的条目，也在哈佛大学等演讲）、善良的处事人格、高贵的书写风格，一目了然，真是“见文如见人”。保有这样的历史文物，是一大享受。Alex 向我介绍刚来上班的 Bolerium 书店老板，他们欣然同意以优惠价格转让给我，由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保存。

我在 eBay 网上查到拍卖克鲁泡特金的类似亲笔信，标价\$2500。除了这封克鲁泡特金亲笔信，刚去世的原香港民主爱国运动支援联合会的会长司徒华挥毫“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几年来，一直挂在研究所办公室。华叔的书法，刚健有力（我支付了象征性的\$500 捐款），也有“文如其人”之魄力，也是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最贵重文化资产。

[2011 年 1 月 30 日]

## 9. 是社会性运动，还是政治性斗争？

### —— 由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想

普列汉诺夫(插图, G. V. Plekhanov, 1856-1918年)并不是思想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罗斯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家。早在1876年12月18日的示威中,学生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就锋芒毕露:今天,在全俄罗斯面前,为了表明与这里的人们的同盟,我们聚集在这里了。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上写:“土地与自由!”



逃过了沙皇宪警与哥萨克骑兵的追捕,普列汉诺夫逃到了西欧,主要在瑞士度过了长年的流亡生涯。在这里,他由反对沙皇专制的恐怖斗争转向面对大众的社会主义宣传,并达成了由巴枯宁向马克思的过渡。自《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以来,直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中的支配为止,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权威。而正是这样的先驱最容易为时代的潮流所摒弃,1905年尼古拉二世开枪屠杀莫斯科广场的请愿民众,普列汉诺夫却发出惊人的感叹:“要是他们(殉难者)不去夺取武器就好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普列汉诺夫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如声明“不打第一枪”的爱国主义者考茨基)一样,支持本国(俄罗斯)政府的战争政策。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普列汉诺夫回到自己为之宣传奋斗一生的“理想之乡”,除了新的权贵,他没有看到一个劳动者的踪影,几个月之后在芬兰悄然逝去。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写于1894年(我的读本为春秋社昭和3年(1928年)发行的迁润日译版),第一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以来的追求“完全立法”、“完全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发源的人性论“空想性”的批判,主要受基佐等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的启示:“基佐认为:最善的社会组织,根本没有探求完全立法的必要,现存的一切已经足够满意的了。而且,面对现存社会组织,反驳那些非难者的攻击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人性本

身。……人性本身就决定了法兰西不可能从事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真正改革。”与此同时，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也宣布了历史动力存在于人性之外的历史哲学之中。

在第二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普列汉诺夫归结到，只有卡尔·马克思克服了“空想”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虚无，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条件)解明了“财产状态”的神秘，完成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反过来看，那些枉费苦心的带有天才奇想的完全立法构想，那些探求可能社会中的最善组织的努力，还有甚么价值呢？准确地讲：毫无价值！这也同时证明了那些埋头于此类研究的人们缺乏起码的科学教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没有任何劳动党不服从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的鼓动言论，具备政治的战斗性，却疏远了科学性与社会性，把社会主义原有的广泛、生动、多彩的流源归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狭小、僵硬的现实要求之下了。

第三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历史展开及其观点”是本文的精彩部分，显出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真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来源可追溯到德国人斯特纳(MaxStimer, 1806-1856年)的《唯一存在与其所有》，首先开端于对宗教哲学的驳难，“斯特纳与他(费尔巴哈)完全相同，只不过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出发演绎出极端的、过激的结论与命题：神是幻想的产物、神是幽灵，这都不错，但你强求我们去爱的人类是甚么呢？不也是幽灵、也是抽象物、也是人的想象吗？你所称的人类，到底存在于何方呢？在人脑、人脑的何处存在呢？所以，唯一的存在，只是具备自己的欲求、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意志的个人而已。如此，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怎么可能去为抽象物人类的幸福而牺牲呢？你反抗旧神，对极了，却没有抛弃神学的见解，你为我们提供的(人类)解放，完全受到神学、神的支配的。”这个出发点可与尼采、叔本华并论，但其展开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以及那些资产阶级改良家、有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献身”、“救济”的自私本性。“共产主义者认为共同社会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但“我”才是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关于我的财产，才能与他人协议、契约。”面对国家，斯特纳禁不住大叫：强盗！“在国家里，不存在财产(即个人财

产)，存在的只是国家的财产，正如我的存在必须通过国家才能成立一样，我的财产也是通过国家才成立的。”

普列汉诺夫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斯特纳的难解的说教不抱任何恶意，反倒要说明蒲鲁东这个自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理论的粗俗，因为正是在蒲鲁东那里，提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差异。“权力的信仰，与神的信仰一样，既原始又普遍，人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产生了权威，即政府的萌芽。”“与秩序相当，与秩序同一的自由是权力与政治的唯一实在。秩序的同义语这个绝对的自由如何才能达成呢？可以通过对各种权力方式的分析达成学到。不管怎样，正如我们再不可忍耐人对人的榨取一样，我们也不能允许人对人的统治了。”国家不过只是人统治人的一种方便，“我要区别所有社会中的两种制度，第一是社会性制度，其二是政治性制度。前者存在于人的本性中，既自由也必要，随着其发展，就削弱、抛弃了本质上不自然的、一时的后者制度了。”“社会性制度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的组合，在其中实行利益的均衡并普遍地达到劳动、分工、合作、竞争、商业、货币、股票、信用、财产、交换的平等和互相担保等等。”“政治性制度的原理是权力，表现在阶级的差别、权力的异化、行政的集权、司法的分离，选举产生的主权代表等形态。政治性制度是为了秩序而设计、逐渐完成的，这是因为社会性制度尚没有存在的缘故。社会性制度的原理和法则，只有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刚刚发现，今天正成为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争议对象。”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性运动正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蒲鲁东从各种政治性斗争中发现出来，为了达到社会性目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织也必须否定政治性的制度利用：“政党的否定，权力的否定，人及市民的绝对自由。以上的三条中包含了我们的政治、社会的信仰宣言。”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的驳斥简单而干脆：既然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必然是政治性的斗争。至于蒲鲁东在经济学方面依据小手工生产者展开的设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明其激进革命口号中隐藏的最保守的期待，把他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区别开来的只是其精神的贫困、狭隘的气质，和对于一切真正革命的厌恶。在他的“政党无用、政治无用、国家无用”论的背面就赫然写着：“政治万岁！选举运动万岁！国家干涉万岁！”

第一国际的内部史就是围绕着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继承蒲鲁东对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区分，巴枯宁更专注于实际运动中的社会性革命与政治性革命的不同。看看那些无产阶级的议员吧！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完全被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包围，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不，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化(回到工区，学会了敲门而入，讲甚么“隐私权”等等)，为甚么呢？并不是人创造了地位，而是地位创造了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的驳难展开不如对斯特纳或蒲鲁东那样小心，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吸取的第二手理论来打倒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际阻碍(例如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出席社会主义的大会)，连列宁也批注道：“前一部分是历史文献，是关于斯特纳、蒲鲁东等思想的贵重材料，后一部分完全是诡辩，用杂乱的推理把无政府主义与强盗之间嘲笑得没有甚么区别。”普列汉诺夫在“无政府主义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的见解与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处”的结论下，在第四章“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称战术，他们的道德”、以第五章“结论—第三阶级、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之后草草收尾：“这样，以革命之名，无政府主义者为反革命效劳，以道德之名从事最不道德的行为，以个人自由之名践踏他人的权利。”并且他举例告诫那些糊涂成为无政府主义俘虏的劳动者：“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就会明白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其实不学无术，编造的理想不过是幻想而已。在资产阶级政治之外，有无产阶级政治与之对抗，这才是从根本上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

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本身也暗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1)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理论、(2)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实践斗争这两方面的差异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简单武断的判决，更进一步影响到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苏联国家政权内的残酷斗争，以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争夺国家权力的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看来，我们没有权利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胡志明他们的选择有甚么错误，因为时代环境(主要是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同，但我们起码可以指明：政治斗争并不能代表一切，不可能完成必须经过社会性连动才能达及的许多方向的社会改进。特别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更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性斗争的限制，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1)中共党内的权力之



争；(2)几乎只在海外进行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的方向性迷误，都在迅速地远离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

自邓小平南巡至中共的十四大，海外媒介(包括《中国之春》)竟倾注大量篇幅去登载、评述甚么人的儿子的“写作班子”的甚么“纲领”，表明关于中国政治动向的风流本身已经没有甚么可值得一顾的文字了。过后李梁先生邀我就中共的十四大写点评论，我一无兴致，二无精力去耗费在中国社会分析的表层时髦上。最近由《民主中国》等媒介略知“民联”、“民阵”两个组织的政治性活动的挫折(此挫折或其成功，意义都不宜渲染)，那些投身于政治性斗争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们，有几个人理解政治性斗争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或力量这一方向呢？当然，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在民主力量主导国家权力之前，彼此先争吵一番可以避免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之间落得托洛茨基、刘少奇那样的命运，在今天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组织中也会产生一些由此获得经历的人才。但我依然坚信，以八九中国之春为代表的中国的社会改进运动，是由以下三种缺一不可的要素构成的：(1)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基本人权的保障；(3)为达成全民族幸福的自我献身的爱国主义。我们说：为甚么它没有消沉也不可能失败，因为它不仅只是政治性的斗争(当然也很需要)，更是社会性的，拯救每个个人的社会性运动。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3年10月]

## 10. 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

安那祺-工联主义 Anarcho-syndicalism 来源于法国，早期瑞士的由钟表业技术工人组成的汝拉联盟 Jura Federation 就是在第一国际中反对马克思的权威主义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主要代表。在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总工会成为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最大实践。自然地，安那祺-工联主义在南美最早（也曾是最大）的劳工运动-阿根廷劳工运动中，也扮演了领导角色。

阿根廷是南美大国（现有 4 千万人口）中欧洲移民（绝大部分是西班牙裔和意大利裔）占绝大多数（97%）的国家，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最强<sup>76</sup>。阿根廷的国家格言“联合与自由”听起来也很象一个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团体的口号。特别是 1871 巴黎公社失败后，大量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移民流亡到阿根廷，促进正在兴起的劳工运动组织起来<sup>77</sup>，特别是加强与第一国际的联系。第一国际解散后，亲巴枯宁派成立工人宣传圈，发行“见解”刊物，是阿根廷第一个安那其主义团体。早期的社会主义纲领都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1896 年成立的社会党中有工会的代表，但他们只能就工会问题投票。

1902 年 11 月阿根廷爆发了第一次总罢工，1904、05、09 和 10 年又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大罢工，仅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907 年就有 231 次罢工，人数达 169, 107。受 1910 年总罢工影响的政治危机促使 1911 年当上总统的 Saenz Pena 进行政治改革，导入秘密投票方式和投票义务，增加选举人数（从 1910 年的 191, 000 人到 1912 年的 640, 852 人，虽然还没有妇女），扩大社会阶级的代表性，让劳工运动通过社会党在国会得到发言权等。此后，拒绝议会政治的传统安那祺主义失去锋芒，不拒绝政府的工联主义成为移民成分很大的阿根廷劳工运动（1914 年移民人口占

---

<sup>76</sup>除了西班牙内战等来自西班牙的影响外，意大利安那祺主义对阿根廷也有特殊的影响。意大利最著名的安那祺主义者 Errico Malatesta 1885-1889 年在流亡阿根廷期间，特别在面包工人之间组织工会。见 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77</sup> 1869 年的普查中，有 1, 014, 075 名产业工人。Ronaldo Munck, Ricardo Falcon and Bernardo Galitelli, *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 Zed Books, 1987. p. 20. 以下引用也来自此书，不一一指出。

30%)的主流。同时，以广泛政治参与和实质民主改革为口号的激进党迅速发展，赢得了1916年的总统选举。

1916年以后，（男子）普选、劳动立法和社会福利扩张了政府功能，政府也直接通过国家劳工厅（1907年成立）与工会和雇主谈判，调合阶级矛盾。在1916年11月的海员要求加薪的罢工中，雇主拒绝谈判，内务部长谴责雇主，受总统委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总监做出有利于海员的裁决。这是阿根廷政府第一次保护劳工的权益，但政府对罢工的态度并不一致，得到社会党和工联主义工会FORA（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IX（从1915年的2万增加到1920年的7万成员）支持的罢工比较容易成功，而外资企业的罢工、与安那祺主义工会FORA V相联系的罢工、还没有投票权的移民劳工的罢工比较不利。政府越来越偏向于雇主，终于发生了1919年1月的总罢工惨案周事件。这次罢工由FORA V发动2万劳工参加，没有得到FORA IX的支持。保守势力渲染罢工是政治性的“布尔什维克阴谋”，政府出动了军队镇压，最终有7百人遇害、4千人负伤。

自从这次事件，职业军人开始直接登上阿根廷的政治舞台。这成为南美政治的常见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派通常不能控制稳定的政局，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政治家通常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军队作为维持秩序的力量就必不可少。

布尔什维克革命为阿根廷劳工运动带来了冲击，新成立了共产党工会，但规模不大（数千成员）。FORA IX最终停留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而没有加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FORA V最终也决定遵从已经解散的第一国际的路线。阿根廷劳工运动从1920年开始衰退：FORA IX 1921年的11次大会确认有46,562成员，FORA V从1920年的号称18万成员减到1923年的6万、1929年的4万成员。1930年以后，阿根廷的经济扩张（产业结构从纺织到金属/机械转换）和城市化进一步肢解了旧的劳工组织，新成立的工会在军人政变和维持宪政的交错中宣布政治中立，为具有政治抱负/野心的军官庇隆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庇隆 1930 年代后期作为军事观察员曾在意大利服役，目睹了第二次大战前欧洲的社会、政治动荡。1943 年 5 月，陆军上校庇隆在军官联合小组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声名鹊起。同年 11 月，他被任命为（由劳工厅上升来的）劳动和福利部的部长，建立起与劳工的联系，成为他的重要政治资本。庇隆随即被任命为副总统兼陆军部长，但 1945 年 10 月 9 日在军队内部的反对声中被迫辞职，并一度遭到逮捕。这时，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庇隆马上得到释放。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举行的大选中，他以 56% 的得票当选总统。庇隆上任后采取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大规模扩张了工会的数量和功能。在他帮助下建立的劳工总同盟 CGT 简直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没收了外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在阿根廷的大量资产，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于 1947 年颁布了旨在发展国有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称自己的路线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庇隆主义”。

安那祺-工联主义融入庇隆主义，工会在政治上帮助庇隆的复权，在经济上得益于政府的保护。例如 1936-40 年间阿根廷只达成 46 项劳工的集体谈判合意，1944 年一年就达成 421 项合意。在庇隆被赶下台的期间，阿根廷政府也无法废除基本的劳工保护条令，避免了邻国智利那样的军事独裁和严重的人权犯罪。

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阿根廷民众学习西班牙内战中的劳工，重新用安那祺-工联主义武装自己，实行工厂的自我管理。特别在南部的贫穷省 Neuquén，工人们开始一个一个“解雇”厂主、自己管理工厂，到 2005 年几乎控制了全省的工厂。在 2001 年的经济危机中，阿根廷工人们“恢复”了对两百个工厂的自行管理，转换成互助型合作社，著名的有 Brukman 工厂、Bauen 旅馆（附图）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法庭等）的同情、帮助很有必要，至少没有出动警察、军队来对付占据厂房的劳工。与此相对，2008 年金融危机时，在日本东京品川车站前的本来经营得很正常的京品旅馆突然宣布破产，



因为其主要的股东与华尔街倒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必须抵债。旅馆的员工们试图自主经营，被接到法庭判决的警察强行驱赶。<sup>78</sup>

2004年，那个著名的演员州长跑到硅谷，在圣何西市中心的 Adobe Systems 公司召集斯坦福大学校长等各界名人开会讨论“恢复加州经济”，各媒体也云集会场。我所属的劳动党联合当地的工会、教会、和平中心等组织召集包括失业人士、反战人士、无家可归者在内的民众前往“赴会”，抗议为了利润裁减雇用的美国公司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有人打出阿根廷劳工自治管理的标牌。可怜的美国劳工们接管 Adobe 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的梦都没有做过（我在 Adobe 时组织员工跨部门的乒乓球比赛等活动，试图建立工会，结果在裁员时被首当其冲）。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震源中心的美国，我们都羡慕有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的阿根廷。

[2010年10月30日]

---

<sup>78</sup> 《かけはし》2009年1月12日号“京品ホテル闘争支援集会：立ち退き仮処分を全国の労働者の力ではね返そう”、1月26日号“東京地裁による京品ホテル明け渡し決定を許さない”。

## 11. 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人权就是人权，既没有什么来源，也不需要任何来源，不论它叫君王、国家、还是叫什么教会、政党，或者称为“理性”、“良知”什么的。确切一点，可以把人权定义为：在现实的社会契约状况下仍然保有的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或者，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就是社会性（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政治性”）的动物。

为了清楚一些地说明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有必要借用物理学中的“理想试验”的方法，即把实际中必然存在的物体（如空气）排斥在外，只讨论相关物体（如苹果与地球）的引力关系（重力加速度  $g$ ）。这种基本的科学认识的方法，与牛顿同时代的卢梭、霍布斯已经做过了。而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给“理想实验”中的每一个人都赋予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和资格、设定了完全相同的条件，由此我们首先可以断定：人权的本质就是作为人的平等权利，为了个人的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契约、建立社会。但是，社会一旦建立，人就面临着各种不平等的社会条件的制约，而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仍然必须保留的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就是人权的自然属性。例如我们可以举出生存的权利、信仰的自由、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等等。请注意，任何最基本的自然属性都离不开社会属性的制约，人当然要生存，但他一出生下来能离开父母吗？人类的进步就是指自然属性得到更大发挥的过程。

关于人的自然属性没有多大的异议，人权一词之所以成为热门的国际政治术语，乃是因为其社会属性太复杂、丰富。人权本身是一个整体，其社会属性不过是自然属性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要求和表达而已。在古罗马隆盛之后，以法律制度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这个文明就开始区分“罗马法”和“自然法”（也称“万国法”）的不同，因为行省的外族人必须用新的法律去统治。行省的外族人享受不到罗马人的权利，但也该享有一些“自然”的权利——当然，这些“自然”的权利也是罗马人认为是“自然”即天赋的，实际上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

限制的。关于人权的社會属性尽管争议很多，但可以指出：拥有私有财产是人权社會属性中最重要的因素。

偶然拜读严家其先生的《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除了对其文的“人赋人权”这样的用词感到不便外，此文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财产权定为“天赋人权”（即本文中所述的人权的自然属性）。我估计，恐怕是受民主中国阵线纲领中“发展私营经济”原则的影响。我个人对这一条敬而远之，免得受到经济学者的嘲笑。但从社會学的角度看，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都是通过社會制度的不平等关系获得的。既然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程度不同的人对人的支配、压迫、欺骗关系，任何形式的“合法”所得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罪恶的社會属性。说的更准确一些，财产的本质就是盗窃，虽然在现在社會中，又被统治阶层加上了强权（其本质是抢劫）和名誉（其本质是欺骗）的装饰。当然，从概念上区分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社會属性，丝毫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就不该、不必受到社会的保障。恰恰相反，人类发明了一种叫做法律的强制性契约形式来保障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个人的社會属性。我们知道，靠刺刀、炮火推行于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法典》，就是把私有财产从教会的任意掠夺中以法律保护起来。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到圣赫拿岛还能自嘲的就是这部《法典》：“我指挥过四十多次奥斯特里茨那样辉煌的战役，都被滑铁卢一役冲毁了，只有《法典》是永存的。”如果说人权是否受到尊重是社會文明的标志的话，人权的社會属性的保障程度就是最明显的“晴雨表”。

人权的社會属性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其每一个方面的论述又都必须联系具体的社會关系，我在此想以中国的情况略为分析一下人权的社會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主权中的个人人权属性。兴许，只有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得到人权保障的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人权与主权的關係：人权是主权基石，一个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谈不上主权的尊严。由此可以推论到：只有在日本为维护中国人的个人人权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维护中国主权的爱国者。有时候，读到有些成为美欧的二、三等公民的中国人写着“人权高于爱国主权”之类的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日本，中国人的人权与爱国主义就是同一个本质。

为什么说人权是主权的基石呢？因为个人的人权是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的，但国家主权却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形态总是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权国家”是指近代以来，伴随产业革命（英国为代表）和民主革命（法国为代表）而确立的，以民族（语言、信仰、地域等等）为单位形成的“国民（或民族）国家”。苏联的消亡表明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国家形态的失败，其中的内部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保障“主权国家”内的个人的人权。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曾经有过不少国家形态的变化，之所以在现代形成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态，也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保障中国人个人的人权的要求，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人权，我们才同意组成以民族、地域为单位的国家：像苏联那样，当这个国家成为侵犯人权的暴力机构时，我们没有必要承认它，它也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对于中国的情况，我们必须防止苏联消亡的结局，使共产党上层集团的变动不至于带来共产党全体的解散，使共产党的解散不至于带来政府的解体，使政府的解体不至于带来中国国家的消亡（否则，我们留在日本的中国人首先就丧失了一切）。

由于中国的国家主权没有被正当地用于中国人人权的保障，才使得在国外的中国人的“国际地位”甚至不如伊朗、菲律宾、玻利维亚。例如伊朗人三个月内来日本不需签证，但中国学者来日本出席、主持国际会议，十五天的入境签证也必须有日本人的“保证书”！那么，我们会奇怪：拥有核武器、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又对日本有如此之恩义的中国主权跑到哪里去了呢？试想，如果周恩来总理先生来日本时，也被要求出具日本人的“身份保证”，他还会出卖民族大义宣布“放弃战争赔款”吗？正是由于缺乏人权的基石，中国的主权才不能得到维护，更有甚者，中国的主权被不当地用于向日本人“施压”来迫害中国人，使中国再次面临丧权辱国的危机。

去年十一月初，北京的国务院政府发布了一个《中国的人权现状》白皮书，就是一个以国家强权抹杀个人人权、曲解国家主权的例子。理解其文为什么贯穿着“强权就是真理”手法的关键首先就是概念：此文并不是论中国人的人权，而是完全抛开人权的自然属性，提示社会臣民所可能有的“人权”。我们知道，白皮书中所指称为“人民”的不包括



地、富、反、坏、右，也不包括政治犯，随着时代的不同，甚至连国家主席也不是“人民”。“人民”的资格是人权可以剥夺的，也有的人干脆反感“人民”这个词，我们看到：去年有许多国家名称中的“人民”字眼儿被取消了。但中共政权对于他们称的“人民的敌人”是不讲人权只讲专政的，连呼吁人权的自然属性也会被剥夺自身的人权。共产党政权先把“敌人”排除在“人民”的范围之外，就可以永远伟大、正确地宣布它受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的支持了。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指政府的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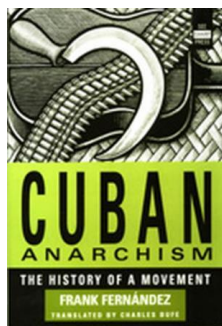
其次，就人权的社会属性而言，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哪一项不是中国公民通过自身的奋斗、牺牲换来的呢？包产责任制是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首先施行的；提到差额选举，笔者一九八三年就是因为反对清华大学校方当局当时控制学生会选举、反对等额选举而被撤销了中共党员预备资格，毕业时被发配边疆。一九八四年以后实行的差额选举怎么能说是政府当局的赐与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维护人权的奋斗，陈独秀先生可以被称为中国人权运动的先驱。而他晚年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其“平民思想”，又表明人权在中国的艰辛。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运作的困难，为其每一个微小的成熟之处，包括此白皮书的公布，表示应有的热情，因为本身表明了中国八九民运对人权的追求不可能被镇压或出卖。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追求社会性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完全与拯救祖国危机的事业的结合，也就是说：人权活动家通过对个人的人权来争取全体中国人人权的改善。这对一些以反对“人权的双重标准”在从事他自身的“人权”地位的社会人士们，也应该是一种启示，一种反省。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5月]

## 12. 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与教训

自从1959年卡斯特罗掌权以来，地处美帝国眼皮下的弹丸之地古巴一直是世界局势的热点之一。从1961年的猪湾登陆入侵、1962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不断发生的难民逃亡<sup>79</sup>、签名改革事件<sup>80</sup>、教皇访问<sup>81</sup>，委内瑞拉等中南美洲国家反美政权的兴起，卡斯特罗的身体状况以及前两天胡锦涛的到访，都不断引起国际注意。国际上的关注多集中于卡斯特罗何时死去、古巴的一党专制如何终结、以及美国的制裁如何完了，除了西班牙语世界，没有多少人关心、理解、知道古巴短短的历史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牺牲。



Charles Bufe 翻译的  
Frank Fernandez 西班牙语原著  
《古巴安那祺运动史》<sup>82</sup>是关于  
这个主题的权威文献。这本简  
练的记录从1865年开始，因为  
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结局，阻止



<sup>79</sup> 1980年4月4日凌晨，有一小群古巴民众冲入哈瓦那的秘鲁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秘鲁政府拒绝交出这些人，古巴就撤走了警备。当人们知道此事后，有上万人涌到秘鲁大使馆要求避难。这是对卡斯特罗统治集团的严重挑战，卡斯特罗不得不亲自发布声明，允许任何想离开古巴的人走掉。几个星期内，有三十万左右的人乘船逃到迈阿密。

<sup>80</sup> 2002年5月10日，有1万1千人向古巴议会递交签名书，要求就一党专制和一些基本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全民投票，被国际上称为“Varela行动”（Varela是古巴19世纪的传教士）。美国前总统卡特为此访问古巴，面见卡斯特罗，希望古巴政府不要因此镇压签名者。卡斯特罗以技术困难（无法一一证明签名人的真实性等）为借口拒绝签名书，反而动员大众，就是否坚持“社会主义”进行全民公决，达到“永久坚持社会主义”（即一党专政）的目的。见笔者“The Cuban Question”，<http://cpri.tripod.com/cpr2002/cuba.pdf>.

<sup>81</sup> 与在别的中南美洲国度一样，天主教在古巴仍然有广泛影响。

<sup>82</sup> Frank Fernandez, Cuban Anarchism: The History of a Movement. Tucson, Arizona: See Sharp Press, 2001.

了美国南方把古巴吞并的企图，迫使古巴走上从西班牙分离的独立道路。幸运的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古巴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接触到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自由社会主义，其最具代表的人物是 Roig San Martin (1843-1889)。



Martin 先投稿于古巴最早的具有安那祺倾向的刊物 El Obrero《劳工》，并在 1887 年 7 月 12 日开始发行更有影响的 El Productor（《生产者》，见插图），特别在烟草工人中组织宣传。1887 年 10 月 1 日，具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古巴劳动者协会在哈瓦那成立，签署六点声明，互相支援，组织罢工等。1890 年 5 月 1 日，大约 3 千名劳动者在哈瓦那成功举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显示出在拉丁美洲世界中最先进的工人运动。

1895 年，受到佛罗里达的商界支援的古巴独立运动在 Jose Marti 的指导下爆发成战争，持续数年。Marti 作为“自由斗士”，向安那祺运动作出许多承诺，把大部分战斗性很强的工人拉入“独立”战争中。这是刚成型的古巴安那祺运动第一次面临“社会革命”与“政治斗争”的选择，其结果是惨痛的教训：社会经济方面，没有达成任何成果；政治上，很多人附属于支配“独立”战争的资本家阶级，为其付出了牺牲，独立的安那祺运动不复存在，而“半独立”的古巴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却受控于美国的帝国主义。1899 年 12 月，当著名的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者 Errico Malatesta 从美国赶到他为之战斗的“独立”古巴，却被占领古巴的美国军事当局告知：“西班牙统治时期制订的禁止安那祺主义宣传的法令仍然有效”，Malatesta 不能在古巴讲演。当美国最终允许“古巴共和国”于 1902 年 5 月成立时，古巴的宪法却被塞入一条 Platt 修正案，其中规定美国可以随意视政治、经济条件变化干涉古巴和其他原西班牙殖民地事务。

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又得重新出发，再组织罢工、游行、宣传等，当“自由/免费教育”运动的创始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教育家 Ferrer 在 1909 年被处死时，引发了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公开抗议活动。1910 年墨西

哥革命的爆发，对古巴蔗糖业工人的政治觉悟影响深远。第一次世界后，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得以发展壮大，在1918-19年的哈瓦那，就组织了四次总罢工；在古巴的不到3百万总人口中，有8至10万的工人属于安那祺—工联主义派。1925年8月成立的古巴全国工人协会CNOC代表128个组织的20多万工人，其结构、章程和原则，都强烈受安那祺—工联主义影响，而刚成立的古巴共产党PCC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派别。不过，训练有素的古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蓄意夺取CNOC的领导权。据不同的参与者证实：“共产党人象对付Machado（古巴总统）一样对付安那祺主义者。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消灭CNOC中不是共产党的所有成员，即使把他们出卖给Machado的警察也在所不惜。”（p. 57）在CNOC的优秀安那祺领导者Lopez和Varona被绑架暗杀后，共产党彻底掌握了CNOC。剩下的仍然坚持安那祺—工联主义的FOH工会，在1933年被在苏联指令下的古巴共产党分子火力攻击，彻底终结了安那祺与共产党的本来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1933年，在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强人Batista上校推翻腐败的Machado上台。Batista没有政治势力，提出“左翼民族主义”的腔调，拉拢共产党，操纵选举，共同排斥安那祺运动。例如，刚通过的“50%”法，规定业主必须雇佣至少一半以上的古巴人，迫使众多西班牙身份的安那祺主义者离开古巴，削弱了安那祺主义运动。

1940年古巴的新宪法取消了Platt修正案，从政治上摆脱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的借口，在社会经济上也实行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例如，允许安那祺运动独立合法化。安那祺主义者解散两个主要的组织SIA和FGAC，联合成立“古巴自由主义协会”ALC<sup>83</sup>，安那祺运动又恢复活跃起来，在1948年举行的全国会议上，有155个代表出席，著名的老朋友Augustin Souchy<sup>84</sup>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AIT出席讲演。从现

---

<sup>83</sup>Asociacion Libertaria de Cuba.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为了回避迫害开始用Libertaria（自由主义）一词，与安那祺主义同义。197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Libertarian Party（自由党）与安那祺主义完全没有关连。本书译者在开首专门说明这一点。

<sup>84</sup>见赵京：“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2003年10月23日。

存的文献记录中，可以读到反对共产党、反对天主教、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美苏帝国主义的纲领。

1952年，已经下台的Batista发动政变，推翻了腐败的Prío政权，古巴共产党和控制古巴工人联合会CTC的领导人默认或支持政变。随着Batista独裁和腐败的加深，冒出来一个出身资产阶级、本身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律师政治家——卡斯特罗来填充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卡斯特罗并没有打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牌子，只是要恢复1940年宪法。他的“M26J”（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吸引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安那祺主义者，也接受古巴大资本家如Hermanos Babun Ship Builders等的数百万美圆的资助。他的所谓“山区游击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得到贫穷山民或“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主要是为古巴资产阶级服务的。

尽管有安那祺主义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罗与Batista一样，只关心权力，不尊重承诺，但几乎所有的Batista的反对派都认为卡斯特罗是必要的、暂时的、可控制的政客，但卡斯特罗证明他超过了马基雅维里。Batista逃走后，卡斯特罗凯旋进入哈瓦那，成为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他成立各种“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先把Batista派，再把中立派肃清，并恢复被1940年宪法废除的死刑，由超法律的刑警队执行枪决。他派出共产党员到工会来“暂时”帮忙清除Batista分子，却永久地占据着位子不再离开。古巴被迅速落入红色恐怖中。

最著名的是Manuel Urrutia法官的命运。Urrutia同情M26J，被M26J任命为革命政府的总统。但是，Urrutia反对共产党控制政府，并拒绝“任命”卡斯特罗出任“最高革命领袖”，结果被污蔑为“贪污”，被迫辞职并逃到外国的大使馆避难。此后，卡斯特罗过去的那些“亲密战友们”，包括起义军司令，都被逮捕或枪决，几乎所有反对Batista、支持M26J的有实力的人物都被肃清。在这个推动古巴转向斯大林（列宁）一党专制的过程中，卡斯特的弟弟劳尔（国防部长）和切·格拉瓦（国家银行行长）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卡斯特罗嫉恨格拉瓦的国际声望，趁格拉瓦去刚果推行“世界革命”在非洲丛林作战之际，卑劣地公布格拉瓦的遗书，使得回到古巴休整的格拉瓦发现自己已经被标为“烈士”，无法出现在古巴公众面前，

只好再次离开古巴，去丛林战斗，最终被玻里维亚军队杀害<sup>85</sup>。在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下，可以想象古巴的政治生活。CTC 被改名为 CTCR（古巴革命工人联合会），在 1959 年底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在 2854 名代表中只有 265 名共产党代表，但革命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卡斯特罗亲自出面，主导大会，改组机构，葬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自己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古巴的工人阶级由此被绑架在政府的机器上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卡斯特罗奴役工会的机会主义者，最终被卡斯特罗以同样的“反革命活动”关押起来，或流放国外。

1960 年 8 月，Souchy 以农业专家的身份<sup>86</sup>应邀访问古巴，他在考察期间，对于古巴农业的苏联化模式感到不安，批评这种缺乏个人自由、个人动力的集中化会萎缩农业。他的“古巴革命见证”被印为小册子发行，但当他离开古巴后三天，就被政府收集起来全部烧毁了。幸好此文后来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发表。1960 年 12 月 15 日，ALC 的机关报在最后一期中对古巴革命出现的专政（专制，独裁）提出警告：“所谓工人阶级的集体独裁，或者用今天的时髦用语，叫人民专政，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用语。因为各种专制，包括人民或无产阶级专制，都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而不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权力。独裁者不仅对被镇压的政治、社会阶级有绝对的权力，同时对所谓的执政阶级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权柄。不论你怎么称呼，从来不可能有一天实现一个叫做工人、无产阶级、平民或学生的专制。独裁者的权力落到每一个人头上：资本家、地主、种植园主以及无产阶级和一般的人民，也包括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革命家们’。”（p. 85）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一党专制的卡斯特罗政权，以革命之名实行的是任何革命的敌人（包括美帝国主义）都不可能施行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种红色恐怖中，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1 年 4 月 17 日策划的“猪湾登陆”作战遭到可耻失败，成为卡斯特罗彻底镇压古巴一切反对派的

---

<sup>85</sup>这也成全了格拉瓦。今天，他成为许多中南美洲民众心目中的耶稣（救世主）。即使在美国的墨西哥裔聚集的场所，也随处可见格拉瓦的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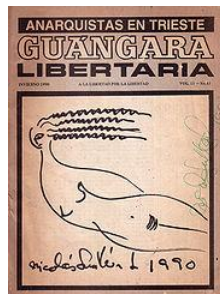
<sup>86</sup>Souchy 写过《以色列合作社》小册子，对犹太人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 Kibbutz 进行过考察，广为人知。

借口。过去在 Machado 或 Batista 独裁政权下，人们还可以声称自己中立或不管政治而生存。现在，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民只提供四种活着的选择：执行枪决的刑警队刽子手、顺从国家独裁的奴隶、监狱犯或者流亡。卡斯特罗在 5 月 1 日劳动节，无耻地宣称自己终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式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为向斯大林式专制体制的转换。令人震惊的是，安那祺运动领袖之一 Manuel Gaona Sousa 于 1961 年 11 月 24 日发表“古巴自由主义者的澄清和宣言”，彻底背叛他自己的历史和同志，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卡斯特罗体制。后来流亡的古巴安那祺人士们，成立流亡自由古巴运动（MCLE），不得不异常艰难地面对古巴政府和 Gaona 这样的叛徒的国际宣传攻势，几乎没法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多数安那祺主义团体）的理解和支持。Abelardo Iglesias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中悲愤地呼吁：“剥夺资本家的资产，把它们交给工人和职员，这叫革命；但是，把它们转化为国家垄断而生产者只有服从的权利，这叫反革命。”

（p. 101）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连这一最基本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都不知道吗？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在经历被出卖、镇压、流放的命运后，又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包括安那祺主义）歧视、偏见、诽谤的受害者！

通过古巴这个典型的个例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一党专制是卡斯特罗统治的本性，而“社会主义”只是挂在门前的羊头以维持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不管它叫“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花样）不仅与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即安那祺主义）毫无关联，反而是极端对立的畸形堕落制度。这对我们理解苏联的形成和消亡以及今天中国的走向，都极具参考价值。

流亡在迈阿密的古巴安那祺主义者们最后的奋斗是于 1979 年 11 月创刊 *Guangara Libertaria* 季刊，一直坚持到 1992 年秋天，总出版 50 集，印刷 225,000 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进步运动终于对卡斯特罗体制、对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来得太晚，很难对古巴的安那祺运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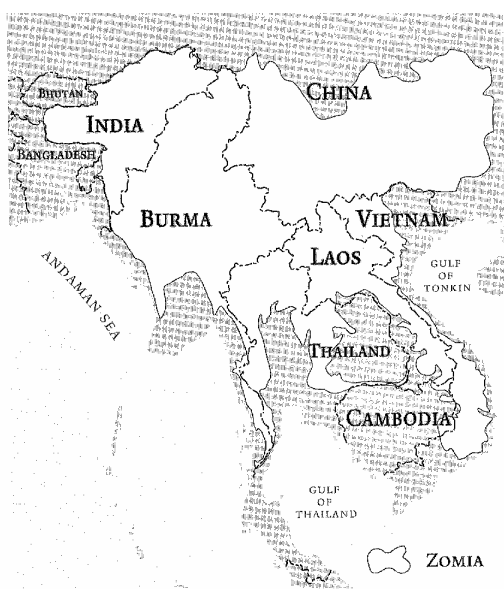
恢复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我们确信，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展开的安那祺运动所经历的希望、挫折、失败、再希望的过程一样，只要人类渴望自由，就一定会见证安那祺主义的复兴；吸取了惨痛教训的安那祺主义在复兴中，会学会重新组织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更公平、更自由的社会秩序。

[2008年11月24日 美国圣拉蒙]



## 14. 当代人类学力作揭示的山地东南亚的安那祺史观

我在读克鲁泡特金自传时，很想往他在俄罗斯边疆西伯利亚考察时梦想建立远东共和国的经历。读完《不被统治的艺术：山地东南亚的安那祺史观》<sup>87</sup>，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在此书中研究的 Zomia “茁密阿” 山地（见图。第 17 页。包括几乎所有缅甸和老挝、大部分泰国和越南、印度东部、柬埔寨的东北角和中国的云南、贵州、部分四川和重庆和广西）度过的岁月。



1970 年夏天，外祖母带着我离开北京，到远在贵州毕节（云贵川交界处）的父母身边上学。我们乘三天的火车经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到达贵州的贵阳，再转乘一天的汽车到达毕节的专区城里，见到从山里的师范学校步行一个多小时赶来接我们的母亲。

我父母大学毕业后自愿从北京和重庆来到贵州工作，到毕节创建师范学校，为山区培养中小学教师。我也随着大人们修过公路，学校有一辆马车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城里。马车夫是“工人贵族”，耀武扬威，因为

<sup>87</sup>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James C. Sco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书名虽然是 history（历史），书的内容其实是用新的人类学方法论重新解释东南亚山地的历史。书的扉页引用 Pierre Clastres, *La societe contre l'etat*: “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就是反抗国家的历史。”

人们免不了要请他在城里买些油盐酱醋的，我们小孩更巴不得有机会能坐上一趟马车，好像自己也进入《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的角色了。

我到了以后，学校为我们这些教职员子弟开办附小，也招收附近的农民子弟。虽然到处可见夏天也穿戴浓妆厚帽的苗族妇女，来读书的都是汉族或汉化的农民子弟。有些农民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就带来米、鸡蛋等。因为山民孩子没有出生纪录，报名时只要左手过头能摸到右耳，就算合格了。开学不到几天，班上一个大女孩就退学了：她出嫁了。我的山民同学几乎没有连草鞋也不穿，终年只有一套衣裤。有时候，我的雨鞋陷进雪地里，还得靠光着脚的同学为我拔出来。

师范学校有不少苗族学生，都非常纯朴。有一次冬天清扫校园，我和小孩同伴们烧掉草木。一个衣着单薄的学生过来烤火取暖，被我臭骂一通：“老子点的火，让你来烤？”没想到这个20来岁的男子竟然向我这个7、8岁的毛头小孩道歉，使我突然良心发现，赶快赔罪请他烤火。这倒是个“北京文明”与贵州山民的遭遇经历。其实，许多苗族人生生会讲三种语言（我为了学习中日英文，不知费了多少精力！），他们在越南的同族（Hmong），那时正在苗密阿的最南端与超级大国美军“并肩作战”呢！

有一个留校的苗族年轻教师，在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和批斗会上少不了他。在批斗会上，学校里的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土匪”分子非常老实，但那个右派分子（一个名校物理系的毕业生）从来不肯低头认罪，一般老师们都“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有这个鲁莽的苗族汉子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上阵，强行按下右派分子的头。这是吹到贵州山沟的北京政治文明。

学校没有围墙，在教学楼、教师住宅和食堂之间就是农田，也有几户农民。有一个叫王老五的农民因为偷盗经常出入公安局，恶名远扬，我们小孩都不敢靠近他。不过，有一天冬晚，我去热水房打开水，看见他光着脚也来接开水，被烧水工大骂一通。他可怜地哀求道：“张大爷，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从来没有偷过学校的东西。天这么冷，我家又没有火，老婆叫我来，请让我接一点开水回家吧！”但张大爷立场坚定，就是不肯。我很想让一点开水给他，但没有那个勇气。这与我刚学

到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农民阶级自发势力严重”等政治教育很不合拍。还有另一件事也显出贵州人的开化程度：毕节地区有一个很穷的赫章县，出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他去北京开会时，连发给他的铅笔、本子也还给大会，以为是国家财产不可贪污。他回来给我们作报告时炫耀他如何学聪明了：把人民大会堂的碗筷也带回贵州！

1974年，我们家搬回父亲的老家四川重庆。我的班上同学每人送给我一样最好的小礼物（铅笔、橡皮擦等），有几个同学还逃课到汽车站来告别。但我在新的环境里，刚开始不被接纳，因为同学们歧视我是“贵州山儿”，我理解到为什么贵州人普遍恨四川人“奸得狠”。这是人类学所指的“内殖民化”（汉化）经历的后遗症。此书中引用的数据（p. 138）显示，四川在960年（“十国”时期）之前和1279年（元朝）以后很少起义纪录，但在这之间爆发了46次起义，可以说在此期间完成了汉化的过程。而贵州在1368年（明朝开始）以前没有起义的纪录，在明朝期间（到1644年明朝灭亡）爆发了91次起义，这同时也是汉化过程的见证。还没有完成（或还在抵抗）汉化过程的藏族因为形成了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不在具有安那祺特征的苗密阿圈内。苗密阿山民主要是动物崇拜，近代以来开始接受基督教，以抵抗平原的各种宗教入侵。<sup>88</sup>

我二十多年前在大阪大学人间科学部社会学专业学习时，就觉得隔壁的人类学专业不是一门“科学”。日本的人类学实际上是东南亚研究，与我到日本研究“先进社会”相反。因为日本的经济奇迹，依靠从东南亚进口原料，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ODA（政府开发援助）给这些过去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招收了不少东南亚学生，培养亲日派。当我刚从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杂志2011夏季第56期读到Graham Purchase对此书的书评时，觉得人类学者把贵州、云南等中国的国土与东南亚并为一个新的版图苗密阿（印藏发音“遥远民”之意），涵括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大约1亿人口，大概是为了证明人类学的存在合理性。不过，由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学者提倡安那祺史观，至少值得一读。读完以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力作，值得向中文读者介绍和推荐。

---

<sup>88</sup> 在云南边境活跃的廖亦武作家和孙医生描述过那里的基督教历史和现状。

即使对苗密阿山地了解不多的中文读者，也会感到这主要是对中国平原/汉文明的对照：如果没有山地，这里早被汉族征服/同化了。除了来自北方的汉文明外，印度（以及近代的越南、缅甸）的以平原水稻为基础的朝廷政权、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欧美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也从东南西方向向苗密阿山地合围，使苗密阿具有日内瓦高地和哥萨克山谷的“自由”、“平等”、“松散临时的联盟”、“多样化”等安那祺主义特征。

成为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发祥地的阿尔皮斯山脉一直被梵蒂冈视为异端的摇篮，而只有瑞士的平等社会结构、自由精神和高地山谷条件才保证了加尔文派、茨温利（Ulrich Zwingli）派和门诺兄弟会等把个人心灵自由置于世俗教会权威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持续下去。正如我在“我理解的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2007年）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再洗礼派的起源并不是单纯的神学教义之争，也不是逆来顺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义，而是发源于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潮流。……正如敌视德意志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早期历史学者 Josef Jäkel 所断言：叛乱农民是社会渣滓，再洗礼派就是社会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与苗密阿山地一样，处于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包围中的瑞士，在经历宗教改革之后，又成为自由社会主义（近代安那祺主义）的摇篮。刚受到启蒙洗礼的俄罗斯青年（特别是无法进入俄罗斯大学的女子）聚集在这里学习科学、医学等；巴枯宁等革命家在这里学习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与法国、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团体找到了不同于以马克思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原理；而克鲁泡特金正是在以富有独立精神的钟表匠为主的汝拉联盟的活动中确立了终生不易的平等、自由的安那祺主义信念。只有几百万人口却有4种官方语言的瑞士以 federation<sup>89</sup>精神建国，独立以来保持中立，幸免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灾难。当联合国也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时，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瑞士反而成为美苏超级大国会谈、国际裁军会议、联合国科教文机构、“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舞

---

<sup>89</sup> 中文译为“联邦”，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联邦”政府是由具有很大自主权的州（邦）联合而成。瑞士的 federation，实际上是由个人的直接民主构成，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原意，应译为“自由联合”。

台。<sup>90</sup>如果苗密阿能够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理想的“模式”。不过，此书试图说明的是：苗密阿更像哥萨克山谷的命运。

哥萨克作为俄罗斯边疆也以平等、自由著称，同时也是异端派“旧教徒”的温床。几乎动摇了沙皇统治的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以“旧教徒”教义为号召的。列宾的油



画“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回复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来信”（插图，1881年作）是一个典型的写照。扎波罗热是16至18世纪时期哥萨克在“南俄”（乌克兰）的自治组织，主要是由逃亡至扎波罗热来的农奴组成，自行武装。土耳其苏丹要这批哥萨克人脱离俄国而归附于他，惹恼了这些视自由为生命的哥萨克人。画上描写这些性格豪迈的扎波罗热人在领袖赛尔柯的授意下，正写信痛骂土耳其苏丹的情景，人物众多，特征鲜明又饶有趣味，散发着哥萨克的自由平等、勇敢无畏的豪情。只是在普加乔夫起义（1773-74年）被彻底镇压后，哥萨克的原初的民主自治才被领主式的农奴制取代，被纳入沙皇的专制体制。

俄罗斯内战主要也是在乌克兰以东的哥萨克山谷展开，这里更诞生了安那祺主义的武装起义传奇——马赫诺运动。“这里是俄罗斯的粮仓，除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连接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铁路，也是从欧洲通向顿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经之地。”“亲身遭遇过马克诺运动的南乌克兰住民（包括门诺教派和犹太人）对马克诺的评价各有不同，但远离马克诺运动的乌克兰民众却一致视马克诺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Peters 甚至用康德的 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道德命令）来理想化马克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克诺运动

---

<sup>90</sup>引自赵京“我理解的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2007年）。

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绝对道德命令’。”<sup>91</sup>

除了上面提及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苗密阿的广西（以及邻接的广州的一部分）更是明朝期间起义最频繁（218次）的山地，而所谓“壮族”实际上是逃离苛捐杂税的“脱汉化”的汉族。贵州的苗族、具有“种族博物馆”之称的云南，都同时进行着汉化和脱汉化的双向过程。太平天国发源于广西，它的主力在石达开的带领下，也避难到贵州（石达开本人束手就擒，但保全了部下遁入苗密阿深处）。直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内战后战败的国民党军队到大动荡期间逃越中国边境的山民，都幸亏有苗密阿这块巨大“梁山泊”可以让108个部族（而不止108将）“聚义”。例如，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7年8月）“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中披露：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

<sup>91</sup> 赵京：“门诺教派与马克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2010年，收入《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978-1-4583-0411-7。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强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中共云南省委 1956 年 9 月 25 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

文山地委 1956 年 10 月 7 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 40 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 5 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 40 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 1 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 8 个寨子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 5 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

1956 年 12 月 13 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12 月 8 日，维西县民警 11 人护送粮食 6 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 80 人伏击，民警牺牲 5 人，重伤 2 人，物资全被抢走。

1956 年 12 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 7 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 200 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 1 名。我亦击毙喇嘛 1 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昭鲁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46 名土匪暴乱。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46 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 1 人、服务员 2 人。26 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 10 人，打伤 7 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 5 天，共捕获匪 180 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 50 多名。打死 12 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打死叛匪几人，还有 7 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所以，苗密阿既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又是逃避集权专制王朝的“桃源乡”，构成了与中国、印度等平原文明相对应的山地文明，互相补充。此书作者总结道：“山地社会逃避统制的本能——消失、移动、种族杂居、小规模砍伐组织和平等性——都鼓励分散，妨碍公司型组织和集体行动。……所有山地社会都表现出逃避国家的行为。……对于某些组织，逃避国家是靠一种被称为阻止建立自己内部国家的实践来实现的。象 Akha、Lahu、Lisu 和佧族这样的具有强烈的平等和反固定阶层传统的无领袖型组织，就属于这样的分类。……他们通过婚姻联盟阻止固定的家族等级的出现；他们有除掉或排除有过分权势的首领的传说；最

后，当不平等固定下来后，他们就把村落或家族分散得更小、更平等。”（第 331 页）。我们从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看到如此高度的罗马文明因为除掉了凯撒引发内战悲剧，不由得惊叹苗密阿这块不毛之地的山民们还有如此高超的政治艺术！逃避国家、不被统治的集体智慧，只有在巴黎公社（1871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1921 年）、西班牙革命（1936 年）、天安门运动民主（1989 年）等安那祺主义历史的短暂期间才显示出来，应该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的最珍贵精神遗产。

不幸的是，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缅甸，各国对苗密阿这块人类“公共财产”的“圈地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在苗密阿这个远处的、原初的、平等自由的、可供 1 亿人口共同移动生息的公共山地这个概念刚被人们提出、理解时，它的几乎每一个山头都被各个国家（特别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等先进技术）瓜分、私有商业化了（此书也介绍越南起劲推行的同化运动）。缅甸除了海岸线，几乎全国都属于苗密阿山地，具有特殊含义。1947 年 2 月 12 日，缅族（Burmans，约占全国人口的 60%）的缅甸本部（Burma Proper）代表昂山将军（昂山素姬之父）与掸族（人口的 8%）的掸邦、钦族的钦区、克钦族（景颇族）的克钦邦等众土族领袖签订了各邦各族拥有自主自决权的彬龙协议（Panglong Agreement），共同向英国争取独立。书中介绍 Edmund Leach 对克钦族、Thomas Kirsch 对钦族如何在反抗低地国家入侵的同时，也学会了在内部防范山谷的部族建立国家（第 304 页）。可惜，1948 年元月 4 日独立实现后，却由大缅族主义单独掌权，尤其 1962 年军政府非法上台后，废除了联邦宪法，拒绝考虑各邦各族自主自决权，在全国进行暴力统治，通过战争推行英帝国殖民主义者失败的的同化管理政策。非缅族地区从此被军事占领，众土族遭到残酷的民族压迫，引起掸族、克钦族等武装反抗，至今没有平息。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和出卖后，我在大阪见到 1988 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的缅甸民主政府“外交部长”。他为我们展示在丛林里“延安”根据地生活的幻灯，希望得到日本民众和政府的援助。我深知日本企业和政府不会同情亚洲民众的民主事业，很遗憾不能帮助他们。“通过几十年的武装与非武装斗争，缅甸各族人民都看清楚缅族与 135 非缅族，合则两利，分则全亡，几乎所有原住民族群，现在无不主张在缅甸联邦大家庭内，各族寻求最大的自治邦自治权。大

家要借鉴瑞士、德国的真正联邦制。”<sup>92</sup>但缅甸的前途，更主要地决定于中国、印度和东盟、美国、日本、欧洲在苗密阿的利益关系。2010年5月，我在与缅甸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美国公司雪佛龙（世界第2大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推动人权提案：“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在出售和使用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的国家从事的所有与人权相关的政策和行动。这个委员会将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包括公司的高级官员和受尊敬的外部人权专家以帮助公司了解公司海外业务的人权影响”<sup>93</sup>，在耶稣会等人权团体的帮助下，获得7%的赞同。雪佛龙公司董事会虽然发表了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毕竟也部分听取了我和耶稣会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制定了人权政策。

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不管是有上亿人口的中国、印度等，还是只有几万人口的（如瑙鲁）等诸多微小部族，都纷纷以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为唯一的政治模式竞争发展，那些没能“建国”的库尔特人、巴勒斯坦人、鞑靼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 Pushtan 人（还有藏人、台湾）等，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出路。苗密阿的非国家、反国家、逃避国家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模式。让我们大家以各种形式，帮助缅甸等苗密阿山地，摆脱全球化“圈地运动”的厄运，谱写当代苗密阿的安那祺主义运动史。

[2011年8月8日，纪念缅甸民主运动反抗国家统治 23周年]

---

<sup>92</sup> 引自貌强 Maung Chan（缅甸华族）发表在博讯 [www.boxun.com](http://www.boxun.com) 上的文章。

<sup>93</sup> <http://www.chevron.com/documents/pdf/Chevron2010ProxyStatement.pdf>

## 穆斯林兄弟会与以色列集体农庄的政治功能

2012年6月21日周四，埃及选举委员会推迟了预定的埃及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统的结果揭晓，到了周六，还是没有公布结果。由于决选双方的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和原穆巴拉克手下的空军司令和总理沙菲克都宣称自己得胜，受埃及军方控制的法院又解散了刚选出的受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议会，整个世界都担忧埃及的政治局势一触即发。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华尔街日报的周末版刊登了整整一页对穆斯林兄弟会首领 **Mohammed Badie** 的专访。以华尔街日报在美国最大发行量的地位、对国际政治经济最广泛的报道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我意识到美国政府已经知道埃及总统选举的结果并做好准备与穆斯林兄弟会打交道了。这篇专访表明：虽然在美国留学并任教的穆尔西将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但 **Badie** 却将是埃及的霍梅尼。周日，埃及选举委员会终于宣布了总统大选结果，整个世界暂时松了一口气。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也是阿拉伯领导人的旧秩序开始终结的象征性开端。……这将给这个数十年来一直由西方支持的、非宗教独裁者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带来冲击波。”“对埃及的非宗教人士、西方政府和埃及那些实力强大的邻国来说，伊斯兰主义者当选埃及总统开启了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时刻。”

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一样，穆斯林兄弟会的起源和主要功能是社会救济。正是这样的功能，使它们在急促的选举时刻，轻易击败那些没有组织能力的左翼或自由派世俗力量（突尼斯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的工会和学生运动有悠久的历史）。其实，伊朗革命也是因为美国过于干预，把伊斯兰激进派推上政治舞台<sup>94</sup>。当我数次观看穆尔西就职演说时，不禁眼眶湿润。我不由得想到自己 1989年9月22-24日满怀热血参与在

---

<sup>94</sup> Baqer Moin. *Khomeini: Life of the Ayatollah*. I.B.Tauris. 1999. ISBN 1850431280. 我从此书知道一点伊斯兰对教育的控制，可以理解在难民营中成长起来的塔利班青年所受到的唯一教育（可兰经）的影响。

巴黎大学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sup>95</sup>，因为看到那些刚从天安门广场上逃出来的“精英”文人和学生“领袖”不懂西方社会，坚持要熬夜重新起草成立纲领。第二年，急迫要解除西方对中“经济制裁”以便占领中国市场的日本政府利用对中借款（其实是变相的战争赔款），给中国政府一个释放那个“中国的沙哈诺夫”的台阶，顺手抛掉在西方 7 国首脑会议和日本国会上承诺的“保护中国留学生”义务，以便把我们赶出日本的大学和国界。我急迫建议盛名之下的“中国的沙哈诺夫”尽快出面在海外建立人道救援网络，但他回信拒绝了我。正如他贪生逃入美国大使馆一样，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交易面前，他几年来在中国校园（以及在 1987-88 年给我的回信）中的“不怕个人牺牲”的豪言壮语早已灰飞烟灭。所以，当他 1990 年访问日本关西时，正遭受日本当局和中国驻日机构迫害的我已经没有兴趣见他了。除了人权和人道事业，有什么值得我们在海外牺牲了自由和生命去奋斗的？没有或回避社会救济功能的任何政治组织，没有或回避社会救济责任的任何政治人物，只不过是闹剧、戏子罢了。

除了埃及军方、专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存亡危机中的叙利亚阿萨德当局、分裂的巴勒斯坦等，穆斯林兄弟会首先要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外部世界对于以色列的军事、政治、外交手段并不生疏，那些被犹太民族排斥出来的耶稣、保罗、斯宾诺沙以及那些不再认同犹太教的马克思、托洛茨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犹太人，早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我们对于以“锡安主义”（Zionism, 中文多被译为带有阿拉伯政治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国的以色列社会，却了解甚微。

我第一次注意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茨（英文 kibbutz），是读到舒奇对自己的传奇生涯的反思：“除了列宁主义及其延伸的古巴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外，舒奇也试图在墨西哥、以色列社会中找到非集权制

---

<sup>95</sup> 赵京：“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的几个片断浮想”，东京《民主中国》1989 年 11 月号。

的、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组织方式”<sup>96</sup>。如果说起源于欧洲社会主义影响、变质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sup>97</sup>的锡安主义是“有犹太特色的民族主义”的话，基布茨则是实现锡安主义的具体组织方式。原意只是“集合”的基布茨由 1909 年从俄罗斯沙皇的压迫下逃到巴勒斯坦的犹太



人建立，奉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集产主义原则，当初并没有多大国际政治能量，也接受阿拉伯人加入（如果他们不反感犹太教仪式的话）。但随着受锡安主义影响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涌入巴勒斯坦加入以色列建国的斗争，基布茨的单纯农庄性质急剧扩张为兼具建设兵团、殖民开发、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全面组织形态（插图是一个基布茨 1959 年收获祭的场面）。这就是为什么基布茨的出生者在以色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人才辈出的原因。

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不同，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组织，只有内战前西班牙阿拉贡地区安那祺主义集体农庄与基布茨类似<sup>98</sup>。成员自愿加入或退出，宗教（犹太教）历史背景、（内部）社会主

---

<sup>96</sup> 赵京：“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比较政策评论》，2003 年 10 月 23 日。

<sup>97</sup> 从美国去巴勒斯坦组建基布茨以及以色列国家、后成为其第一个女首相的 Golda Meir 在其自传（*My Life*. G. P. Putnam's Sons, 1975）中承认：她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最好不要提社会主义。

<sup>98</sup> 右翼军人的叛乱爆发时，安那祺主义者在拥有大量工会成员的巴塞罗那等大城市自发奋战，拯救了共和。在此后的相持阶段，主要由在安那祺主义影响下的阿拉贡贫苦农民靠原始的武器防卫着漫长的山地阵线。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描述了自己亲身加入阿拉贡战线的经历。Graham Kels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The CNT in Zaragoza and Aragon, 1930-1937* 一书多少弥补了对安那祺主义在这一地区的组织活动的研究的缺欠。

义平等理想和（对外）严酷战争现实提高了成员们的“大公无私”觉悟。据基布茨老一辈的开拓者回顾<sup>99</sup>，谁也不愿意当领导，因为那是自找苦吃、自找麻烦；没有贪污腐败，出差的人乘经济座位、住便宜旅馆，在外当官的人把薪水交给基布茨后再从基布茨分到自己所需的零花钱（衣、食、住、医疗、教育、娱乐等都是免费）；在外耀武扬威的大臣回到基布茨，任劳任怨地干起被分派的洗碗端盘子等服务活儿；他们早期也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简直成了世外桃源，怪不得世界各地的朝拜者源源而至。如果除去殖民开发的建设兵团职能（目前的大约 3 百个基布茨共 10 万人都分布在边境，要求拆除他们新建的定居点成为国际谈判的焦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可以组建自己的基布茨呢？当初，纳塞尔、胡赛因、卡扎菲、阿拉法特（还有今天的阿萨德的父辈）等都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号召民众的<sup>100</sup>。难道阿拉伯民众（而不是专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王储）不比以色列更接受社会主义吗？

这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自此为止阿拉伯输给以色列的社会原因。除了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民众正在艰难地探索不依存石油的经济方式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埃及的民主选举，只是阿拉伯社会革命的一个开端，还需要持久的斗争。

[2012 年 7 月 26 日]

---

<sup>99</sup> Yosef Criden and Saadia Gelb, *The Kibbutz Experienc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ISBN 0-8052-0511-X, 1976.

<sup>100</sup>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1997.

## 15. 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sup>101</sup>，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直接参与者马克思以及后期为了排挤巴枯宁派进入国际的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别的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例如，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 1934 年版译出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sup>102</sup>，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1863 年 7 月 22 日，主要受欧文派社会主义和宪章派市民阶级<sup>103</sup>民主主义影响的英国工人联合会召开大会，抗议俄国沙皇镇压波兰起义。受蒲鲁东影响的法国安那祺主义工人代表团也参加大会，开始就两国劳工阶级的合作交换意见，产生了同年 11 月 10 日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呼吁书。1864 年 9 月 28 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大会，欢迎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大会的还有德国流亡者和为独立而战的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民主人士<sup>104</sup>。国际就在这样的共同声援弱小民族的劳动民众的背景下诞生。不过，民族主义本身不是

---

<sup>101</sup>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WMA, 应被译为国际男劳工协会（后改为 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 国际劳工协会）。俗称为第一国际，是基于外界的误解，因为所谓的第二、“第二点五”、第三、第四或“第五国际”，都在基本原则曲解了国际的精神。

<sup>102</sup> 张文焕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一版。

<sup>103</sup> 英文 bourgeoisie 一词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 borghesia，主要指享有一定经济自由（例如，有自己的房产）的市民阶层，译为“小布尔乔亚”、“小市民”在语感上比“资产阶级”贴切。

<sup>104</sup> 最早的记载是由马克思参与的 Wilhelm Eichhoff 以德语写作、1868 年 8 月发布的小册子。英译本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ts Establishment, Organis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Growth.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wma/archive/eichhoff/iwma-history/index.htm>



国际的精神，大会没有采用具有崇高威望和政治影响的马志尼意大利民族主义派的现成章程。

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sup>105</sup>，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 **anarcho-syndicalism** 安那祺-工联主义<sup>106</sup>，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sup>107</sup>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sup>108</sup>。由马克思等 9 人组成的秘书小组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6 年 9 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这虽然不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sup>109</sup>，但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人愿望、得到各国劳工团体的广泛呼应。顺带指出，这个章程被收入马克思

---

<sup>105</sup> 这两者差异很大。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小农阶级被圈地运动一扫而光，产生了无产阶级大军，但法国的小农经济依然顽固抵抗工业化进步，在蒲鲁东的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不过，加入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属于技术、熟练工人，被马克思认为是分享殖民地利润的工人贵族。

<sup>106</sup> 现有的中文译为“无政府-工联主义”。经典的论述是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38. 笔者读到的是 AK Press 2004 出版的第 8 版。

<sup>107</sup> 现在欧洲不少国旗都是三色旗，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

<sup>108</sup> 恩格斯 1890 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从这句话以及整篇序言对社会主义各流派的攻击（如“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安那祺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可以看出作者炫耀自己事后诸葛亮的“高明”或隐瞒了加入国际的不可告人的意图。如果《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向马志尼派那样开诚布公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共产主义]抛弃”）要把几乎所有国际的各派别都排挤掉，国际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接纳流亡英国、没有德国劳工阶级授权的马克思。

<sup>109</sup> 恩格斯 1888 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与 1890 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雷同）。

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后来声称“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对于国际和马克思都不公平。马克思可能具体执笔记录下9人小组讨论的草案，但章程的内容（所谓版权）是国际的集体共识，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际的运营（主要是领导权争夺<sup>110</sup>）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教相距甚远。

据编辑马克思的有关国际的文献的 Saul Padover 回忆：国际成立时，马克思是一个相对无名的难民记者（a relatively obscure refugee journalist）<sup>111</sup>，马克思与英国的激进派或劳工活动家之间没有密切联系，他过着政治上被隔离的、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难民生活（Marx had no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glish radicals or laborites, and vice versa. His led the politically isolated life of an unassimilated continental refugee）。马克思在大会前一周对会议毫无所闻，一个30岁的流亡伦敦的法国激进共和派人士 Victor Le Lubez 邀请马克思作为德国的代表参加大会，马克思又叫上另一个德国人 Johann Georg Eccarius 同往。可见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样本，欢迎一切认同国际原则的人士加入。国际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一切（The International was to change all this）。当然，正如欧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厂主）、葛德文（社会幻想家）、圣西门（旧贵族幻想家）、傅立叶（小店主）、蒲鲁东（印刷工）、巴贝夫（平等派密谋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萨尔（犹太富有律师）这些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先

---

<sup>110</sup> 早在1867年（国际刚成立的第二年）9月11日，马克思就迫不及待地向恩格斯透露：“在下次革命到来时——它也许比表面看起来到来得更快些——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在我们手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48页。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这两个“革命导师”为了掌握国际所用的手段：“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式进行这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此外，我将在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中（尽管巴黎的空谈家用尽了全部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够阻止我们再次当选）给他们以严厉的斥责。”“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的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更重要。……英国工联主义者中曾经认为我们走得太‘远’的那些猪猡，现在也向我们跑来了。”

<sup>111</sup> 以下引自 <http://www.marxists.org/glossary/orgs/f/i.htm#first-international>

进人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样，非工人出身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加入劳工运动，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国际之上（所谓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导师”），都是令人欢迎的。直到今天，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们虽然没有忘记马克思派操纵国际、在无法操纵时竟然解散国际的“原罪”，但像巴枯宁当初那样，即使“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仍然把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战友对待，不会把婴孩与脏水一同泼掉。

让我们仔细回省一下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体现的基本原则：

112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sup>113</sup>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 not a struggle for class privileges and monopolies, but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 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lies at the bottom of servitude in all its forms, of all social misery, 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itical dependence; 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独占劳动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悲惨、精神屈辱

---

<sup>112</sup>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international/iwma/documents/1864/rules.htm>

<sup>113</sup> working classes 指靠劳动为生的各阶级民众，不只是相对于农民阶级的单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体力劳动者）。出自工人运动的五月一号被称为劳动节而不是工人节，也表示对所有劳动民众的致敬。至今为止的中文文献都以单数的“工人阶级”翻译为准，是服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一党专政理论的需要。

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上述原则非常简明，没有必要用什么黑格尔哲学或李嘉图经济学来复杂解释，因为它们与国际没有什么关联。例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嘲讽，显示了马克思的好斗风格，在学术功底上略占上风<sup>114</sup>，可以理解相对无名的新手对已经成名的大家的嫉妒。而相对无名的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国际取代安那祺-工联主义，除了犹太法律学生马克思的知识和计谋胜过欧文和蒲鲁东的朴素劳工信徒等人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共敌俾斯麦的光：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失败<sup>115</sup>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传统的劳工运动转入低潮或地下<sup>116</sup>，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和经验的后进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开始唱主角<sup>117</sup>。由拉萨尔开创、控制和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不

---

<sup>114</sup> 马克思在蒲鲁东去世时还不忘攻击蒲鲁东：“《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8—36页，“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

<sup>115</sup> 参见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sup>116</sup> 在西班牙，连 *anarchism* 这个词也无法公开使用，只能用 *libertarian* 这个词代替。后来 *libertarian* 被自由资本主义盗用，造成一系列用语混乱。参见赵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论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剽窃、亵渎、歪曲和危害”，2011年2月27日。

<sup>117</sup>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52. Rocker 指出这一点，尤为中肯。他出生童工（两次从孤儿院逃走），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流亡巴黎、伦敦（其间与犹太人安那祺主义团体过从甚密）。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后，他回国组织德国自由工人协会，1922年12月任新恢复的国际劳工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IWA)* 的秘书之一。因为列宁与社会党国际（所谓“第二国际”）闹翻另起炉灶成立共产国际（所谓“第三国际”），邀请国际劳工协会访问苏俄，试图把国际劳工协会变为他的工具。国际劳工协会的另一个秘书舒奇当面批判了列宁（参见赵京“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2003年10月23日）。1933年纳粹上台后，Rocker 逃离德国，并最终逃亡美国。

了普鲁士型“国家”的紧箍咒。马克思不敢在拉萨尔生前批判他<sup>118</sup>，但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排除拉萨尔的影响，通过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工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获得很大成功。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声明：That all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adhering to it will acknowledge truth, justice, and m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ir conduc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without regard to color, creed, or nationality; “拥护国际的所有社团和个人将承认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他们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特别地，作为国际运作的原则，《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具体地规定：1. This Association is established to afford a cen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workingmen's societi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iming at the same end; viz., the protection, advancement, and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一个各国现有劳工团体之间联络与合作的中心媒体，实现保护、推动和完全解放劳工各阶级的共同目标”。3. There shall annually meet a Gener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 “第三条 协会的各支部代表组成劳工总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5. The General Council<sup>119</sup> shall consist of workingmen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

<sup>118</sup> 如果马克思当面批判拉萨尔，就失去了在国际立足的本钱。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安那祺状态》中以此质疑马克思的个人道德，指出：马克思和拉萨尔这类非工人的“工人运动领袖”，实际上把劳工阶级作为他们的“顾客”，象医生、律师那样靠顾客的倒霉发财。从马克思 1865 年 1 月和 5 月给美国两个总统的献媚贺信，看出马克思把国际与美国政府，把他自己与林肯“平起平坐”的一厢情愿，与劳工运动有什么关系？如果违背国际的“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的第一原则，不靠自己解放自己，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坦白承认的那样，各种“先知”、“导师”、“领袖”、“先锋队”就会找上门来。流亡的马克思还向有钱有势的“学生”（恩格斯在拉萨尔死后这样讲他们的关系）拉萨尔借款，引起纠纷，不在我们的关心之内。相反，欧文、蒲鲁东、布朗基、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等都对劳工阶级怀有兄弟友爱之情。

<sup>119</sup> 既有的中文文献都译为“总委员会”，好像它具有控制各地劳工运动的权力，不对。我参加过硅谷本地的圣何西劳工协议会 San Jose Labor Council 组织的活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t shall, from its own members, elect the officer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such as a treasurer, a general secretary, corresponding secretaries for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etc. “第五条 总协议会由国际协会成员国的工人组成，从它的成员中选出必要的职员如会计、总秘书<sup>120</sup>、各国联络秘书等，从事业务交流”。6.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form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d local groups of the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workingmen in one country be consistently informed of the movements of their class in every other country;.....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periodical reports. “第六条 总协议会在协会各地和当地团体之间组成一个国际机构，以便使一国工人经常得知另一国工人阶级的运动。 . . . . 为便于联系，总协议会发表定期公报。”11. While united in a perpetual bond of fraternal co-operation, the workingmen's societie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will preserve their existent organizations intact. “第十一条 靠友爱合作的永久联结团结起来加入国际协会的各劳工团体，将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不变”。

这样对国际的运作的明确规定，接近于国际的名称，实际上就是 **federalism**。这个词用在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体制，可以译为“联邦制”；用在社团组织或个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员原有性质、形式、人

---

动。小布什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后，圣何西劳工协议会邀请伊拉克的独立石油工会的代表团访美。一个女秘书（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放弃了别处的高薪职位来为劳工服务，领取不高的专职薪水）设计了很详细的反战方案，邀请所属的圣何西各工会代表开会协议。结果，大家只完成或能承诺她希望的方案的四分之一。我很担忧她的工作能否继续下去，她回答说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去年，San Jose City Council（市议会）要砍掉 10% 的警察预算，警察工会请劳工协议会帮助，我动员我的高中生儿子替劳工协议会在市政厅前散发传单，“游说”市议会刀下留情。由此可以看出劳工协议会作为协调中心，本身是处理性行政事务而不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新社会形式。

<sup>120</sup> 马克思没法当上总秘书，后来就设法取消了这个职务。在各国共产党组织里，中文把原义为秘书的 **secretary** 翻译为“书记”，为各种“书记”（如江总书记、薄书记）掌握专权开路。

事、财务等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共同缔结同盟条约、义务、合同等，可以译为自治 / 自由联盟，与今天的欧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个人“掌握”协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体领导”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爾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各派代表参加的合法代表大会。代表比利时自由联盟 **Belgian Federation** 的 **Eugene Hins** 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联盟和很多法国代表赞同的“劳工评议会 **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会采纳<sup>121</sup>：“代表大会宣布所有劳工都应该努力在他们的行业建立抵抗协会。一旦一个行业组合<sup>122</sup>成立，就应该通知同一行业的别的组合，这样就可以形成各产业的全国性同盟。这些同盟负责收集所有产业资料、建议要采取的公共措施并确保执行，最终由自由生产者的联盟 **Federation** 取代现有的工资制度。代表大会责成总协议会提供对所有国家的行会组合的联盟的支持。”“行业和产业组织的协议会将取代现存的政府，这种劳工代表制将一劳永逸地赶走历史上存在过的政府”。这种取代政府的劳工协议会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精髓：要实现完全社会革命，就必须同时消灭财产和权力的垄断。按照这个国际的精神展开的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国家的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道路却背弃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战败的德国把政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他们把德国引向社会主义了吗？1933年纳粹上台后解散议会，社会民主党毫无招架之力，被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彻底肢解了。另一方面，当1936年西班牙军人和王党发动叛乱时，尽管被长期压制，国际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安那祺 / 自由社会主义者（全国劳工同盟 **CNT**）力挽狂

---

<sup>121</sup> 以下的关于国际的历史评述，来自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p.45-52. 而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国际巴塞爾代表大会（文件资料）》（张文焕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收集的对巴枯宁的攻击材料，不屑一顾。本来，有四种关于巴塞爾会议的原始文献，中文读者只能读到经过马克思修改的一种说法。

<sup>122</sup> 这里，我按照日语译法把 **trade union** 译为行业组合，比狭隘的“工会”译法准确。在美国，目前最强大的行业组合是公务员、教师和护士行业。

澜，自发地拯救了共和，并在艰难的国际环境<sup>123</sup>中坚持了三年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型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必然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sup>124</sup>。

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派（仅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够了：吉约姆 James Guillaume<sup>125</sup>, Adhemar Schwitzgubel, E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尔会议上也不择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可以在巴枯宁本人出席会议、马克思本人没有到会、恩格斯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由贝克尔提议的按语系自由联合的方案。那样的话，由马克思控制的伦敦总协议会就会“化为乌有”，而被在欧洲大陆的法语、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德语协议会中心所取代<sup>126</sup>，国际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马克思在国际内的职称（总协议会委员、德国联络秘书、荷兰临时联络秘书、俄国联络秘书）和后期（1870年10月4日）进入国际的恩格斯的头衔（总协议会委员，西班牙联络秘书、比利时联络秘书、意大利联络秘书），与“马克思领导国际发动了巴黎公社”的神话一样可笑。巴枯宁并不是不懂阴谋权术，但在事关社会主义运动的

---

<sup>123</sup> 德意法西斯参战支持佛朗哥，英国暗地里与佛朗哥交易宣称“中立”，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却不阻止佛朗哥把叛乱军团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本土，法国受到同盟国英国的警告不敢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得罪德国，美国政府宣布中立却不妨碍公司向佛朗哥出售军火，而苏联扶持没有民众基础的共产党在内战中发动内战夺权。

<sup>124</sup> 哈佛大学的 Richard Pipes 算是西方研究苏联的权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如 *Communism: A History* (2001) 和为美国政府提供的政策中，都用安那祺主义的理论逻辑反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因为他读懂了安那祺主义，尽管他不是自由社会主义的朋友。

<sup>125</sup> 作为汝拉联盟的组织者和巴枯宁的战友，吉约姆也是逃到瑞士的克鲁包特金转向安那祺主义的引路人。他用法语写成的4卷本《国际：文献与会议》*L'Enternationale: Documentns et Souveniers* 是对国际最详细、忠诚的纪录，可惜没有被译为别的文种。我不懂法语，没法阅读原文。

<sup>126</sup> 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张文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4-15页。



紧要关头，宁愿“被宰”而不愿宰割国际的同志。“既然国际的组织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家或专制而是激进地消灭每一个主权，国际必须有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是何等地对人的兴趣和本性的自然发展的权威、人为、暴力、疏远和敌对，国际的组织就应该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兴趣和天性”<sup>127</sup>。在既存的社会里，博爱就是博爱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国际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则建立新的社会，不容许真正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玩弄任何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专制/独裁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虽然有极个别的倡导者如巴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且是国际劳工运动里的毒瘤。

巴塞尔会议加剧了马克思派的恐惧和除掉巴枯宁的决心<sup>128</sup>。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协议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汝拉联盟立即发表了 **Sonvillier** 的历史记录，抗议伦敦总协议会的傲慢和虚伪。但是，马克思派变本加厉，在 1872 年的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伪造多数代表的身份、阻碍反对派代表赴会，操纵大会，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同时出卖了国际的废除国家的使命，把国际变成他们的投票机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真正的国际在海牙会议上被埋葬了<sup>129</sup>。

---

<sup>127</sup> 巴枯宁语，引自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AK Press, 2004. p.49.

<sup>128</sup> 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 1869 年 7 月 30 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

<sup>129</sup> 历史也嘲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海牙代表大会批准了伦敦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并决定把相应的条文补入国际的章程。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是布朗基派，它的代表 **Edouard Vaillant**（很像列宁的前身）在决议中绑架国际：“只要这个决议被代表大会采纳并写入国际的章程，每

海牙会议后，国际的重要的联盟成员在 St. Immier 召开会议，推翻了海牙会议的所有决议，恢复了国际的原初精神和原则<sup>130</sup>。世界劳工阶级的根本地位没有变化，国际的旗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或任何派别的政治目的而倒下。实际上，虽然自此以后在所有国家政权的压迫下，国际连作为一个联络中心的功能也无法发挥，我们在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sup>131</sup>、西班牙内战到以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权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sup>132</sup>、世界社会论坛、阿拉伯之春、互联网自由人权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都看到对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挥。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国家机能高度复杂，社会主义运动也丰富多彩<sup>133</sup>，不必、也不可能拘泥于一种教义、组织、名称、形式。当然，我们的具体工作也随时代而变化，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基本实现，目前的目标应该转移到以四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完全雇用

---

个成员就有义务服从，否则就会被开除。”马克思派无力再向战斗性很强的布朗基派开战（其结果很可能是被布朗基派开除），只得将总协议会完全改组，迁往鞭长莫及的新大陆纽约。但国际在美国劳工中没有影响，马克思也不把国际的资料交给他的美国信徒左尔格等人。这个已经死掉的“马克思国际”只好于 1876 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sup>130</sup> G. M. Stekloff 用俄语写成的《国际的历史》是我读到的最全面、客观的研究，其第 2 部分专门写海牙会议以后（安那祺主义）国际的历史。英文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由 Eden Paul 和 Cedar Paul 译自俄文第 3 版，首次于 1928 年在伦敦出版。

<sup>131</sup> 关于这两个运动，参见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2011 年 1 月。

<sup>132</sup> 他们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就是国际为之奋斗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世界。

<sup>133</sup> 其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是近代工业社会“有机化”的产物，与古代简单社会形态中产生的共产主义要求不同（杜尔凯姆：“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把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归结为单调的共产主义，是返祖现象。影响了马克思的德国共产主义倡议者工人魏特林移民到美国后，再也不提共产主义了。看到布尔什维克胜利的韦伯进一步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也避免不了官僚制化（韦伯：《社会主义》，赵京译，2010 年 3 月）。Nathan Jun, *Anarchism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 进一步讨论了安那祺主义的现代性议题（尼采、哈博马斯和“后现代性”Foucault, Deleuze 等），揭示了现代社会离不开国际成立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sup>134</sup>。面对全球化浪潮，2001年创立的“自由国际连带”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包括了西班牙的 CNT、乌拉圭安那祺主义联盟以及法国、阿根廷、巴西、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南非等国际的组织，也欢迎不知道国际丰富历史的各种争取自由、人权、平等的团体。例如，面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西班牙失业民众从安那祺主义的互助原理，学会抛弃欧元、自行组织“时间银行”，平等交换劳动时间（律师和清洁工的相同劳动时间创造相同交换价值），废除了利润等金融投机的可能<sup>135</sup>。

比名称和组织的正统性之争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曲解国际的原则：

“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

“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

[2012年9月3日 美国劳工纪念日]

---

<sup>134</sup> 赵京 “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2010年3月6日。

<sup>135</sup> 连华尔街也从安那祺主义寻求灵感：“For Spain's Jobless, Time Equals Mone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7, 2012.

## 16. 国家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近代军事理论的创始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sup>136</sup>主要是对法国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带来的欧洲（陆军）军事变革的总结<sup>137</sup>，特别强调集中局部兵力、在会战中决胜的指导思想<sup>138</sup>，“以打垮敌人为目的”，“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战争论》第一卷 27 页），而不是“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并由此导出“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一卷 11 页），“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论》第一卷 43 页），“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战争论》第一卷 127 页）。“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三卷 894 页）。“在战争中，直到最后时刻都不应该对成功有所怀疑，正确的原则永远不可能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在人们认为这些原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场合，它们却又出人意外地发挥出作用来。”（《战争论》第三卷 995 页）。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以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出版了另一本引起军事战略革命的著作：*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890, Alfred Thayer Mahan)。马汉所论的时代略早

---

<sup>136</sup>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1982年，北京。

<sup>137</sup> 拿破仑本人留下了生动的纪录，如“他非常善于利用自由的口号，特别是民族独立的口号，把这种口号当作自己的护身符似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拿破仑文选》陈太先译，1982年，北京。第 219 页。

<sup>138</sup> “如果我们打算参加会战，那就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兵力，甚至连一个极小的部队也不要忘掉，因为一个营常常决定一个战役。”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拿破仑文选》陈太先译，1982年，北京。第 3 页。

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政治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前）<sup>139</sup>，但是他关于海上霸权的观点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正在兴起的相关海权强国的注目，引发军备竞争，直到 1922 年才达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制约英美日法意的战舰和航空母舰吨位的比例为 5:5:3:1.75:1.75，其中可以看出亚太海权日本的突出扩张。当然，从两次世界大战等战争实例来看，“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战争论》第一卷第 23 页）<sup>140</sup>。这主要从领导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海战（太平洋上的美日海战）的美国海军最高将领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担忧表露出来。

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日本投降仪式为标志，美国军队（主要是海军）在亚洲取得辉煌胜利和压倒性优势<sup>141</sup>，但也结束了传统的军事观念和价值。一个怪物出现在战场上了，而首次使用原子弹的美国，很可能反过来被这个怪物攻击。“The reactions of the four fleet admirals to dropping the bomb.....This new atomic power was something quite foreign and generally repulsive to them.”<sup>142</sup> “The lethal possibilities of such atomic action in the future is frightening, and while we are the first to have it in our possession, there is a certainty that it will in the future be developed by potential enemies and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 used against us.” “My own feeling was that in being the first to use it, we had adopted an ethical standard common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Dark

---

<sup>139</sup> 他后来补写了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 (1892)。

<sup>140</sup> 其实，不仅暴力，国际政治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也是微不足道的。1989 年，日本政府与别的西方国家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宣言”，但由于没有任何强制，成为一纸空文和政治闹剧。

<sup>141</sup> 正如后来的美国驻日大使莱孝尔所称：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在亚洲的军事统治地位。

<sup>142</sup> Walter Borneman, “The Admirals: Nimitz, Halsey, Leahy, and King – The five-star admirals who won the war at sea” 2012. p.449.

Ages.”<sup>143</sup> King “didn’t like the atomic bomb or any part of it.”<sup>144</sup> Nimitz felt “somehow indecent, certainly not a legitimate form of warfare”<sup>145</sup>.

在美苏确实的互相毁灭的疯狂 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冷战时代，爱因斯坦、波尔之后的西方物理学家主流的良知<sup>146</sup>，加上苏联物理学家沙哈诺夫等人权活动分子的斗争，帮助回避了超级大国之间的足以毁灭人类上千次的战争。但原子能知识和技术的普及激发了世界各国政客都要来主宰人类命运的豪情，同时，各国的科学技术专家完全堕落为金钱和权力的附庸<sup>147</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宣称：“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造原子弹！”中国没有人感到我们的文明就退步了。1980年我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经在聂荣臻元帅当部长的第七（核）工业部管理之下），看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只有高能物理这个高科技可以与美苏抗衡，邓小平跑来感谢说：“没有你们，我哪敢谈中美

---

<sup>143</sup> Leahy 日记，引自 Walter Borneman, “The Admirals: Nimitz, Halsey, Leahy, and King – The five-star admirals who won the war at sea” 2012. pp.449-450.

<sup>144</sup> King 回忆录，引自 Walter Borneman, “The Admirals: Nimitz, Halsey, Leahy, and King – The five-star admirals who won the war at sea” 2012. p.450.

<sup>145</sup> 引自 Walter Borneman, “The Admirals: Nimitz, Halsey, Leahy, and King – The five-star admirals who won the war at sea” 2012. p.450.

<sup>146</sup> 例如，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的正副主任都对他们参与美国政府决策有所回顾：Wolfgang Panofsky, *Particles and Polic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994. Sidney Drell, *In the Shadow of the Bomb: Physics and Arms Control*,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1993.

<sup>147</sup> 昨天的各大新闻报道美国私募基金黑石集团的头目等要筹集 3 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基金，就是因为那里盛产了国家主席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国家高级官僚。看来，唯缺缺乏思想学术自由的清华应该改名为国际官商集团了。以下引自赵京“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2008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控制的规模 2000 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公司 CIC 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却是国际金融关注的一大焦点。它的第一笔投资就是在正式成立之前的 2007 年 5 月 20 日用 30 亿美元买下第一个在美国股票市场公开交易的私募基金黑石集团的非投票权股票。这个代号为 BX 的公司在 2007 年 6 月 21 日定价每股 31.00 美元，22 日以每股 36.45 美元上市开盘，当日冲到每股 38.00 美元，此后一路下跌，在 2008 年 1 月 9 日跌到每股 17.30 美元。当我们读到中国投资公司头头自我陶醉的第一笔投资公告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黑石集团用什么手段收买了他们？中国政府有什么法制监督他们？中国公众有什么权力制裁/撤换他们？”

苏世界三角格局？”。以此可以很容易想象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北朝鲜，伊朗，甚至本拉登等，都迫切想拥有核武装，通过另一种手段来继续政治。

当奥巴马总统一方面提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一方面提出“亚洲枢纽”战略把美国重心转向亚洲之际<sup>148</sup>，我们看到东亚四国的政治现实：两个国家的首脑是元首脑的孙子或外孙，另两个国家的首脑是原首脑的女儿或太子党，它们正处于领土争执和核武装对峙的危机状态中。传统的国家观念<sup>149</sup>、以及 NATO<sup>150</sup>、美日同盟<sup>151</sup>等军事战略已经失灵，战争与和平这个老命题又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可以把进一步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辩证发挥为：国家政治无非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既然国家政治无法通过和平解决老问题时，我们不能找到非国家、非主权的自由民主人权方案吗？<sup>152</sup>至少，让我们共同努力，给东亚、世界和平一次机会吧！

[2013年4月23日]

---

<sup>148</sup> 以配置 60%美国海军为标志。据国际先驱导报 2013 年 2 月 28 日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称，亚太地区覆盖了地球近一半的面积，拥有超过全球一半的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上都极度多元化，使其具有独特的战略复杂性，而该地区面临的各种挑战更加剧了这一点。目前共有 35 万名美国官兵正在亚太地区服役，这表明美国对这一区域的重视。他认为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再平衡不仅是军事力量，而是全面涵盖美国政府，从政策制定到外交和贸易。

<sup>149</sup> 如 The Navy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2012) 书中仍然强调自由民主的理想指导美国海军的战略和行动。

<sup>150</sup> NATO Handbook, 1989.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Brussels.

<sup>151</sup> “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国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60 年 1 月 19 日签署，1960 年 6 月 23 日生效) 开头就强调：“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国希望强化两国间存在的传统和平与友好关系、维护民主主义的原则、个人的自由与法治”。

<sup>152</sup> 例如，赵京“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2011 年 3 月 14 日。奥巴马应该任命一位具有亚洲背景的人权专家担任驻日大使（因为日本首先必须面对自身犯下的对亚洲民众最大的战争人权罪行），等。我几年前投稿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倡导美国外交政策从 soft power 或 stupid power 向 smart power 转化，最近终于听到新任国务部长克里在讲 smart foreign policy 了。

## 17. 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

### -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称第一国际，或简称国际）的中文文献几乎全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sup>153</sup>一派的片面观点、宣传和记载，我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sup>154</sup>中进行了一点最基本澄清，本文局限于就国际在西班牙成立时期马克思派“总委员会”<sup>155</sup>与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sup>156</sup>的公案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些事实，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872年9月在远离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海牙召开的由总委员会控制的<sup>157</sup>代表大会开除了巴枯宁等人，遭到代表国际的大多数成员的分局的抗议，导致了国际的分裂和瓦解。会后，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发布

---

<sup>153</sup> 这个词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主张，不是科学。

<sup>154</sup> 2012年9月3日。

<sup>155</sup> General council, 译为“总协议会”更妥，本文按照惯用的中文翻译。为各国工会之间调节、调解内部联系设立的 general council, 更象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而不是有执行权的政府功能。例如，马克思以此名义向美国的林肯总统发贺信，显示出他利用国际的个人政治企图，与加入国际的广大普通劳工的团结感情格格不入，不伦不类。

<sup>156</sup> 关于这个公案，巴枯宁本人没有去过西班牙、也不懂西班牙语，甚至还没有接受“安那其主义”这个用语，不是公案的主角一方。本文主要引用的 Casas 可以代表继承第一国际真正精神的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运动：他从小随父亲参加工会集会，15岁时加入1936年7月18日的捍卫共和的战斗，1947年被佛朗哥军事法庭判处30年徒刑。他1976-85年担任CNT全国委员会书记。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261.

<sup>157</sup> 据马克思的朋友、曾经担任国际几年书记的 Jung 后来回顾：马克思的胜利“依靠的是虚伪的证据和最傲慢的手段。他们会用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编造少数代表，再以少数支配达到国际的多数票决。”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42.



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sup>158</sup>，除了政治上“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sup>159</sup>，但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有意义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给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

“代表大会决定：1. 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sup>160</sup>；2. 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

---

<sup>158</sup>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年4—7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流亡西班牙，同安那其主义者占多数的第一国际西班牙分部进行斗争，被开除后1872年7月筹建只有9人的第一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9月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支部的代表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强调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集中领导的必要性，投票赞成第一国际开除巴枯宁等人的决议。会后，拉法格协助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此文。而他们完成如此“大业”后，都失去了对国际的兴趣，因为国际很快就人走楼空了。

<sup>159</sup>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文注解，也被广泛地引用在各种相关文献中作为对此文的介绍。

<sup>160</sup> 文章最后说：“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不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而且也由于他品行不良。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还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暂不公布。”实际上，海牙代表大会文件的全部出版工作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作为法学博士的马克思在这里同时也在行使社会主义运动“法官”的权威，反正没有人感兴趣要求公布“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

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的例子，都表明教皇<sup>161</sup>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马恩无端攻击同盟为“资产阶级代表”、强调法奈利 Giuseppe Fanelli 短暂的“意大利议员”身份，大概是他们自己、特别是恩格斯的“跨国资本家”身份在作祟。其实，正如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吸引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广泛价值和意义，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劳工阶级。法奈利本人 18 岁就参加统一意大利的解放运动，也参加了直接促成国际成立的 1863 年波兰起义<sup>162</sup>，“对法奈利来说，革命就是一种生活，而不是遥远的理论目标。他的[只有 49 年的]生命后期就是在铁路上度过的：白天到村庄组织社会革命，晚上在列车上过夜。”<sup>163</sup>当然，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功绩就是受巴枯宁委托到西班牙点燃了安那祺主义烈火：“热烈、打动人心，…他带动了把西班牙建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安那祺运动、为社

---

<sup>161</sup> 指巴枯宁。其实，如果说国际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教皇的话，那就是马克思本人。

<sup>162</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seppe\\_Fanelli](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seppe_Fanelli)

<sup>163</sup> Bookchin, Murray (1998), *The Spanish Anarchists: The Heroic Years 1868 - 1936*. Canada: AK Press, ISBN 1-873176-04-X.

会斗争准备得最充分的一代人”<sup>164</sup>。直接受法奈利引导参加运动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创始人罗伦佐在其著名的关于西班牙第一国际的历史中记载道：“法奈利高大、善良，表情严肃，长着厚厚的黑色胡须和黑色的大眼睛，憎爱分明，或像闪电或亲切同情。他的声音像金属振耳，正适合于他在说的是什么，迅速传达出对暴君和剥削者的愤怒，以及对受压迫者的痛苦、遗憾的安慰。即使自己没有遭受痛苦的人，也通过他的无私喜悦的情感和对和平博爱的超级革命思想而接受了他。他用法语和意大利语交谈，但我们都随着他的表情模仿理解他的讲话。”<sup>165</sup>

马恩提道：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同盟入会。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改组为国际的普通支部。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回信说，…如果把‘各阶级的平等’改成‘消灭阶级’的话，要使同盟的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将不会有什么障碍。”在这段期间，到达西班牙的法奈利与日内瓦的巴枯宁和伦敦的总委员会都没有可能联系，不知道这些进展。他以为总委员会一开始就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也不知道同盟为了加入国际必须解散，所以就把同盟和国际作为一体介绍给任何愿意听他宣传的西班牙朋友<sup>166</sup>。法奈利建立了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而这个分部是建立在巴枯宁和同盟的安那祺主义精神基础上的<sup>167</sup>。除了上述提到的他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安那祺主义就是国际的精神这个原因外，他当时手上只有

---

<sup>164</sup> Max Nettlau 引用 La Revolte, Paris, May 1893. 引自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21.

<sup>165</sup> Anselmo Lorenzo, Spanish Anarchist, cit. in H. M. Enzensberger, "Der kurze Sommer der Anarchi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seppe\\_Fanelli](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seppe_Fanelli)

<sup>166</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23.

<sup>167</sup> 例如，“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巴枯宁给他的同盟的纲领文件，而这个纲领文件的要点(废除阶级，两性平等，出生时权利/机会平等<sup>168</sup>，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国家，拒绝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无神论)<sup>169</sup>符合国际成立时宣言和章程(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sup>170</sup>)<sup>171</sup>，所以应该赞扬法奈利忠实于国际的精神。不过，法奈利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使命，后来却再也不愿与巴枯宁联系了，主要是因为巴枯宁和几个朋友没有提供许愿过的资助，让他这个“意大利议员”数度陷入一贫如洗、斯文扫地的地步。<sup>172</sup>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他当然没有精力和兴趣为自己辩护，这多少也带来了马克思派对他的“出卖国际”的污蔑的流传。

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新信徒，正如 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给巴枯宁的信所示：“下一个周日的会议上，我将告诉国际巴塞罗那支部的朋友们你的信和希望，让更加民主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同盟。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给我的小册子上的每一句话。”<sup>173</sup>马恩此文也确认道：“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

---

<sup>168</sup> 废除继承权。这是巴枯宁和朋友们在国际 1869 年巴塞尔会议上与马克思派的主要冲突。

<sup>169</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28-29.

<sup>170</sup> 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年9月3日。

<sup>171</sup> 由苏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只是翻译)把国际的重要文献都编入其中。其实，国际成立时，马克思只是9人秘书小组成员之一，宣言、章程的精神来自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sup>172</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26.

<sup>173</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24.

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那么，又何必指责“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呢？

与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的马恩不同，巴枯宁从自身的俄国牢狱/逃亡经历，体会到共济会等宗教秘密组织对革命的价值。实际上，任何真正的革命，特别在初期阶段，都不同程度地与秘密社会相关。巴枯宁意识到“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sup>174</sup>。当然，具体在实践上，任何秘密组织都不免带有告密、出卖等恶迹，巴枯宁也不免被人指责，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们面临政府的屡次镇压，被迫转入地下，比没有经历过镇压的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斗争中保持革命的原则。

实际上，正如 Casas 所说：“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所属的日内瓦同盟不是一个有正式决议和规定要求各国成员遵守的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强制和权威的团体，不可能如此，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同盟试图在不同的国家的活跃和有干劲的成员中建立一种联系，得以在各国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革命运动转换社会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

---

<sup>174</sup> 还得感谢马恩在此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巴枯宁原始资料。

当地的情况促发，独立行动。巴枯宁与朋友们的各种信件（当然不如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那样频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基于交换意见、劝告和解释的想法，从来没有指令的意图，因为那不符合巴枯宁的方式，也不会被他的朋友们接受”<sup>175</sup>。Pellicer 等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宁的意见和方式的<sup>176</sup>。马恩也承认说：“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这说明巴枯宁没有“教皇”的能力远程遥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广大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际的理想接受的。马恩为了排除巴枯宁，把巴枯宁在西班牙的实际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样<sup>177</sup>，巴枯宁本人还没有转变为完全的安那祺主义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马恩进一步指责：“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说：‘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最后尝试。…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实际上，所谓社会民主同盟西班牙分部或同盟马德里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在西班牙迅速激进化、国际的组织急速扩

---

<sup>175</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25.

<sup>176</sup> Max Nettlau, cited in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25.

<sup>177</sup> 阿勒里尼“以〈同盟〉巴塞罗纳小组的名义”寄给“我的亲爱的巴斯蒂利卡和亲爱的朋友们”的这封信的副本被散发给了同盟的所有西班牙支部。从中作一些摘引：“本届总委员会只存在到明年的代表大会为止，它的极其有害的活动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地，公开的决裂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很大的打击，即使我们的事业总的说来能够经得起这种打击，也难于恢复元气。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们的分立主义的倾向……我们中有些人自己在想：在这一切事情中，或者与这一切事情同时，除了原则的问题以外，是否也有私人的问题，例如我们的朋友米哈伊尔同卡尔·马克思之间、老同盟的盟员和总委员会委员之间竞争的问题呢？”

展的过程中，那些接受同盟思想的人不知道如何组织同盟的分部，也根本没有必要组织同盟的分部，而是迫不及待地直接投入建立国际的各级支部的斗争中了。“目标是国际（的建设）。同盟在西班牙没有当地、区域或全国的组织结构，只是一些联络小组。没有任何小组之间联络的纪录。把全国分散的小组连接起来的理想就是安那祺主义”<sup>178</sup>。

除了西班牙，代表国际多数成员的瑞士（汝拉联盟）、比利时、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义，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国际 1869 年巴塞尔大会上，由德国工人 Eccarius 宣读的巴枯宁提案得到代表的压倒性支持。把国际视为个人工具的马克思害怕起来，私下里对恩格斯透露：

“这个俄国佬想变成国际的主人。他不老实的话就要被开除”<sup>179</sup>。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 1869 年 7 月 30 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在 1871 年实际上只是总委员会扩大会议<sup>180</sup>的伦敦会议上<sup>181</sup>，除了总委员会的 13 个代表，只有 6 个比利时代表、2 个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个西班牙代表（罗伦佐）与会，汝拉联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宁本人没有被邀，马克思突然拿出违背国际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

---

<sup>178</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32.

<sup>179</sup> 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Vol. II pp.168-174. Spanish edition, ed. Jacques Fremont. Cited in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33.

<sup>180</sup> 关于第一国际历史的作家 Molnar 也这样确认。引自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34.

<sup>181</sup> 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

伟大目标)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九号提案和谴责巴枯宁的问题,作为国际代表大会投票通过。

这是违背国际和普遍社会主义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正式成立的标志。为此,意大利的国际分部就发布声明:“鉴于:伦敦代表会议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巴枯宁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说:“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您仇视这个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不可避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



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这已经预感到国际的死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法在法国生活的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来推行马克思主义，要把国际转换成在“马克思主义者”<sup>182</sup>们指挥下从事职业政治的工具，最终与其他8人被西班牙国际分部 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员会开除<sup>183</sup>。“…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sup>184</sup>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马克思派的（伦敦）总委员会把代表5-7万左右会员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sup>185</sup>排斥在外，让只有9名西班牙成员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成为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让拉法格作为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连国际的规则也不管了。总委员会如此专横对待不同意见的会员，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除了被总委员会“开除”，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呢？感谢马恩在此为我们留下了国际成员对他们的批判：“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

---

<sup>182</sup> Marxist 这个在国际西班牙普通成员看来代表权威、阴谋、分裂的小帮派，应该译为“马克思分子”。相反，国际的西班牙成员不是马克思指责的“巴枯宁分子”帮派，因为没有政治资源的巴枯宁连他们的创始人法奈利都没法联系上，更不用提能够命令任何西班牙的国际成员了。

<sup>183</sup> 直接原因是这几个“马克思分子”接受联邦共和党的邀请会谈，违反了国际西班牙支部 FRE 的政策。这标志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成熟。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36.

<sup>184</sup> 拉法格。

<sup>185</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 21.

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完全依靠拉法格、Utine 提供的情报对西班牙国际、包括对其领导者莫拉哥展开诽谤：“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怪不得 Nettlau 总结道：“这个 1873 年小册子的几乎每一句都是虚伪和偏见。…虽然表面上是 1872 年海牙大会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制造这个小册子的憎恨、浮夸和浅薄的环境”<sup>186</sup>。

但广大国际会员对海牙大会的抵制超出了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马恩判决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 14 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

---

<sup>186</sup> Juan G.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 The History of the FAI*. Trans. Abe Bluestein. Black Rose Books Inc. 1986. p.24-25.

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 1873 年 1 月 26 日的决议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国际的多数成员被他们控制的“总委员会”以国际的名义一一开除了。而开除了大多数会员的国际除了自我解散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除了这本小册子，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sup>187</sup>也同样利用“新马德里联合会”，重复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西班牙没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端攻击，发挥不着边际的想象。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 1873 年 2 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

---

<sup>187</sup> 1873 年 9—10 月。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主要是拉法革的 9 人“新马德里联合会”向 1873 年 9 月 8—13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1. 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2. 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3. 所谓的<sup>188</sup>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4. 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

---

<sup>188</sup>马恩此文的编者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谓的”，而是“大吹大擂的”。

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5. 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与恩格斯对彻底摆脱了他们控制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诅咒相反，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特别在 1936 年 7 月 18 日，正是安那祺主义者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坚持抗战，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苏联等反抗法西斯联盟最终胜利赢得了宝贵的 3 年时间，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

[2014 年 3 月 3 日]

## 18. 登上历史舞台的拉美劳工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外的读者对于中南美洲近代历史，除了要求土地与自由的传奇般的原住民领袖萨巴塔，主要只知道有欧洲血统的上层阶级出生的夺取国家政权的职业革命家卡斯特罗兄弟（律师）、切（医生）<sup>189</sup>、庇隆（军官）<sup>190</sup>、阿联德（议员）以及统治集团的将军（如皮诺切特）、主教、大地主等，再加上异国情调的文学（如刚去世的马尔克斯）、艺术家（如女画家弗里达·卡洛）、政论家（如马公）<sup>191</sup>和过客托洛茨基<sup>192</sup>。2004年圣诞期间，我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在托洛茨基遇难纪念馆与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友人见面。他“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〇〇五年三月即将返回日本。他介绍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发展，最后承认：墨西哥政治太难理解，而日本的有关文献都很肤浅。”<sup>193</sup>幸好，《劳工阶级的控制：1930-1979年的拉丁美洲》<sup>194</sup>填补了这方面英文读物的空白，也丰富了安那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一本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汇编，这本书中论文的质量有高低、有待加强，但毕竟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图像，让我们了解那些登上历史舞台的拉美劳工：1933年古巴革命中甘蔗劳工占领砂糖厂房、墨西哥劳工推动石油国有化、危地马拉革命中的铁路劳工、阿根廷劳工与铁路国有化、劳工阶级对庇隆体制宣传的抵制、圣保罗纺织女工主导的30万大罢工、玻利维亚革命中的矿工、秘鲁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智利矿工与铜产业的国有化。通过劳工的斗争，此书除了告诉我们拉美历史的独特性，也揭示出一些共同的人类社会规律，不可多得。

---

<sup>189</sup> 赵京：“革命英雄主义人性的典范”，2014年2月22日。

<sup>190</sup> 赵京：“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2010年10月30日。

<sup>191</sup> 赵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2010年6月17-25日。

<sup>192</sup> (美)亚历山大(Alexander, R.J.):《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高舌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9月。

<sup>193</sup> 赵京：“墨西哥之旅随感”，2005年元旦。

<sup>194</sup> Workers' Control in Latin America, 1930-1979. ed. Jonathan Brow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 London, 2007.

除了同时抵抗男性劳工控制的圣保罗纺织女工，此书的主角是只占约 1/4 的有组织的劳工中的“贵族”，更没有提及广大的原著农民。这也是此书的特性与局限：除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远高于别的劳工阶级或普通人收入水准），最“先进”、最有战斗性的拉美劳工从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影响和参与了拉美国家的政治进化过程或革命（秘鲁的矿工直接开到首都利马帮助军队主导的革命政变）。其中最典型的是这些国家的最重要产业（石油、铁道和矿产）的国有化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劳工的斗争在政治革命/政变与社会革命中的区别。

例如，卡斯特罗主导的古巴政治/军事革命的国有化过程导致主要外国资本（美国）的制裁和古巴经济、社会的畸形转换（依附苏联），因为直接被国家政权没收的美国资本很容易诉诸强大的美国国家力量的干涉；但组织起来的墨西哥劳工的国有化要求使得同样的美国资本（洛克菲勒财团）不容易直接动用美国的国家力量出面镇压墨西哥的劳工。与其诉诸代价不祥的国际干预，洛克菲勒财团还可以在委内瑞拉、中东找到没有政治麻烦的油田；同时，墨西哥的劳工以为国有化是劳工阶级的控制，墨西哥国家政权则把工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拉拢一小撮“劳工贵族”的官僚加入新的统治阶级，成为最终受益者，等到劳工们发现国有化只不过是外国资本更换成民族资本的统治，为时已晚。阿根廷劳工推动铁路国有化，除了普遍的民族主义高昂外，也伴随着外国（英国）资本腐败、老朽（设备和董事会）的过程，连英国外交/情报机构也建议政府散手不管，把烂摊子交给阿根廷。铁路行业本身也逐渐被公路运输取代，不值得动用大英帝国的舰炮外交（直到 1982 年英-阿争夺外岛的冲突）。这倒使人联想到大英帝国的衰落，在退出印度、马来西亚等殖民事务中，从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会了教训，避免了更大的代价，值得新起的帝国学习。

劳工阶级的不成熟，也可以从智利矿工与更幼稚的阿联德“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联系起来。阿联德以拉美的列宁自居，以为劳工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配合他的政权度过内外经济难关，而已经享有较高收入的矿工却不理睬意识形态、“民族利益”的幻想，在右翼政党的煽动下不断罢工要求更高的待遇，解除了阿联德政权的阶级基础，最后只好看着他自己抓起机枪来抵抗美国支持下的军人政变了。

正如此书总结的那样，“劳工们的错误是在这段长期的转换期间对政府期待太高”（第 301 页），但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劳工阶级不可避免的成长阵痛，特别是拉美的劳工在与外国资本的控制斗争（工资上涨、雇用和解雇权）中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发生关系。所谓“庇隆主义”实际上就是庇隆以军人身份担任劳工部长积累的政策和势力，少不了劳工的支持与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拉美的劳工在控制自己命运的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当萧条时工作机会减少，工会的成员轮流不上班少领工资，这样就没有人被解雇”（132 页）。只有组织起来的劳工才可能这样互助，否则只能被雇主随意解雇，值得今天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劳工们学习<sup>195</sup>。而圣保罗的纺织女工，刚开始学会组织起来，还要抵制已经组织起来的男性工会“贵族”、特别是工会官僚的歧视、压迫，摆脱了被国家政权利用的错误，胜利地达到 30 万人罢工的目的，为拉美的劳工运动树立了典范。

正如此书开卷引用巴西纺织女工 Maris Pavone 所说：“任何人都要有尊严，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正是点燃阿拉伯之春的无业突尼斯青年的自焚导火索。无论在业、失业还是无业<sup>196</sup>，无论拉美还是中东，无论在当代还是八十年前，劳工对尊严的追求就是人类对尊严的追求。

[2014 年 5 月 20 日]

---

<sup>195</sup> “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阿根廷民众…，实行工厂的自我管理。特别在南部的贫穷省 Neuquén，劳工们开始一个一个“解雇”厂主、自己管理工厂，到 2005 年几乎控制了全省的工厂。在 2001 年的经济危机中，阿根廷劳工们“恢复”了对两百个工厂的自行管理，转换成互助型合作社，…可怜的美国劳工们连接管 Adobe 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的梦都没有做过”（赵京：“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196</sup> 连华尔街日报也比较客观地报道美国的非在业人口有 40%左右，更有报道说今年只有 20%的毕业生找到工作。



## 19. 巴西安那祺主义的历史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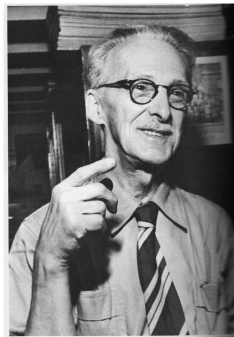
2014年9月5日 Wall Street Journal 登载了一篇可能赢得巴西总统大选的社会党黑人妇女候选人 Marina Silva 的长篇报道，介绍她从一个亚马逊河流贫苦家庭出生、十几岁才开始在基督教学校识字、参与环境保护运动而步入政治。这也是今天巴西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华尔街关心的是世界第5大人口、第7大经济体的政治走向，但我读完603页长的历史研究 *Anarchists and Communists in Brazil, 1900-1935*<sup>197</sup>，了解到现在“有巴西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大政党（工人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起源于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很欣慰虽然没有享受直接的政治成果，巴西安那祺主义的奋斗牺牲毕竟没有白费。

在巴西的第一（老）共和期间（1889-1930），大量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移民来的劳工带来了那时在欧洲兴起的安那祺主义，主导了巴西的劳工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巴西的共和政治。1895年巴西的第一次成功的五月节（五一节）就是由意大利移民组织的（第11页）。国际歌由此成为劳工活动的主旋律。1900年以后，安那祺主义者们开始组织行业联合会（第12页）。就像在南欧那样，巴西的劳工运动受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的安那祺主义影响，至少在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以前，“巴西人对马克思的观点很少兴趣”（第10页），没有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第5页）。1906年4月，巴西第一届劳工会议召开，来自Rio 里约热内卢地区15个组织、圣保罗地区10个组织的30个代表出席。他们没有组织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党，而是像法国工联主义组织 CGT 那样按照安那祺主义的原则成立了巴西劳工联盟 Confederation (COB)，因为劳工们在“政治和宗教意见上”如此分歧，只有在经济利益上所有劳工阶级“才有坚固的意见和行动基

---

<sup>197</sup> John W. F. Dulle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 London, 1973.这是关于巴西安那祺主义唯一全面的英文资料，本文主要引用此书。

础”（第 19 页）。1907 年 5 月、1908 年相对成功的罢工就是以缩短工时（10 小时）等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第 22 页）。



与世界各地一样，劳工运动的高昂必然伴随着政府（警察）的镇压强化，1907 年就有 132 人被驱逐出境（第 22 页）。除了巴西相对脆弱的国家（军队）、政党，安那祺主义日常面对的敌人是在南美大陆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这在宣传教育方面特别突出。1908 年正式成立后的 COB 积极组织活动，首先就是抗议西班牙政府处死自由教育提倡者 Francisco Ferrer（第 24 页），因为教会最害怕失去垄断教育的权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运动和宣传活动中，巴西安那祺主义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家、诗人 José Rodrigues Oiticica（1882-1957，左图）和宣教士 Edgard Leuenroth（1881-1968，右图）。Oiticica 回顾道：“没有一天不去宣讲”（第 31 页）。1917 年 6 月，由 Leuenroth 出版的周刊 A Plebe 成为巴西安那祺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工具（第 53 页）。

1917-1919 年巴西的劳工运动达到高潮（插图是以安那祺主义黑旗为先导的 1917 年罢工）。例如，1918 年 11 月 18 日在联邦特区就有 6 千纺织劳工响应号召罢工，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劳工们也到兵营散发传单，号召“劳工的兄弟们”一同成立“士兵、劳工委员会管理公共事务”

（第 74 页）。1919 年五月节的罢工在圣保罗迫使政府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巴西政府一方面在经济诉求上对劳工让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借对德国宣战的机会大肆镇压安那祺主义者，把他们抓进集中营、拷打中心，并把最活跃的移民



大量驱逐出境。

1919年6月21-23日“第一届巴西共产党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它实际上是“整个巴西安那祺主义的代表大会”（第88页）。从此也开始了在共产党外的安那祺主义者与巴西共产党的论争、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巴西共产党与莫斯科的斗争。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劳工法改善，劳工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的地位淡化下来。例如，圣保罗州1919年经历了37次罢工、1920年经历了13次罢工，在1921-1929年9年期间才经历47次罢工（第540页）。被政府残酷镇压的安那祺主义被迫退出政治舞台，A Plebe 1927年8月关闭后，直到1932年后期才开始重新发行（第495页）。但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共和党、代表小业主和知识阶层的社会党和代表劳工的共产党虽然在表面政治舞台上活动，政治斗争的焦点让位给军队里兴起的Tenente（葡萄牙语：初级军官）叛乱，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Prestes纵队1200人（第246页）从1924年10月到1927年2月历经5万里的长征。受到安那祺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军官们不满被地主阶级把持的腐败上级军官和政府，但也不属于劳工阶级。Prestes纵队没法推翻中央政府，也得不到地方民众的支持，但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横贯全国，进入玻利维亚，至少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最后，军队的介入导致了所谓1930年自由联盟革命，在“秩序与进步”（现在巴西的国号）的口号下把（文人）Vargas推上台前实行专制，结束了已经腐败不堪的名义上的共和。许多参与叛乱的军官官复原职、得到提升，但Prestes和少数随从却加入了巴西共产党，听命于第三国际。

Oiticica和Leuenroth等少数知识分子在安那祺主义运动被镇压、被遗忘之后，还终生不渝地坚持安那祺主义，开办讲座教育下一代。在他们逝去四十年后，当巴西的名不经传的小城Porto Alegre连续在2001、2002、2003年承办具有典型安那祺主义特征的头三次会议世界社会论坛<sup>198</sup>（加上第五次2005年），整个世界突然发现巴西一个世纪前

---

<sup>198</sup> 除了代表反全球化的直接行动、非政府公民社会这两个特征外，连世界社会论坛内部的“空间”与“运动”的矛盾也反映出安那祺主义的敏感性。Giorel

的安那祺主义传统。如果没有安那祺主义前辈的奋斗牺牲，巴西民众可能更晚、更少地享有八小时工作制、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在几乎相同时期经历过类似由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洗礼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中国，至今还没有得到巴西民众享有的新闻/言论自由、选举<sup>199</sup>、多党制等近代政治文明，更呼唤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复兴。

[2014年9月11日]

---

Curran, 21<sup>st</sup> Century Dissent: Anarchism, Anti-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71.

<sup>199</sup> 最近香港的事例再次显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连直接选举地方官员的权利都没有。

##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编辑出版发行序言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开始从日文和英文系统阅读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和理论。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我最近读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其中包括“黑色战线”史料等许多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许久以来，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都被加上无知或无耻的政治按语。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介绍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除了我的文章，还有部分从网上收集到的已经去世的安那祺主义著者、译者或同情/理解者。我们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B-英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

A-1: 《芝加哥的殉难者》，赵京编，ISBN: 978-0-557-24143-9

A-3: 《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4: 《美国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赵京著，ISBN: 978-1-257-43927-0

C-1: 《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赵京编，ISBN: 978-0-557-19209-0

- C-2: 《中国社会评论》，赵京著，ISBN: 978-0-557-04006-3
- G-1: 《德意志自由社会秩序观》，赵京著，ISBN: 978-1-257-37771-8
- J-1: 《日本政治论丛》，赵京译著，ISBN: 978-0-557-23538-4
- R-6: 《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赵京编著，ISBN: 978-1-4583-0411-7
- S-1: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教训》，赵京编著，ISBN: 978-0-557-17055-5
- W-1: 《安那祺主义》，赵京著，ISBN: 978-0-557-01635-8
- W-2: 《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赵京著，ISBN: 978-0-557-03086-6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